

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36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第三十六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90年·北京

18102

中共党史资料（第三十六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北京1929信箱 中央党校南院）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新 燕 印 刷 厂

850×1168毫米 32开 8.125印张 162千字

1990年11月北京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2500册

ISBN 7-80023-139-9/K·173

定 价：3.20元

目 录

文 献

“立群电台”文电选 (1)

回 忆 录

第三野战军的渡江作战 张 震 (39)

周恩来是我党我军电讯、机要
和情报工作的创建者和领导者 罗青长 (72)

综 述

川陕革命根据地综述 温贤美 杨平 (80)

专 题 资 料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华北地区中共
顺直省委和北方局组织沿革梗概 王乃德 (103)

郭子化与中共苏鲁豫皖特委 戚惠民 董助才 (116)

✓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斗争概述 邓礼峰 (135)

✓ 抗美援朝群众运动简介 孙启泰 (161)

人物介绍

罗瑞卿传略 (上) 黄 瑶 (171)

大事记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斯内

夫利特 (马林) 在华纪事 杜魏华 (223)

小资料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

创立的震东社会科学院 陈汉初 (254)

“立群电台”文电选

编者按：新疆和平解放是新疆近现代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也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新疆各族人民的奋斗始终得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关注和领导。新疆解放过程中，中共中央更派出邓力群赴新疆，代表中共中央与各方面人士联络，传达中共中央的意见和指示，使中共中央和平解放新疆的战略部署得以顺利实现。为使读者更完整地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全貌，我们特地选编了这组文电，供研究参考。除个别标题为编者所加和做若干必要的技术处理外，余均保持历史原貌。

毛泽东关于转发彭德怀进军

新疆时间安排致刘少奇电

(1949年8月4日)

刘王^①：

我曾以甘新路上的情况及何时可以向新疆进军电询彭

^① 刘，即刘少奇；王，即王稼祥。

德怀同志。接彭 8 月 3 日复电，现转给你们。自胡宗南主力被歼后，两马^①节节后退，我一路已占平凉固原，另路日内可占天水，接着即向兰州进军，8 月底或 9 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

毛泽东

未支^②

附：彭德怀关于进军新疆时间安排致毛泽东电

(1949 年 8 月 3 日)

毛主席：

由平凉至迪化全长 2240 至 2300 公里，步行日以 35 公里计，需时 66 天，每 4 天休息 1 天，共需 3 个月才能到迪，其中星星峡东西约 400 公里，无人烟，缺水粮等，柴水均须预备运送。三四月间系风季，安西至星星峡处常起旋风。黄旋风来势缓，人可避，黑旋风来势猛事先如无准备人可吹走。酒泉至迪化，严冬时温降零下 30 至 50，非皮帽衣服毡靴难过冬。目前两马主力未遭歼击，今年能否进兵哈迪^③须打下兰州西宁后才能作具体计划。

彭德怀^④

8 月 3 日申^⑤

① 两马，指马步芳和马鸿逵。

② 未支，即 8 月 4 日。

③ 哈，即哈密；迪，即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市）。

④ 彭德怀，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西北局第一书记。

⑤ 申，即 15 时至 17 时。

邓力群到达伊犁给中央电

(1949年8月15日)

发北平

中央：

我们四人^①于8月14日下午9时（莫斯科时间）抵伊犁^②。我与此间负责人尚未接上头，估计明后天当可接上。中央对我的工作有何指示？望即电告。

力 群

15日

同三区领导人初次会见情况

(1949年8月17日电)

发北平

中央：

今日下午此间阿副主席^③和军事领袖伊斯哈克伯克将

① 四人，指邓力群及报务员王乃净、段恒德、李××。

② 伊犁，指今伊宁市，当时是县系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三区领导机关所在地。

③ 阿副主席，即阿合买提江，维吾尔族，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之一，当时任新疆省联合政府副主席，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简称新盟）中央委员会主席。

军^①第一次接见了，由阿巴索夫^②翻译。互致问候后，我依照少奇同志的指示，向他们说明了我此行的任务，是和此间的政权、军队、团体及其领袖取得联络，将此间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情况，地理气候，风俗人情等情况，目前特别重要的是有关军事行动的敌我友各方面情况，系统地报告中央，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请求他们经常给我指示和帮助，并要求他们给我安排一个工作的日程。他们表示：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在复杂和艰巨的任务中，关心到处在偏僻地区的他们，并派人来此联络，使他们感到很大的兴奋，他们将尽一切力量来帮助我完成这个任务，供给我一切材料，介绍各方面负责人和我谈话，他们亦答应和我做经常的详细的谈话。中央要我首先了解什么？请电告。

其次还谈到新疆出席政协会议代表的有关各问题，另电告。

力 群

17 日

① 伊斯哈克伯克，柯尔克孜族，新疆三区革命领导人之一，当时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三区民族军总指挥，新盟中央委员。

② 阿巴索夫，维吾尔族，三区革命领导人之一，时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副秘书长，新盟中央委员兼新闻处处长。

中共中央关于邀请伊犁负责人
出席新政协致邓力群电

(1949年8月17日)

邓力群^①同志：

15、16日两电均悉。

(一)望先以中共中央名义，向伊犁负责当局提出邀请他们派遣代表出席9月10日左右在北平开会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人数为5位，希望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均有人来，并有一位汉人同来兼做翻译。新政协筹备会邀请书另电告。(二)你应即按少奇、稼祥同志的指示进行工作，向特区负责当局报告情况，不要发表任何意见。(三)前由董老派去工作的彭长贵^②是否已经见到，如遇到，望予以鼓励，并勉其安心工作。

中央

未筱^③

① 邓力群，时任中共中央联络员，1949年8月14日由苏联莫斯科到三区领导机关所在地伊宁。

② 彭长贵，又名彭国安，中共党员，1947年初由南京经迪化到伊宁。

③ 未筱，即8月17日。

关于新疆特区情况给中央的报告

(1949年8月21日)

发北平

中央：

现将阿合买提江关于新疆特区^①情况的概括介绍，整理报告如下：

新疆省内的少数民族自清朝以来即长期处在被压迫的地位。清政府时，对新疆少数民族的压迫非常残酷，剥削非常严重，因此少数民族和清统治者关系非常恶劣，新疆人民仇恨清朝的统治，一有机会即举行暴动，即使暴动被镇压下去也是心怀仇恨，继续反抗。民国成立，新疆境内少数民族的被压迫地位也没有根本改变。以后由于时局的演变，新疆出现了盛世才的统治，他初期采取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因而促进了新疆境内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他叛变以后，抛弃了初期正确的民族政策，采取比清政府更坏的压迫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摧残了各民族的进步势力，逮捕、屠杀了各民族中的进步分子。为了维持反动统治，他采取了比清政府更残酷的压迫和剥削手段。盛世才知道他的统治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他的政策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他需要寻找一个力量作为他统治的依靠和压迫少数民族的基础。因此，他

^① 指：三区革命所控制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三个地区。

采取了一个毒辣的分化与挑拨民族关系的反动政策，把汉族看做比别的民族高过一等，在汉人中普遍实行警察制度，把汉人中的警察和特务武装起来，以此做为压迫和统治少数民族的工具。这种毒辣政策实行的结果就是人民认识到了盛世才与国民党都是他们的压迫者，同时也使少数民族和汉族的关系恶化起来，紧张起来，少数民族把盛世才和汉族看成了一样的统治者和压迫者。

盛世才统治的初期，因为采取了正确的民族政策，曾在各民族中造就了一部份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开始在社会上占有着一定的地位。但当盛由动摇走向叛变时，首先开始向这些知识分子进攻，很多人被捕了，很多人被杀了，以至使很多人不愿把自己的子弟送进学校读书。因为进入学校以后，不但失去了一切政治上的自由，甚至被剥夺了结婚的自由。在这种进攻和侮辱欺骗下，青年知识分子们初期所得到的一切都被夺去了，他们在社会上所占的地位也跟着失去了。

同时新疆的封建势力特别大，社会中父子间的宗法关系很深，这种关系实际上还是一种奴隶的从属关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这种关系一直到今天在落后的新疆还起着基本的作用，人们把老年人看得比青年人高，老年人的威信远远高过青年人，老年人的社会地位也大大超过青年人。这种情况革命前特别严重，到现在也还存在着。

人们的社会地位由人们的经济关系来决定，有钱就有势，谁富谁的社会地位就高，谁穷谁的社会地位就低，这种情形在落后的新疆特别显著。落后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

又与宗教势力相结合，加重了对人民思想的束缚，造成了宗教及其教士在社会上特别威严的地位，使封建势力对人民的统治更加严重了。我们的民族运动的基本动力是农民，但他们完全处在封建势力与宗教势力的统治下面。

综合上述一切，可以知道我们此次民族运动^①开始时所处内外环境的复杂。所以革命的初期，明知道有些分子不是忠实的革命者，而青年人则是真正的革命者，但为了团结最广大的阶层，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们的青年在革命初期不能不把那些不忠实的革命者推在运动的前面，而使自己居于后面的地位。

这就决定了，因而也产生了革命初期封建势力在政权中占着重要的地位，宗教教士成为政权的首领，^②而教士则能利用他们在政权中的地位去公开实行宗教的教义及规约，因此初期的民族运动在形式上带有宗教的性质和色彩。因为民族仇恨与宗教成见相结合，所以当人民开始反抗时，运动就赋有极大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又因为政权中的主要人物和教士特别拥护甚至纵容这种自发性和盲目性，青年人虽然想使这个运动减少自发性、盲目性，而带有自觉性，

① 指以伊、塔、阿三个地区为主的维、哈等少数民族人民为反抗国民党在新疆的统治而举行的武装起义，后被称为“三区革命”。

② 宗教教士成为政权的首领，指1944年11月12日在伊宁成立三区临时革命政府时，大阿訇艾里汗·吐热担任主席。艾里汗·吐热，乌孜别克族，伊斯兰教经典学者，十月革命后从苏联到新疆布道行医，宣传宗教，主张推翻盛世才统治，在新疆建立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1946年6月三区和国民党政府签订和平协定，成立了新疆省联合政府，三区革命政府同时撤销，艾里汗·吐热去了苏联。

但他们的力量小，政权中的封建势力和宗教势力的力量大，因而不能起应有的作用。初期指挥部曾公布实行掠夺与奸淫者处死刑的命令，但群众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未为此法令阻碍住。群众把仇恨集中于整个汉族的身上，他们把整个汉族都看成敌人，他们要和汉族算帐，他们行动起来，自发地盲目地，向一切汉人报仇，结果使汉族中有些人无故受到了损失。

为了了解运动初期的全面情况，我们还需要回忆当时国民党统治区^①和民族运动统治区^②的对比。在两个地区中，甚至在一个地区双方占领的不同地方，国民党有意识地实行对少数民族的屠杀与镇压政策，这种情况的对比，又反过来鼓励了少数民族对汉族不应有的报复行为。指挥部为了保护汉人，曾给自己区域的汉人填发身份证，但有少数汉人得到身份证后，受了国民党的欺骗，仍然跑到国民党区去，为国民党服务，与民族运动区为敌。这同样鼓励了少数民族中盲目的自发的报复行为。

我们就是在这样严重的环境中和国民党进行斗争。在这个斗争中，我们除感到自己力量的不足，还不能同时向外部的国民党和内部的封建势力进行斗争，我们只有把人民与国民党的斗争放在主要的地位，把内部人民和封建势力的斗争放在次要的地位，才能应付这个艰难的局面。当我们面前站着强大的敌人时，我们不应当脱离我们的同盟

① 国民党统治区，指国民党新疆军政当局所控制的迪化等七个区。

② 民族运动统治区，指三区革命力量所控制的伊、塔、阿三个地区。

者，那怕是暂时的同盟者，为了反对当前强大的敌人，反而应当更密切我们和同盟者的关系，那怕是暂时的同盟者的关系。在这过程中，民族解放运动的口号在人民中有着特别深刻的影响，我们不能不服从这个口号，我们只有遵守这个口号，才能动员最大多数的人们来和国民党做斗争。也正是由于这原因，所以当我们今天回忆过去的历史时，容易看到由此产生的初期运动的缺点。

自中国人民解放军反攻以后，我们才开始内部的斗争，主要的内容是动员人民来拥护民主政权民主政治，使人民了解民主政治，组织他们为推行民主政治而斗争。虽然开始实行民主政治已提上日程，但我们的工作还不理想。基本的原因有两个：一、强大的敌人仍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能过份紧张内部的关系。二、如现在即开始和内部封建势力进行严重的斗争，则美英和国民党会利用这个矛盾，喊出民族独立的口号，举起民族运动的旗帜，吸引我们的暂时的同盟者去与他们合作，并以此来分化新疆境内少数民族的团结，那样敌我力量的对比将发生对我极端不利的影晌，现在我们内部的情况是民主力量已比反动力量强，如我们要与他们进行斗争，我们的力量已经足够。因此我们已开始把民族运动同时解释为民主运动，人民倾向于这个运动，我们的力量可以更加生长。现在敌人已经不能在我们中间进行分化和挑拨，即使进行，也不能起作用。为了巩固我们现有的力量和地位，工作中心和严重的任务是用极大的力量去进行对人民的教育工作。我们所依靠的力量只有农民，没有工人，而要做好农民的教育工作则需要很

长的时间。

关于军事情况，已有电告，不赘。

在阿合买提江上述谈话之前，他曾向我提出新疆的两个基本特点和问题。

一、民族问题。新疆的民族问题特别复杂，由于历史上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多次的互相屠杀，导致了各民族之间产生严重磨擦和深刻仇恨，这种磨擦和仇恨在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更加严重和复杂。半世纪以来，此间的民族运动都是在泛土耳其主义的思想影响下进行，目的是想达到把所有的土耳其人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国家，因此，此间少数民族之知识分子尤其是老知识分子中，泛土耳其主义的思想很深。

二、宗教问题。此地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信仰伊斯兰教，他们对宗教的信仰特别深，因此教士的势力非常大，人民不知不觉地盲目地尊崇和迷信教士。可兰经上规定，信仰伊斯兰教人都是同胞，都是一家人，所以，所有的信徒都有一个把天下伊斯兰教人组成一个国家的意愿，很容易把非伊斯兰教人看成敌人，对于压迫民族则更易产生仇恨，而美英帝国主义则利用这些口号来策动挑拨离间的阴谋。

他又说产生这两个问题的基础是没有工业，因而没有工人的落后的封建的农业经济，社会中统治的关系是家庭关系，父子之间是奴隶的从属关系，因此家族观念深，部落观念深，地方观念深，封建势力的统治由此也特别严重和牢固。

以上就是他几次和我谈话的基本观点和主要意见，为

了使中央全面了解他们的思想，我没有加任何修正与删节，只在文字上做了条理的工作。下次我将向中央报告在报纸上所能看到的他们关于民族政策的意见。

力 群

21 日

新疆国民党军政当局开会讨论 和平起义的一些情况

(1949年9月2日)

发北平

中央：

今晚我见到了此间和刚从迪化来的负责友人（副总领事）^①，他们告诉了我关于迪化如下情况。在局部和平问题上，军事方面的陶峙岳、赵锡光，政治方面的刘孟纯、刘泽荣^②、屈武，甚至包括鲍尔汉，都已一致同意接受我方和平条件。前几天他们曾正式举行会议，讨论继续支持蒋介石或接受我方和平条件问题，会议上除马呈祥对此问题没有表示正面意见而要把他的力量退回青、宁外，其他的人都一致同意实现局部和平。他们共同表示，最高的希望是不愿新疆再发生任何流血和牺牲的事情。他们保证对我不做任何抵抗，让我和平接收，他们正做接交的准备。陶峙

① 指当时的苏联驻迪化领事。

② 刘泽荣，时任国民党政府驻新疆外交特派员。

岳、刘孟纯、刘泽荣、屈武等人都曾分别找迪化友人，要求向我转告他们的意见，要求通过他与我方取得联络，开始具体谈判。这些人以刘孟纯最积极，近年来他做了不少有利于和平的工作。今天迪化友人起飞前，刘孟纯曾亲去访问，正式要求把他带来伊犁，以便经此设法与我方取得联络。同时，并再三要求友方转请伊犁当局在二个星期内不要出兵，声明这是他们唯一的要求，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其它的条件。他们将在两个星期之内做好一切交接的准备。迪化友人说，现在形势完全成熟了，原则上已经没有问题，只是余下接受的形式和技术问题，向我方和平交接，在军事政治主要领导人中已没有分歧。目前存在的分歧，只是有一部分人不愿向伊犁方面投诚，而要转向我方投诚，因为他们认为向伊犁投诚要失去面子。所以现有一部分部队正向甘肃走廊东开，此行动的目的，据友人谈确是诚意的想到那方面直接向我方投诚。新疆局部和平形势的成熟，还得到了其它方面的证实。迪化市现已公开谈论和平与投诚，甚至人们在街上声称自己是共产党员，也没有人干涉。英美迪化领事馆只余下副领事拍卖破烂，随时准备撤退。迪化友人说，他保证上述情况是确实的，他保证国民党方面一定与我方进行谈判。他说，国民党方面无条件的接受我方和平条款，不愿使新疆再发生流血事件，确是诚意的。他希望我们果断地、迅速地抓住这个时机，立即设法与国民党方面开始进行谈判。至此我曾以中央欲派张治中和我方

代表去迪化促陶^①起义事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张^②对新疆国民党军保有很深影响，如果来了，确能起很大作用。但接着他又说，在现在的条件下，张不去也完全可以了。他几次的重复说，现在原则上已经没有问题，只留下正式接受的形式和技术问题了。

他们说目前需要注意的问题有两个。

一、马呈祥（他在疆还有 8000 余人）和叶成结合起来发动军事阴谋，逮捕策动局部和平的主脑人物，镇压局部和平运动。这种可能性目前虽然很小，但应充分予以估计和警惕。

二、因为大土耳其主义的思想在新疆少数民族中影响很深，麦斯武德、麦苏德、伊敏等想利用这个影响，策动“民族独立”的阴谋。据说艾沙伯克不久前曾与马步芳商量，请求蒋介石允许他们在西北组织一个回教的“独立国”。伊敏的老婆亦曾去南疆进行这种活动，英国在南疆亦正在促进与支持这个阴谋的实现。伊犁方面近来也发现了几起以大土耳其主义思想为团结基础的秘密小组织，他们认为这是当前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的危险。如果这个阴谋实现，他们将使大土耳其主义者的势力、宗教势力和封建主的势力结合起来，形成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重新发生新疆各民族之间的屠杀，使我军前进遇到不容忽视的阻碍与困难。因此他们认为应将我方在内地解决民族问题的具体政策、具体

① 陶，即陶峙岳。

② 张，即张治中。

事实，在此展开广泛的宣传，广泛散发我方解决内蒙和西北回族问题的文件与材料（尤其需要具体材料）。

对于上述问题，中央如何措施望速电告。

力 群

2日夜4点

新疆出席人民政协代表在苏境
遇难，拟另派代表出席

（1949年9月3日）

发北平

中央：

友方^①确息，新疆出席政协代表^②24日由阿拉木图起飞，25日努威什比尔茨克继续飞行，26、27日之间，因气候恶劣，于伊尔库茨克贝加尔湖地区南部全部遇难牺牲。为了完成此未完事业，此间^③拟续派3个代表前往出席，当时我向他们表示，个人完全同意，同时我估计中央也必非常欢迎，请他们即做准备。这3个代表一为赛福鼎，新盟常委，阿合买提江走后，是此间政治上的主要负责人。一为塔城副专员阿里木江^④，一为新疆学院副院长涂治，此二

① 友方，指苏联驻伊宁领事。

② 政协代表，即阿合买提江、伊斯哈克伯克、阿巴索夫、达列力汗和罗志。

③ 此间，指三区。

④ 阿里木江，乌孜别克族，时任塔城副专员，新盟塔城分会主席。

人都很好，只带随员翻译两人。友方问飞机是否可以由此直飞北平。此消息伊犁当局^① 决定在此间暂保秘密，待新代表回伊时带回遗体，再公开发表，上述各问题均望中央速来指示。

力 群

3日下午4时

中共中央关于同意邓力群去迪化
商讨和平解放新疆等问题致邓力群等电

(1949年9月13日)

力群并告彭张^②：

11日晚12时电悉。

(一) 同意你去迪化一星期仍回伊犁，尔后视情况往来于迪化伊犁之间。

(二) 你见迪化当局，除将张治中致陶、鲍^③ 两电原文面交他们外，并向陶、鲍表示他们应立即派员至兰州与彭德怀副总司令洽商和平解决新疆问题。最好陶峙岳能乘飞机直飞兰州面晤彭副总司令。张治中于新政协开会完毕后亦将往兰州晤陶。如陶自己愿往，或派代表前往，你可与友方^④ 商榷，问他们能否派飞机送陶或其代表往兰。

① 伊犁当局，指三区领导机关。

② 彭，即彭德怀；张，即张宗逊。

③ 陶，即陶峙岳；鲍，即鲍尔汉。

④ 友方指苏联。

(三) 陶峙岳所属部队应照原样在各区各县驻防，不要调动集中，待人民解放军入疆分别接防时再行调动集中编整，以免秩序混乱。

(四) 你与陶、鲍见面后情况望随时电告。

中央

申元^①

陶鲍分别领衔在今明两日发出起义通电

(1949年9月25日)

发北平

中央并彭张^②：

一、此间继酒泉问题解决后，于今日由陶^③领衔通电与广州政府^④断绝关系，接受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领导，该报已直发兰州，想已收阅。

二、省府亦准备明日省府委员会正式讨论通过后由鲍^⑤领衔发出通电。

三、据刘孟纯谈黄祖勋^⑥领一个特务营和一个宪兵团共千来人未受约束，撤出酒泉，开向安西，刘称已派人阻

① 申元，即9月13日。

② 彭，即彭德怀；张，即张宗逊。

③ 陶，即陶峙岳。

④ 广州政府，指已迁往广州的国民党政府。

⑤ 鲍，即鲍尔汉。

⑥ 黄祖勋，原任国民党九十一军军长。

其入疆。

四、近三四天内，他们的主要工作放在向军队各级人员进行教育解释，使彼全军了解彼等意图及整个局面。

五、据鲍称此间有卡车 200 余辆（最高限度的动员可达 300 辆）。可供军运，汽油亦不成问题。

六、马呈祥、罗恕人、刘汉东^①、王曾善^②、马国义^③等干部警卫人员和大批财产（约 5000 两金子）于今日乘汽车 10 余辆，向南疆逃走，叶成则尚留此。

七、今后我应该怎样工作，此间地下组织今后应当怎样活动，均请指示。

力 群

25 日下午 8 时半

邓力群转发鲍尔汉致毛主席电

（1949 年 9 月 19 日）

发北平

中央：

转去鲍尔汉致毛主席电。此人在此间当局主要人物中比较起来是能与我方接近的一人，友人^④数次告我，鲍可与我方长期合作。

① 刘汉东，军统特务，时任迪化警察局局长。

② 王曾善，时任新疆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

③ 马国义，时任立法委员兼迪化回族文化协会会长。

④ 友人，指苏联驻迪化领事。

力 群

19 日

附：鲍尔汉致毛主席电

毛主席：

解放军胜利完成人民解放伟大事业，谨致无上之欣祝。此间对新民主主义及尊重少数民族利益之号召，早具坚强之信心及拥护之赤诚，并为克服困难已经决意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脱离关系。兹已准备一切力量消灭反动势力，接受领导，俾每一角落共庆新生，以完成钧座所领导整个中国之解放。特电敬布衷忱，敬祈亮察。

鲍尔汉申皓^①叩。

毛泽东关于向新疆进军和成立 西北军政委员会、新疆军政委员会及新陕甘青 省政府人选问题致彭德怀等电

(1949年9月26日)

彭德怀同志并告西北局：

25日电悉。

(一)陶峙岳派曾震五来兰谈判是试探性的，你们应对曾震五做工作，争取他站在我们方面，而不着重谈判新疆问题的具体解决方面，因在我军入新以前谈不到具体解决。

^① 申皓，即9月19日。

(二) 曾震五今冬不要进军的意见，你们也不要驳他，即不要表示今冬一定进军。但在实际上，你们应确切地于11月1日或10日以前准备完毕(皮衣、皮帽、毡鞋、水壶、汽车、汽油、粮食、现洋、钞票等等及最重要的政治动员和干部准备)，以便在11月上旬或中旬实行进军，主力准备车运及步行，一部准备空运。我们除为你们准备400辆汽车及皮衣、现洋、钞票等事而外，正在为你们交涉30架至50架运输机。

(三) 解决新疆问题的关键是我党和维族的紧密合作。在此基础上迫使国民党就范(国民党军队及党政大概有七八万人，号称十万人)，并使张治中、陶峙岳、刘孟纯等为我们服务，使新疆能够和平地少破坏地接收过来，并有秩序地改编国民党军队。张治中可待11月我军开始前进时，来兰州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成立会(已与贺谈过，就边区政府基础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彭为主任，习仲勋、张治中为副主任)，然后和彭一道入新。

(四) 新疆的统帅机构，应是新疆军政委员会，彭兼主任，王震、张治中、鲍尔汉为副主任。省政府改组，鲍尔汉应仍为主席。委员应是汉人占少数，维族及其他民族占多数(现在鲍尔汉省政府是汉人10名，维族等15名，我们入新不要变更这个比例)。这一基本方针已取得鲍尔汉及迪化友人方面的同意，请你们加以注意。

(五) 甘、青可以不成立军政委员会。陕、甘、青三省府的人选可以照你们所拟办理。即陕省府以马明芳为主席，甘省府以郑宝珊为主席、王世泰为副主席。青省府以赵寿

山为主席。

(六) 入川军事待邓小平到平谈妥后，再告。

毛泽东

9月26日

彭德怀关于陶峙岳通电起义等致毛主席电

(1949年9月27日)

毛主席：

9月26日电敬悉：

陶峙岳敬有^①两通电，脱离国民党，拥护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想中央已同时收到）。此两电于26日下午1时收到，实际上此两电均系26日拟发，这是照顾面子。此次陶峙岳变化如此之快，原因可能是新政协开会，增加张治中发言权，我大军西进甚速，日进数百里，24日9时即到酒泉，继向玉门前进，对新威胁甚大。曾震五沿途及经兰州亲察，打到新疆去气势甚强，向新疆进军、打新疆等歌曲，与所有人接谈均一致要打到新疆去。谈判中进兵均表示坚决，但并未抛弃他们。我向曾表示：如陶确愿和平可到酒泉面谈，陶26日来电：“转变尚顺利，马、叶、罗已离新疆，经南疆出印度，我（陶自称）现在正赴各军谈话，约一星期后至酒泉晤谈。”似此看来新疆问题麻烦事还多，但可能不经过战斗达到和平解决。新疆军政委员会副

^① 敬，即24日；有，即有，25日。

主任似应有陶峙岳参加。

彭德怀

27 日午

附：陶峙岳、鲍尔汉等起义通电

驻新将士通电

(1949年9月25日)

北平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并请转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司令员、副司令员、政委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诸代表钧鉴：

我驻新将士三四年来，秉承张文白将军之领导，拥护对内和平对外亲苏之决策，执行保卫国家爱护人民之任务，兢业从事，始终如一。自张将军离开西北，关内局势改观，新省远在边陲，各族人士，无不殷切期望遵从张将军之一贯政治主张，确保地方之和平安定，而张将军复备致关垂，责以革命大义，嘱全军将士迅速归向人民民主阵营，俾对国家有所贡献。峙岳等分属军人，苟有利于国家人民，对个人之毁誉荣辱，早置度外。现值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正举行集会，举国人民所殷切期成之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新中国已步入和平建设之光明大道。新疆为中国之一行省，驻新部队为国家戍边之武力，对国家独立、自由、繁荣昌盛之前途，自必有其热烈之期望，深愿为人民革命事业之彻底完成，尽其应尽之力。峙岳等谨率全军将士郑重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

诚接受毛主席之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谨此电闻，敬候指示。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副总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整编骑一师师长韩有文、整编七十八师师长莫我若，旅长钟祖荫、李祖唐、田子梅、韩荣福、郭梁、牛鸣刚、罗汝正、刘昌元、杨建英、马平林同印。

——据 1949 年 9 月 28 日《新疆日报》

新疆省府通电

(1949 年 9 月 26 日)

北平毛主席、朱总司令、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钧鉴：

新疆省自从 1946 年 7 月 1 日根据和平条款，组织各族人民代表的民主联合省政府以后，一向在张文白将军领导之下，推行全省人民所一致拥护的和平、统一、民主、团结政策。三年多以来，因为国内政局的影响，特别是因为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不能圆满完成任务。但由于全省各族人民的支援以及伟大友邦的鼓励，新省终于能够保持和平安定的局面。即在张文白将军为全国和平运动而离开西北，国内反动势力继续顽固挣扎的时候，本省仍然为维护和平争取和平而尽其最大的努力。我们深刻了解新疆人民的唯一愿望是在统一独立、自由民主的祖国扶助之下，才能完成富强康乐的新新疆的建设，更进而为全国和平建设贡献其力量。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大会已经

召开，一个自由独立、统一、民主的新民主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就在目前，全国人民都为这有史以来伟大工程的奠基而欢欣鼓舞。新疆全省人民对于新中国的诞生尤其感觉兴奋。我们现在代表新疆省政府和全省各族同胞郑重宣布：自即日起和广州反动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的八项和平声明和国内和平协定，并将新疆省政府改组为新疆省临时人民政府，暂时维持全省政务，听候中央人民政府的命令。同时邀请留在伊宁的省委们回到迪化，共同合作。深信本省在中国共产党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之下，必能迅速地走上光明灿烂的和平建设大道，谨此电陈，敬候指示。新疆省府主席鲍尔汉、委员刘孟纯、屈武、刘效黎、陈方伯、刘永祥、白文昱、刘德恩、钟棣华、尔德尼。

——据 1949 年 9 月 28 日《新疆日报》

毛泽东和朱德关于回答陶峙岳、鲍尔汉 二十五日及二十六日通电的复电

(1949 年 9 月 28 日)

陶峙岳将军及所属部队将士们：

鲍尔汉主席及所属政府工作人员们：

你们在 9 月 25 日及 26 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离脱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

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正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

毛泽东

朱 德

1949年9月28日

彭德怀关于三区、民族军以及在新疆
成立党的领导机关致毛泽东电

(1949年10月9日)

毛主席：

一、伊犁自治区^①似应有一人为新省军区副司令，或副政委。

二、伊犁自治军^②似务必考虑编一至两个师，改名为人民解放军以示一律。在他们要求下，准备派数个政治干部前往工作，介绍人民解放军经验，学习他们经验。

三、人民解放军进占迪化后，伊犁自治军似应有一部开驻迪化，表示他们是胜利的人民解放军。有一部开乌苏，才不致太刺激陶方，以便交流工作经验，及增进团结。

四、新疆党的领导机关成立省委还是成立分局，似应

① 伊犁自治区，指三区革命所控制的伊犁、塔城、阿山（阿勒泰）等3个专区。

② 伊犁自治军，指三区民族军。

王震为书记，徐立清为副书记，以罗元发、张贤约、饶正锡、王恩茂、郭鹏、曾涤（一兵团副主任），邓力群及自治区选两至三人为委员。

以上各项，请中央考虑电示为盼。

彭甘^①

9日酉^②

中央关于民族军改名和成立新疆分局

致彭德怀甘泗琪电

（1949年10月12日）

彭甘^③并西北局：

9日酉时电悉。（一）伊宁民族军必须有一人为新省军区副司令，已见前电。（二）民族军应改名为人民解放军，他们已有此意，并要求我们派政治工作人员去。此事及应编师的数目及具体番号，待你至迪化与民族军负责人商量后再定。（三）民族军应有一部开迪化，另一部开乌苏。此事待与赛福鼎商量后，再告。（四）新疆党的领导机关应成立分局，同意以王震为书记，徐立清为副书记，罗元发、张贤约、饶正锡、王恩茂、郭鹏、曾涤、邓力群为委员。自治区只有民主同盟，尚无党的组织（应该建立党的组织），是否可以同盟负责同志数人临时参加分局会议，待考虑后

① 彭，即彭德怀；甘，即甘泗琪。

② 酉，即17时至19时。

③ 彭，即彭德怀；甘，即甘泗琪。

再告。

中 央

10月12日

邓力群关于能否在最近赴迪化一次及今后
工作任务问题的请示

(1949年10月17日)

发北京、西北

中央、彭张^①：

一、昨听迪化广播，我军今日即可进入迪化^②，到新干部想必同来。我在迪化时曾与地下组织建立联系，为了向来新负责同志介绍地下组织及我所了解的一部情况，是否需要我最近去迪一次。

二、我们来此任务是建立中央彭、张和三区的联络，现在在我军进迪，今后联系当可直接与迪化我党政军领导机关建立，我们的任务将近结束。今后我与同来的电台工作同志是否回中央，请和前一项问题一并指示。

力 群

17日

① 彭，即彭德怀；张，即张宗逊。

② 人民解放军是10月20日进驻迪化的。

郭鹏、王恩茂等关于二军入疆综合报告

(1949年10月18日)

王张曾彭甘^③：

我军从酒泉、玉门、安西之线出动到本日止，四师十二团已进至吐鲁番，十团及师指现在鄯善。十一团一部正向鄯善车运中，一部仍在哈密，军指及五师师指和十四团、十五团仍在哈密。现将我军入疆情况综合报告如下：

(一) 我军入疆得到了新疆〔各〕民族人民的热烈欢迎，13日当我军先头部队进哈密时，哈密各界代表、各民族代表远出哈密以东20里之新庄子迎接。14日又至该地迎接。15日十二团至七角井，群众欢迎。16日至鄯，鄯县长和群众要欢迎解放军，县长遭反动分子打死，但群众仍然欢迎解放军。17日24时以后十二团始到吐鲁番，县长和群众等到半夜还要欢迎解放军。解放军到了那里，那里的人民就欢迎解放军，都说：盼望解放军很久了，看到了解放军十分高兴。解放军没有去的地方那里的人民就要求解放军去，哈密群众要求解放军到新疆每一个角落去，你们解放军到了的地方，人民的生命财产才能得到保证。维吾尔和哈萨克等民族的人民自己一致的说：解放军来了使他们由黑暗

^③ 王，即王震，时任一兵团司令兼政委；张，即张希钦，时任一兵团参谋长；曾，即曾涤，时任一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彭，即彭德怀，时任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甘，即甘泗琪，时任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到光明，由受压迫到得到解放。各地人民赶送羊慰劳，如不接收则嫌解放军看不起。

(二) 我们入疆看到新疆起义部队有三种不同表现：一种是解放军未到前反动分子组织和煽动国民党军队放火，如哈密城全遭抢劫，烧了50家，227间房子，但解放军到后停止了这种现象；一种是解放军正到时反动分子组织煽动国民党军队杀人、放火、抢劫。如鄯善国民党军队六五旅、六九四团三营打死欢迎解放军的县长和一群众，该营放火烧了两间房子，抢劫街市一小时半并在城北杨家抢劫，并企图阻止解放军前进；一种是自起义后，始终维持地方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者，如镇西一七八旅之王传铎处。前两种部队人民极端愤恨，要求解放军把他赶出新疆去(哈密)，严厉地惩办他(鄯善)。后一种首先人民表示了欢迎。我们对于这三种不同表现的部队采取不同的方针和态度，对待第一种部队我们欢迎他们起义，反对他们抢劫和放火，因解放军到后他们停止了抢劫行为，表示了欢迎解放军并承认了自己有不可回避的责任，故我们执行团结的方针，同时不放松追查抢烧事件和进行必要的斗争，以保护人民利益。对于第二种部队，执行坚决镇压的方针，逮捕凶犯，交群众公审和送迪化方面处理，解除罪犯部队的武装，送交其上级处理，打击少数主要罪犯争取教育多数士兵。我们对于第三种部队执行鼓励的方针，表扬其忠实于起义的行动，忠实于维持地方秩序和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

(三) 新疆和平解放之后，哈密、焉耆、景化、绥来、

吐鲁番、鄯善、阿克苏等地连续不断发生抢烧杀事件，证明这不是偶然的个别的事件，而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准备的反革命行动。据我们所了解叶、马、罗等主张与解放军打到底，打不赢时实行抢烧杀三光政策，不让解放军不战而得到新疆，不让新疆毫无破坏地落入解放军之手。叶、马、罗等被迫走后，一批主要特务分子亦随之而走，但留在新疆的特务分子仍然不少。在和平解放之后，仍执行着叶、马、罗等抢、烧、杀政策，因此提高警惕性，不放松战斗的准备，同特务分子、反动分子作斗争，肃清特务分子、反动分子是保证新疆和平解放胜利的重要条件。这是我们入疆之后所得的体验。

（四）新疆民族问题虽然复杂，但有党的正确的民族政策，我们有十足的信心团结新疆各民族，为建设新疆而奋斗。当我们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平等、团结、友爱、互助，宗教自由，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保护少数民族的利益等时，各民族听了之后，都是站了起来，甚至跳了起来的高兴。

（五）部队纪律在群众中有好的称赞，因为一方面国民党军队抢烧杀，另一方面解放军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并追查抢烧杀事件，并发动了节省粮食运动（每人每天节省2两粮食节省一礼拜^①），以及募〔捐〕救济，受害人民群众都很感激。现发现纪律不好的只有十五团一个事务长，为买菜因讲话不懂打了一个维族人，现正找此维人，要该事

① 即一星期。

务长向其赔礼并以此事在部队中进行教育。

郭王顿左^①

18日20时

彭德怀关于二军进军南疆以及迪化各界

欢迎解放军情况致毛泽东电

(1949年10月20日)

毛主席：

(一)新疆陶鲍均来电话电报，友方由伊宁向迪化、哈密运飞机汽油时，当切实保护，希望迅速进军全疆维持秩序。

(二)二军先头师皓^②抵和硕、本(20)日拟进至焉耆、库尔勒集结，待后续部队到达时再向喀什前进。

(三)迪化各界约两三万人至郊外数十里欢迎解放军已第三天了。

彭德怀

20日

① 郭，即郭鹏，时任二军军长；王，即王恩茂，时任二军政委；顿，即顿星云，时任二军副政委；左，即左齐，时任二军参谋长。

② 皓，即19日。

彭德怀关于三区慰劳解放军之粮食须自愿

致中央并转邓力群电

(1949年10月21日)

中央转力群同志：

四师哥^①到焉耆，因汽车损坏太多未赶到库尔勒。装甲团哥15时抵迪化，人民热烈欢迎。

力群19日电马^②晨收到，伊、塔、阿三区人民及军队慰劳之粮食，请注意须完全出于自愿，且不宜过多，目前已有300吨，约合市石3600石，为数亦不算少，该地采购粮食是否困难，原市石值银元几何？盼告。

彭德怀

21日9时

中共中央关于团结民族军等问题致彭德怀电

(1949年10月23日)

德怀同志并告西北局：

(一) 出席人民政协的新疆自治区代表赛福鼎(维族)、阿里木江(乌孜别克族)、涂治(汉人)本日乘机飞酒泉，和你谈话后回新疆。

① 哥，即20日。

② 马，即21日。

(二)自治区领袖阿合买提江等五人为出席政协的第一批代表，因飞机在西伯利亚失事不幸牺牲。赛福鼎等3人为第二批代表。赛福鼎为代替阿合买提江的领袖人物，曾留学莫斯科，做过新疆省政府的教育厅长。据我们了解，此人是好的，此次已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他现申请入党，我们认为是可以的。关于在新疆各民族中建立共产党及推广外围团体的问题，另电通知。

(三)关于民族军(14000人)与人民解放军配合工作问题，我们已与赛福鼎谈过。我们认为民族军是较有训练的维吾尔族的人民军队，在过去数年中以自己的革命行动箝制了国民党反动派军队10万人，对于中国革命起了相当大的配合作用。维吾尔族人口300余万，为新疆的主要民族，过去反动派压迫新疆人民主要地就是压迫维吾尔族。现在人民解放军入疆，维吾尔族及各族人民表示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只有和维吾尔族(以及其他民族)建立兄弟般的关系，才有可能建设人民民主的新疆。因此，14000人的民族军，应使之和人民解放军一道，分布全疆各地，作为人民解放军联系维吾尔族、吉尔吉斯族、蒙古族等民族的桥梁，进行民众工作，建立人民政权，建立地方武装和建立党的组织。此事如何具体进行，请与赛福鼎进行初步商谈。尔后，由分局逐步解决。

中央

10月23日

王震关于二军向南疆进军部署
致郭鹏、王恩茂并报彭德怀、张宗逊电

(1949年10月24日)

郭、王并报彭、张^①：

一、焉耆、库尔勒、尉犁驻六师师部及两个团，附工兵团及军属一个医院，一个团分驻库车、阿克苏，骑兵团驻若羌，这是肯定的部署。

二、军部率四、五两师进驻喀什，五师以一个团进驻和田，或该师全部到叶城、和田、玉田。请你们到喀什后研究军事、政治、经济（给养）、生产等条件，由你们决定。

三、你们在执行向南疆进军的光荣历史任务中将与苏联红军边防军握手，四、五两师派去的边防守卫英雄们把红旗插在祖国遥远边疆的帕米尔高原和昆仑山上去，作为伟大的1950年的元旦，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同志和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同志的致敬。

四、你们在进军中已经证明，坚决执行中共中央政策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纪律良好，获得各族人民欢迎，且正确运用斗争策略，解决了鄯善事件。望在劳苦的征途中继续深入学习二中全会决议《论人民民主专政》和共同纲领，以展开“五爱”群众运动，并讨论准备明年的“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群众力量群众享受”的农业大生产运动，这

^① 此句为编者所加。

是团结新疆人民、团结和改造起义部队的重要关键，是建立国营、工业、农业和军人合作社等经济建设事业，与全体军人的建家立业的前提，上述问题建议你们准备在喀什开军的党代表会议作出各项简明决议，报告分局，各师则可开军人代表大会。

五、你们到焉耆及徒步行军到阿克苏，由阿克苏再车运喀什及和田。野司已获伊犁当局电告，可送 200 吨汽油，20 吨机油，汽车 40 辆的援助，我们电请到喀什接你们。

六、六军一个师及兵直准备 11 月份空运迪化，其余车运北疆各地，向你们提出的问题及六军在北疆的任务均已在六军干部会议上提出。

上述问题你们有何意见，请军党委研究电告我们。

王震 徐立清 张希钦 曾 涤

酉敬^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和新疆同胞 见面的几句话

(1949 年 11 月 14 日)

新疆起义将领、各界同胞们：

中国人民解放军今日首次在迪化与大家见面，谨向各界同胞及起义将士致亲切的慰问与敬意。

本军是属于中国人民自己的武装，是中国无产阶级及

^① 酉敬，即 10 月 24 日。

其先锋队——共产党所领导的，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柱石，是以保卫中国独立和领土及保卫中国人民革命的成果与合法权益为自己的责任。全体入疆部队坚决做到：结成人民革命的统一战线，将革命进行到底，共同为建设和平、民主、幸福与各民族互助互爱的友谊团结的新新疆而奋斗。对于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的武装部队表示热烈欢迎与欣慰。我们要互相亲密合作，并按照人民政协共同纲领所规定的军事制度，帮助整训为人民解放军，进行革命政治工作，改变作风，力求进步，携手前进。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部，有 14 个民族，将近 500 万人民的新疆省，与伟大强盛的苏联和蒙古共和国相毗连，关内的人民解放军与新疆英勇斗争的弟兄们的汇合，这是标志着中国大革命的胜利。让我们一切革命力量携起手来吧！我们高呼：

庆祝新疆和平解放！

新疆人民解放万岁！

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万岁！

中苏友好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朱总司令万岁！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政治部

11 月 14 日

新疆分局关于新疆成立三个区党委和军区

致西北局并转中央电

(1949年12月12日)

西北局并中央：

(一) 伊犁军与陶军仇视敌对情绪严重。自宣布陶成立兵团后，陶表示满意，高级军官情绪已趋依归，并已要求起义军靠拢解放军，集中驻扎整训，以利专事生产，不参与地方事务，避免磨擦。

(二) 为巩固地方秩序，肃清土匪，防止叛乱，团结民族军和新盟干部进行地方工作，协助地方政府改组，因此分局会议决定新疆分局和军区下之十个专署，成立迪化（包括哈密、焉耆、迪化）、伊犁（伊、阿、塔）、喀什（喀什、阿克苏、和田、莎车）三个区党委和军区。二军兼喀什军区，六军兼迪化军区，均由民族军干部担任副司令员。伊犁军区由民族军军部兼任之，军党委各兼区党委。听陈请示。

分局

12月12日

鲍尔汉等关于新疆省人民政府
宣告成立致中央人民政府电

(1949年12月22日)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政治法律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政务院属各部、会、院、署：

鲍尔汉等遵照政务院16日第十一次例会通过的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省委会及兼职名单于17日先行就职，新疆省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开始办公，谨闻。

新疆省人民政府主席 鲍尔汉

副主席 高锦纯、赛福鼎暨全体省委

12月22日

第三野战军的渡江作战

张 震

淮海战役胜利后，我二野、三野百万大军前出于长江北岸，威胁国民党江南基本统治区。其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区——南京、上海，已经直接暴露在我军强大攻势之下。

(一)

渡江南进是我军最高统帅部长期以来周密擘画的战略企图。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最终实现这一企图的时机才完全成熟。

早在解放战争爆发之初，面对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我军曾确定敌进我进、外线出击、逐步向南、进逼长江的战略计划。后来，由于客观情况的变化，转入外线作战的设想数度推迟。经过一年的自卫战争，在内线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之后，1947年夏秋之间，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出击鲁西南，并于7月23日提出：刘邓大军“直出大别山，”“建立根据

地”，另以“叶、陶^①两纵队出闽浙赣，创造闽浙赣根据地”。此后，在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陈粟、陈谢两军^②与之互为犄角，密切协同，经略中原之时，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又于1948年初提出由粟裕同志率华野外线兵团分两批渡江，创建并发展东南战略根据地的重大决策。上述战略计划的基本意图，就在于逐步将战争推移至蒋管区，以减轻我根据地连年战争的负担，同时以强有力的军事行动，威胁敌之腹心重地，扭转敌攻我守的局面，夺取人民革命战争的战略主动权。但由于敌强我弱的战略形势当时尚未根本改变，南渡长江的时机尚不成熟，因此，在1948年9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最高统帅部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以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重兵集团，为尔后的渡江作战、解放全中国创造条件。

1948年10月11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电报中再次提出渡江作战的大体构想。要求我们华东野战军“以十一、十二两月完成淮海战役”（当时的战役目的仅仅是歼灭黄伯韬和海州、两淮地区之敌），然后仍分为东西两兵团。东兵团（以大约五个纵队组成）在苏北、苏中作战，其余主力为西兵团，出豫皖两省。还指示我们于明年一月休整，二月西兵团转移至中原，“三至七月同刘邓协力作战，将敌打至江边各点固守。秋季你

① 指以叶飞为司令员的华野第一纵队和以陶勇为司令员的华野第四纵队。

② 指分别由陈毅、粟裕指挥和由陈赓、谢富治指挥的两支野战部队。

们主力大约可以举行渡江作战。”

随着我军在南北两线各个战场上的胜利，渡江南进的条件日趋完备。中央军委于1948年12月12日电示淮海前线总前委，提出准备在1949年5月或6月举行渡江作战的大体设想，并要求召开一次总前委会议加以商讨。12月下旬，刘伯承、陈毅同志赴中央开会，具体研究确定了渡江作战问题。

1949年元旦，毛泽东主席在《新年献词》中正式向全党全军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同时指出：“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明确提出了“一九四九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战略任务。接着，中共中央1月8日政治局会议对于目前形势与我党1949年任务的决议中再次提出：“一九四九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当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省的大部，其中有的省则是全部。”要求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战役以后，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中央军委命令中野、华野在结束淮海战役后，以两个半月时间分五期（从1月15日起至3月31日止）进行整训，“并完成渡江作战诸项准备工作，待命出动”。

遵照党中央、中央军委上述指示，我华东野战军在胜利结束淮海战役之后，迅速转入整训，加紧渡江南进的各项准备工作。华野前委于1月19日至26日在徐州东北贾

汪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听取了陈毅司令员关于1月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的传达报告，对党中央关于目前形势的六条结论和1949年度的十七项任务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粟裕副司令员代表华野前委在会上作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与华野全军1949年六大工作任务的报告，其第一项任务就是：“在全国作战总任务下，与兄弟兵团密切协同，坚决与完满地完成1949年我军的作战任务，将革命进行到底”。粟裕同志特别强调，部队整训的目的就是为了过江。因为南进最困难的一关是渡江，我们两个半月的休整，就是为了打过长江去，一切是为了如何渡过长江。因此，能不能顺利地打过长江，决定于此次休整的好坏。他还说，过江不能光凭勇敢，还有许多技术问题、思想问题和物质准备问题，要反对“歇一歇”的思想，树立远离大后方作战的观念。陈毅司令员从对形势的分析、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问题、任务问题、编制问题、政策与纪律问题、参谋工作、后勤工作、减租减息、以及会议传达等九个方面为会议作了总结，前委扩大会议经过讨论，作出了关于拥护《中央元月八日政治局会议对于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决议》的决议。

前委会议精神在各部队进行了传达贯彻。各单位一是针对部队现实思想情况，深入开展了“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中心的形势任务教育和阶级教育，党的各项新区政策和城市政策纪律教育，以及与江南地方党和游击队会师的教育等。二是对预定渡江地段实施大规模的战役战术侦察，在江南地方党和游击队配合下，展开全面的侦察活动，初步

查清了敌兵力分布、工事构筑和沿江两岸地形情况，掌握了长江水情，为部队拟定渡江登陆计划提供了依据。三是针对渡江作战这一新课题，开展以横渡长江作战为重点的技术、战术和协同训练。四是筹集船只，训练水手。根据分散筹集、统一分配、集中训练的原则，团以上单位成立船舶管理机构，协同地方党政机关筹集船只，动员船工、渔民随军参战。编组突击、火力、运输三种船队，进行训练，并构筑船舶隐蔽场所，防敌轰炸破坏。五是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开展规模巨大的支前工作。修复公路、铁路、架设长途电话线，进行大规模的疏河开坝等工程保障，并集中大量粮草军需，组织船只，车辆和民工的庞大运输队伍，以保证我军渡江作战的需要。

贾汪会议后，华野全军按照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和番号的规定，进行了整编。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辖第7、第8、第9、第10四个兵团。第7兵团以王建安为司令员，谭启龙、姬鹏飞分任正副政治委员，辖第21、第22、第23、第35军。第8兵团以陈士榘为司令员，袁仲贤、江渭清分任正副政治委员，辖第24、第25、第26、第34军。第9兵团以宋时轮为司令员，郭化若为政治委员，辖第20、第27、第30、第33军。第10兵团以叶飞为司令员，韦国清为政治委员，辖第28、第29、第31军、两广纵队。陈士榘参谋长调第8兵团工作后，我由华野副参谋长接任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唐亮、钟期光仍任野战军政治部正、副主任。刘瑞龙副参谋长改任后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军区与华野特种兵纵队番号不变。华东军区机关

南下后，在山东另组山东军区，以胶东军区新5、新6师组成第32军。在整编中，我们特别强调了加强团结，加强纪律性，展开了反对本位主义的教育。第三野战军整编任务的顺利完成，使我三野全军的正规化建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从体制编制上保证了尔后渡江作战的顺利进行。

(二)

2月4日中午，粟裕同志告我：中央在2月3日关于渡江问题的指示电报中认为，“国民党有在京沪线组织抵抗及放弃该线将主力撤至浙赣路一带之两种可能”，而目前“第二种可能性业已增加，即是说用解决北平问题的方法，和平地解决南京、芜湖、镇江、苏州、无锡、杭州、上海等处的可能性业已增加，我们应当针对这两种可能情况，准备两种对付方法。”如果“国民党仍然采取在京沪线组织坚决抵抗的方针，”则按原定计划，“休整至三月底为止，准备四月渡江，五、六两月夺取宁、镇、锡、苏、杭、芜诸城”。如果国民党改取弃守南京等城，“而将主力撤至浙赣线布防，则我们应作提早一个月行动的准备”，“休整至二月底为止，准备三月即行渡江，于占领镇江、芜湖之后，即去占领南京”，然后“逐步地去占领苏、杭”，部队“可于占领南京后再行休整”。据此，我们立即向各兵团发出《关于渡江侦察工作问题》的指示，规定了各兵团的侦察区域，明确了侦察的主要任务，提出了具体要求和注意事项，并令各兵团按此即行派出侦察。并将此情况于当日报告了中央军委。

2月5日晨，由司令部情报股重新整理标绘敌江防示意图，展开各种作战资料的准备工作。从2月6日开始，我与刘瑞龙等同志一起在作战室反复研究了渡江作战的具体问题。一是根据各单位派出侦察后所掌握的最新敌情资料，基本弄清了敌江防整个部署情况。其中，敌京沪杭警备总部汤恩伯所属24个军45万人，布防在上海至湖口段沿江地区及浙赣线以北地区。第一线部队共18个军。即：淞沪警备司令部所属第37、第52、第72军防御金山卫、吴淞口至白茆口段；第1绥靖区所属第4、第21、第51、第123军防御白茆口至镇江段；第54军位丹阳、武进地区为预备队；第6兵团及首都卫戍总部所属第28、第45、第99军防御镇江以西之桥头镇至马鞍山段，重点置于南京及两浦（浦口、浦镇）地区；第7绥靖区所属第20、第66、第88军防御马鞍山至铜陵段，第17兵团之第106军位泾县、宁国地区为预备队；第8兵团所属第55、第68、第96军防御铜陵至湖口段。上述江防之敌分别以一部兵力控制长江北岸之八圩港、三江营、两浦、裕溪口、枞阳镇、安庆、望江、湖口等据点及若干江心洲。第二线部队共6个军，即第18、第67、第73、第74、第85、第87军等，配置于浙赣线及其以北地区。华中“剿总”白崇禧所属16个军25万人，布防在湖口至巴东段沿江地区。敌海军第2舰队（各种舰艇89艘）位于长江下游，江防舰队（各种舰艇44艘）位于长江中游。飞机300余架分别置于上海、南京、武汉等地，担任支援陆军守备任务。此外，美、英帝国主义的海军舰艇一部，也停泊于上海及长江口，企图伺机对我

军渡江行动进行干扰破坏。

二是具体研究了渡江作战的地理环境条件，主要是对长江天险的特征及其两岸的地质水文情况作到心中有数。我们感到江阴至芜湖段江身向北弯曲，成一大弧形，利于我军实施钳形突击，达成战役合围。平时长江中下游水流平稳，但安庆以东受潮汐影响较大，落潮时近岸边有大小不等的泥滩或沙滩。每年春雨桃汛之际，水位渐涨，水流渐急，但对航渡影响不大。长江两岸多半为土堤，多港汊，利于军队、船只隐蔽和进行水上训练。江内有数量较多的江心洲。下游各省除皖南、苏南有部分山区与丘陵地外，多为水网稻田地，河港湖泊较多，不利于大兵团行动。

三是从我军渡江作战的主要困难入手，运筹对策。我们感到最主要的是：缺乏现代化渡江器材，我军将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对付全部机械化的陆、海、空军联合作战，所以要在部队中广泛开展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中心的形势任务教育，坚定全体指战员敢打必胜的信心；部队广大指战员多属北方籍，不习水性，组织指挥大兵团强渡江河作战经验缺乏，必须有针对性地加强部队关于航渡组织、登陆突破、步炮协同以及水上射击、救护、游泳、划船等战术技术训练；新解放区和江南新区基础尚弱，后勤给养特别是粮食补充困难，需要作好充分的物资准备，制定周密的战役后勤部署。此外，为了更好地发挥各部队的特长，我们还建议将熟悉苏南情况的第23军和第20军由第7、第9兵团分别调归第10、第8兵团指挥，将熟悉苏浙边区和皖南情况的第24军和第25军由第8兵团分别调

归第7、第9兵团指挥。

2月8日，粟裕副司令员、谭震林副政委等去总前委参加会议，研究贯彻中央2月3日电报指示精神，具体商定渡江作战部署。总前委会议讨论决定了如下内容：（1）确定了渡江作战时间。即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因为敌人正在固守沿江一线和京沪杭诸点，或将主力撤至浙赣路沿线两策之间徘徊，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上讲，都有提前渡江的必要，也是一个难逢的战机。从自然天候上看，3月底4月初长江水少，雨季未到，也便于渡江。当然，由于时间提前，一些准备工作可能比较仓促。但只要加紧准备，是完全有可能和有把握的。（2）明确了渡江战役部署。确定以三野4个兵团和二野1个兵团为第一梯队，三野4个兵团分别在江阴、扬州段；南京东西段；芜湖东西段；铜陵、贵池段展开；二野1个兵团在安庆东西段展开。二野另两个兵团除以1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佯动外，其余5个军作为总预备队；主要突破地段选择在芜湖、安庆段。（3）关于各部队开进问题。因三野两个兵团已在两淮及蚌埠以南，其余两个兵团尚在宿县东西地区，所以，拟先移一个兵团至合肥，另一个兵团于3月半出动，以半月行程到达江边。三野指挥机关拟于3月初移合肥。二野各部因路程较远，拟于3月初移至潢川、固始、六安之线，休整数日后，即向江边指定位置开进。二野指挥机关拟于3月初移六安。此外，为保证渡江作战的顺利进行，总前委还建议立即成立安徽省委或以豫皖苏分局移至合肥，以统一组织领导原江淮、皖西、豫皖苏等解放区的力量，支援渡

江作战。并建议第四野战军以 3 个军约 20 万人迅速南下，于 3 月底进至武汉附近，牵制白崇禧部，以保障二野、三野的渡江行动。

中央军委于 2 月 11 日复电总前委和华东局：“同意你们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为便于统一领导，协调行动，中共中央还决定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四同志参加华东局。并要求立即召开一次华东局会议具体研究渡江作战诸问题，以及统一江淮、皖西和豫皖苏地区的领导关系问题。中央还重新明确：“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与总前委均直属中央。”

2 月 18 日至 21 日，三野前委于贾汪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 2 月 8 日关于“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电报指示，研究如何顺利完成我党从城市工人运动中产生，尔后走到农村，经过 20 多年又重新回到城市的根本性转变问题。陈毅司令员做了重要报告。他指出，要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毛主席提出的这一根本转变的精神实质，如果坚持 20 多年来先农村后城市的观点不加改变，跟不上革命飞速发展的形势需要，这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单纯强调动员一切力量放到城市，无限制地取给于农村，不是树立无产阶级的城市观点，而是继承资产阶级的城市观点，同样也是错误的。陈毅同志还强调指出，军队作为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的双重任务，就是说要一面作战、一面建设。人民解放军是打仗打出来的，也是做群众工作做出来的，不能认为现在大规模的战争阶段已

经过去，就产生轻敌麻痹的思想。同时，也要反对把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产生恐美病。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不学习城市政策，忽视城市建设的偏向，也要反对只强调工作队，借此脱离军队的个人主义愿望。他说，今天军事的重要性并未减轻，不能因为胜利冲昏了我们的头脑，要把美帝国主义占领我沿海城市列入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我军的作战任务并未完结，许多敌人要我们去消灭，许多地方要我们去占领。作为军队来讲，第一位的问题是要把仗打好。即使全国胜利了，我们还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正规军，并准备击退任何帝国主义的进攻，还要防止敌人和我们打游击，所以，任何时候都不能减弱军队的重要性，而是要加重军队工作的任务。陈司令员的讲话，使与会同志更加明确了人民解放军作为一个战斗队的根本职能，以及立足于用战斗方式渡江是全军的基本任务。2月20日，在会议即将结束之际，第三野战军正式下达了京沪杭战役预备命令。

前委扩大会议结束后，陈毅等同志赴中央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粟裕同志原定一同前往，但因长期指挥作战，极度劳累，头疼病复发，遂请假改赴济南作短期休养。由我和唐亮、刘瑞龙同志主持召开了三野参谋长会议，具体研究了加强司令部工作、渡江物质准备、战备训练和部队正规化建设问题。

(三)

2月底3月初，我三野部队按预定计划沿津浦路两侧南下，先后进抵长江北岸。第7兵团进至庐江地区，第9兵

团进至无为、含山地区，第8兵团进至扬州、仪征地区，第10兵团进至靖江、泰兴地区。按照中央军委指示，为密切配合当时进行的和平谈判，同时为渡江作战创造条件，各兵团均派出部分部队对妨碍我军渡江准备的敌江北桥头堡据点达成包围封锁，并以炮火控制江面；积极打击敌人舰艇的活动，有效地控制渡口、船只，开辟渡江交通要道，保障大部队迫近江岸，全面展开渡江之前的各项准备。

在我军兵临长江之际，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也即将开始，中央军委要求我军作好先行攻占浦口并炮击南京的准备。3月1日，杰粟同志在赴济休养临行前，召集唐亮、钟期光同志和我商定了具体攻击部署。我即组织司令部拟定了攻占浦口、炮击南京的作战预案，各兵团均依据野战军预定决心起草了作战预备命令。3月6日，中央军委决定，渡江作战时间推迟一周。陈毅司令员、饶漱石政委也给我们发来电报，要求我们按军委推迟渡江时间的决定充分作好准备工作。3月14日，我们下达了关于肃清江北桥头堡作战的指示。3月17日，中央军委又来电告诉我们：“渡江战斗之确定日期为四月十日。”并提出“攻占浦口浦镇的准确时间，必须由中央临机决定。至于浦口浦镇以外沿江各点之攻占，则由你们自己规定攻击时间。”据此，我们确定了攻占浦口、炮击南京和肃清江北桥头堡的作战部署。同时，考虑到为保持尔后渡江作战的突然性，我们特向中央军委建议，攻击浦口作战推迟至4月1日开始，以便与4月10日的渡江作战相衔接。

中央军委十分尊重前线指挥员的意见，于3月20日复

电：攻占两浦如非渡江所必要，则以一个兵团监视该敌。江北岸据点4月2日开始攻击，4月5日或6日完成此项任务，再以一周时间开辟港口并布置船只，如此，则全军可于4月13日或14日开始渡江。并征询我们“如何盼复”。我们随即按照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加紧准备，调整部署，并决定三野指挥机关向南开进。出发之前，三野前委召开会议，听取陈毅司令员关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传达报告，大家对于毛泽东主席报告中讲的：“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的光辉论断，以及用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解决残余国民党军的战略思想，倍感英明正确，进一步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认识，提高了我们以中央的方针、政策指导渡江战役的自觉性。

3月23日夜，三野指挥机关按照预定部署，转移至蚌埠以南孙家圩子。3月25日，总前委邓小平、陈毅同志在这里召集了三野兵团负责同志会议，听取了我对第三野战军渡江准备工作的汇报，具体研究了渡江作战的部署问题。邓政委告诉我们，第二野战军第3、第4、第5兵团已于3月5日起，从阜阳、漯河、沈丘等地出发，向长江北岸挺进，4月初可分别进至枞阳镇以北（第3兵团），高河埠以南（第5兵团），望江、宿松（第4兵团）地区。为配合二野、三野渡江，中央军委已令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第40军、第43军分别由马驹桥、马头镇地区南下，大致于4月初可进抵湖北浠水及汉口以北地区。邓政委还提出，拟以第3兵团附第15、第16军肃清枞阳镇至望江段，攻击目标

首先指向安庆。该部先头已距安庆 20 余里。白崇禧为保守武汉，已将安庆之第 46 军西撤，第 7 军、第 48 军集结于平汉线。汤、白之间的矛盾可供我们利用。为统一协同动作，四野两个军归二野指挥，并以主力出宣化店。力争以两个师兵力在 4 月 10 日前出现在宣化店，吸引白崇禧部主力，以配合二野、三野渡江。同时，总前委陈毅、邓小平、谭震林同志还提出，中央军委原定 4 月 13 日渡江之时，正是阴历十六，月光通宵，不利于求得攻击的突然性，因此，主张推迟到 4 月 15 日黄昏渡江。这样，我们对总前委的整个渡江作战部署及考虑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3 月 26 日，会议继续召开，大家听取了谭震林同志关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传达报告。会上，我们与各兵团负责同志研究了作战部署问题。大家感到，在我百万大军直逼长江，拥有战略战役主动权的情况下，可采取宽大正面同时展开强渡与有重点的突击相结合的打法，使敌防不胜防，以保证一举渡江成功。我们还向各部明确：4 月 15 日黄昏发起渡江；对于敌江北桥头堡，凡对我准备工作及渡江无大妨碍者则不攻击，凡对我准备无妨碍但对渡江有碍而又容易拔除者，则在渡江先一日或数日拔除之，凡对我准备及渡江妨碍甚大者，则视情况于 4 月 2 日或 2 日以后立即拔除；此外，还决定不攻浦口、浦镇；将第 26 军东移，加强东集团兵力；留第 34、35 军在两浦正面积极佯动牵制敌人。总前委首长批准了我们的意见，并于 3 月 26 日电告中央军委。3 月 27 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十五日发起渡江及对敌江北据点的处置。”

正当会议进行中，我们接到报告，国民党首都警卫师师长王宴清率部起义，但为敌发现，仅少数人员乘船抵北岸。王宴清师长到野司后，我接见了，并进一步了解了南京周围地区的敌军部署，以及南京市区内的情况。3月27日，我们继续研究作战部署问题，并听取谭震林同志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报告。

3月28日，粟裕副司令员返回野司，我把整个部队的作战部署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傍晚，我们再次研究作战方案，最后确定野直东移泰州附近地区，加强东集团渡江方向的指挥，将主渡方向选择于苏中地区，以求迅速遮断宁沪交通，切断南京周围敌之退路。随后，我召集司令部各处长研究了野直东移与指挥所组成诸问题，指定专人分工负责，组织拟制行军计划与汽车分配等。3月31日晨，根据粟裕同志指示，我将整个作战部署拟成电文致二野并报中央军委。

3月31日，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同志在广泛听取各野战军情况报告基础上，统筹全局，最终确定了渡江作战的决心部署。当时，小平同志要陈毅同志拟草作战计划，陈毅同志遂告我起草一份包括两大野战军行动的渡江作战命令。我拟草后交陈毅同志转呈小平同志审阅。邓政委指示对大兵团指挥不能太具体，主要是说明战役企图、可能预案等即可，随即小平同志亲自草拟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战役纲要，即《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4月1日午前，小平同志召集我们逐段讨论了这一纲要，上报中央军委并下发各野战军兵团以上单位。中央军委很快于4月3日批准了

这一战役纲要。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全文共八个部分：第一，敌情。第二，我军战役目的，发起战役时限。第三，我军渡江后，敌军可能的变化（四种变化）。第四，我军的作战纲领（共七项）。其中，规定了各阶段（分三个阶段）任务，要求战役准备应围绕主要方案进行，指出无论出现何种情况，割裂敌人各个歼灭是关键。第五，第一阶段作战部署。要求我军分为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其中，第三野战军组成东、中两集团，粟裕同志和我负责东集团（第8、第10兵团）；谭震林同志负责中集团（第7、第9兵团），并确定以上两路（四个兵团）归粟裕同志和我统一指挥。第二野战军（第3、第4、第5兵团）则组成西集团。第六，指挥与联络问题。第七，各种保障（由各野战军自定）。第八，基本纲要未尽事宜，随战役发展另以命令规定。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是周密计划战役，进行宏观决策的典范，为渡江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纲要充分体现了我军渡江战役目的的坚决性。规定我军要歼灭沿江与浙赣线之敌全部或大部，迅速夺占苏南、皖南及浙江全部。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战役纵深达500余公里。为此，纲要确定了我百万大军强渡长江的战役布势。以第二、第三野战军组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在总前委统一指挥下，在张黄港至望江段实施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求歼沿江防御之敌，突破长江天险。另以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归第二野战军指挥，位于武汉正面，在鄂豫、桐柏、江汉各军区部队配合

下，箝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作战。

纲要对我军渡江后敌情可能发生的变化进行了细致分析，保证了战役计划的周密性。纲要分析指出了在我军渡江后敌情的几种变化可能性，即：（1）收缩兵力于京、沪、杭三角地区和南京、芜湖地区，控制南京、上海、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诸要点，并企图于我东西两军相距甚远之际，集结兵力与我突进至京沪线上之东线兵团实行决战；而以芜湖以西各部退至浙赣线上，以保障其退路。（2）向后撤收一线，在无锡、南京、芜湖及其以南地带布置防线，利用浙赣铁路，迅速转运兵力控制浙赣沿线，确保南京、芜湖两要点，并求割裂我东西两军之联系。然后再视情况，或在京沪杭三角地区与我决战，或退至浙赣线上与我决战，或沿浙赣线作战略之撤退。（3）主动放弃武进、镇江、南京、芜湖地段，沿江各敌全线向南退集浙赣线上和无锡、上海、杭州沿海地带，以便利用铁道和海口，作顽强之抵抗，或作有秩序之撤退。（4）在情况不利于撤退时，分别固守京、沪、杭诸点，以图顽抗。纲要还针对上述可能情况，分别提出了相应的行动预案，并强调指出：“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之变化，并有可能演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要求我军应从最困难的情况出发，以准备敌乘我三个突击集团相距甚远之际，与我决战为基本出发点。为此，我第三野战军两集团渡江后，应并力对进，力求迅速会合，集结力量割裂包围敌人；第二野战军渡江后以主力出浙赣路，在断敌东西转用兵力的通道同时，以一部兵力迅速东进，逐一接替

第三野战军攻歼芜湖、南京之敌的任务。

纲要既从大处着眼，提挈全军，又不统得过死，充分体现了战役计划的灵活性。在赋予各野战军、兵团任务时，指出各部可根据情况的具体变化机断专行。一些具体的打法及各项保障均由各野战军、兵团自定，指挥责任明确，保证了各级指挥员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给各级指挥员在作战中根据情况变化实施临机处置留有充分余地。《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是渡江作战的纲领性文件，纲要所确定的具体设想，在渡江战役中完全得到了实现。

(四)

4月1日下午，粟裕同志和我率三野指挥机关，经凤阳、临淮关、明光、盱眙、汭涧、天长、扬州、泰州，于4月4日夜抵达泰州东南15里之白马庙。4月6日，我们召集第8、第10两兵团军以上干部会议。首先，由第10兵团参谋长陈庆先汇报该兵团渡江准备工作情况。接着，10兵团叶飞司令员，8兵团陈士榘司令员报告本兵团作战方案。唐亮主任、钟期光副主任和我也讲了话。最后，由粟裕同志作总结报告。他代表三野前委向第8、第10两兵团传达了总前委的基本决心和战役指导思想，明确了由以上两兵团组成的东集团渡江作战的决心和部署，并提出战役发展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和相应对策。粟裕同志认为，在我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渡江后，一是敌可能以南京、芜湖地区的兵力，对付我中集团，阻止其向东发展，同时集中南京至上海之间的兵力，寻求在京沪之间与我军决战。如

是，则要求东集团在渡江成功后，主力控制在江阴、武进、无锡三角地带，下决心在京沪线上打一个恶仗，打上三五天，打出一个好的局面来。这样就要求中集团在渡江成功后，除留足够兵力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外，主力迅速向东发展，与东集团打通联系。二是敌可能将南京、镇江等地之兵力，向杭州、衢州撤退，在浙赣线上组织第二道防线；京沪线之敌向上海收缩，固守上海。如是，则三野先集中兵力协同二野解决浙赣线上之敌，然后再围攻上海守敌，各个击破之。三是我渡江一举成功并迅速突入敌防区纵深，把南京、镇江之敌退路切断，敌人全线溃退，一片混乱。如出现这种情况，则要求东集团只用一部兵力监视上海之敌，主力迅速向吴兴急进，与中集团密切配合，将逃敌围歼于郎溪、广德地区。同时，也要求中集团渡江成功后迅速东进，到达吴兴地区与东集团会师，围歼逃敌。粟裕同志要求全军力争第三种情况的出现，同时，也作好应付第一种情况的准备。

4月8日晚，我们下达了对东集团渡江作战部署的补充命令。确定“我八、十兵团主力，决由扬中、护漕港（江阴东）段强渡。为求主攻方向之强渡顺利，决定八兵团以积极动作箝制镇江、扬中段之敌，而以十兵团附二十三军、特种兵纵队主力于江阴东西地区强渡（前头部队采取偷渡），力求当晚南渡三个军或四个军之大部，务须于当晚控制江阴、武进、无锡三角地区，坚决歼击敌之反击，尔后乘胜扩展，开辟镇江、无锡段南北地区广大战场，以利野战军主力尔后之作战。”这一指示在下达东集团同时，报

告了中央军委和总前委，还通报了谭震林同志和中集团，并要求东集团根据上述决心拟制具体实施计划上报。

4月10日，中央军委发来电报，告诉我们和谈可能于15日左右签定正式协定，和平渡江的可能性增大，因此渡江时间将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同时还询问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有何不利，要我们立即提出意见以便军委决策。前委几个同志都认为，从目前各方面情况看，不宜推迟渡江时间。总前委也坚持认为，如情况许可最好不推迟原定时间，或在20日左右渡江为好。并提出“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的建议。中央军委于4月11日电复总前委并告二野、三野：依谈判进展情况需要，决定将渡江时间由4月15日推迟至4月22日。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我们即令各兵团、各军按重新确定的日期进行战斗准备，并规定各部在4月12日至16日间不得发起任何战斗，以免过早暴露我军攻击企图，给敌军以调整部署的时间。同时，粟裕同志还致电军委，再次申述如情况许可时，不要再推迟至22日以后渡江，以20日前后为好的意见。

4月14日，和谈情况逐步明朗化，中央军委电告我们：谈判决定以4月20日为限期，该日以后我军即须渡江。4月16日，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来电告诉我们：和平协定方案已在今日上午送达南京，如20日不签字则谈判宣告破裂。电文强调“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22日一举渡江成功。”至此，渡江战役的发起时间由开始提前到后来数度推迟，终于最后确定，全军指战员朝夕盼望的伟大的历史性时刻即将到来。

根据中央军委的要求，总前委于4月17日呈报了我军发起渡江战役的具体作战部署，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于4月18日复电：“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按此总计划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并强调指出：“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当日，总前委还电示我们：“整个战役从二十日晚开始后就一直打下去，能先过江就应该先过江，不必等齐”。此外，总前委还估计到东集团渡江后可能面临的严重困难，决定中集团较东、西两集团提前一天渡江，以便吸引敌人并有力地支援东集团作战。

4月19日，我们在白马庙召开东集团渡江作战会议。第8、第10两兵团8个军及野直机关等单位的师以上干部全部到会。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总前委关于渡江作战的命令指示；各兵团首长对作战方案作了简明扼要的报告，并提出了需要议决的事项；粟裕副司令员作了总结讲话，进行了简短有力的作战动员，再次检查了各部队的准备工作情况，最后明确了渡江作战的具体要求。此时此刻，全军上下，群情激奋。大家都抱定一个坚强的信念，就是“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五)

4月20日晚，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

签字。当晚 8 时，我中集团在谭震林同志指挥下，在枞阳镇至裕溪口段，首先发起渡江作战。第一梯队四个军（第 7 兵团之第 21、第 24 军，第 9 兵团之第 25、第 27 军）在我强大炮兵的掩护下，于 9 时许攻占黑沙洲、鲫鱼洲、闻新洲、紫沙洲等江心洲，进逼南岸，迅速突破敌人防线，建立了滩头阵地，并乘胜向敌纵深发展。江防守敌在一片混乱中仓皇南逃。21 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正式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我军在进军令的强劲号角声中，向敌发起猛攻，先后攻占铜陵、顺安、繁昌等地，中央军委也发来电报：“祝贺七、九两兵团渡江胜利”。至 22 日中午，中集团突入敌防御纵深已达 50 公里。23 日，中集团第二梯队各军也全部渡过长江。

在东集团方向，我军于 4 月 21 日 19 时许从三江营、张黄港段发起强大的突击。第 10 兵团第一梯队之第 23、第 28、第 29 军首先在天生港、王师塘、长山等地突破敌江防阵地，登上南岸，连续打退敌人的多次反扑，于 4 月 22 日中午进抵百丈镇、南闸镇、秦皇山、香山之线，建立了正面宽 50 公里、纵深 10 公里的滩头阵地，肃清顽抗之敌，并向西南方向挺进。当日，江阴要塞守敌在我秘密党员策动下宣布起义，我第 29 军迅即占领并控制了要塞及所有炮台。我特纵炮兵封锁了长江，断绝了敌舰东逃的航道。23 日，我军占领武进、丹阳等城，切断了京沪铁路。在此期间，我第 8 兵团之第 20 军，在龙窝口至永安洲段向扬中岛发起突击，22 日占领该岛。23 日，渡过夹江登上南岸，并乘胜向敌纵深发展。是日，第 34、第 35 军从南京正面乘胜

攻占了浦口、浦镇和镇江，并于当晚占领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首都南京。

在我东集团胜利渡江之际，国民党海军第2舰队在林遵司令率领下，于23日下午在南京东北笆斗山江面起义，另一部在镇江附近江面向我投降，还有一小部分逃往上海。另外，英帝国主义悍然派出军舰4艘于20、21日两次驶入我东集团渡江地段，炮击我军阵地。对于帝国主义军舰破坏干扰我军渡江的挑衅行为，我强大炮兵予以有力回击，将其紫石英号击伤，搁浅于镇江附近（后于7月30日午夜逃跑），其余舰只被迫缩回上海。在我军胜利渡江的隆隆炮声中，人民海军的前身——华东军区海军于4月23日在白马庙宣告成立，这一天便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诞生纪念日。

当我中集团渡江成功后，根据敌沿江防御抵抗甚弱的情况，粟裕同志判断，我东、西两集团全面渡江后，定将造成敌全线溃乱的局面，我军应乘登陆胜利之威，迅速展开并插向敌之纵深。这样，不仅可使敌无力重新调整部署，甚至将促使敌全面崩溃，以达成我军分割包围、各个歼敌的有利态势。于是，我们在4月21日致电总前委和中央军委，建议第9兵团渡江后，除以第30军监视芜湖之敌待交二野第4兵团外，主力应即沿南陵、青弋江、宣城、十字铺之线及其以北地区向东北挺进，控制溧阳，截断“京杭国道”，使南京敌人无法向杭州退却，以达成孤立分割敌人、有效地协同东集团作战之目的。该兵团先头部队应于4月25日前进至郎溪及其东北地区。第7兵团攻歼当面之敌

后，应尾第9兵团后沿南陵、宣城、十字铺以南地区急进，力求于4月27日前后进至广德地区待命。第10兵团大部南渡后，第28军出宜兴，第23军出丹阳、金坛，并以一部向溧阳挺进。第8兵团第20军及第26军一部渡过夹江后，向镇江、丹阳间挺进，策应第34军南渡攻占镇江。总前委接到我们的电报后，迅速作出决定，于4月22日、23日连续电示我们：我军主力大部过江，渡江任务业已完成。今后应力争迅速完成东西打通联系，割裂敌人，截断浙赣路。并同意谭震林同志率中集团迅速东进策应东集团行动。为便于渡江后的统一行动，总前委还重新明确第7、第9兵团直归粟裕同志指挥；同时确定南京城防改由第8兵团担任，二野第4兵团改出浙赣线。

战机稍纵即逝，我们此间的指挥重心已大部转移到怎样追歼逃敌上来。4月22日，在收到第7、第9兵团向郎溪、广德地区进军的部署电报后，我们认为还应加速该兵团的行程，即令第9兵团率先头第25军、第27军，以急行军经青弋江、宣城向郎溪、溧阳挺进，不为小敌所阻惑。令第7兵团迅速将攻击箭头转向南陵以东宣城方向，在第9兵团右侧后成梯次队形前进。令第10兵团第28军兼程南进，攻占宜兴。第31军尾28军后跟进，在第28军继续向长兴推进时控制宜兴。第23军由溧湖与长荡湖之间急进，截断溧阳、宜兴间交通，协同第28、第31军合围歼敌。4月23日，我们又连电催令第10兵团第23军“尽可能于明晨赶到金坛及其以南，并继向西南挺进”；第28军应“不顾疲劳于明晨攻占宜兴及其西南，并继向西南挺进，不

得延误”；令进至无锡的第29军“设法乘火轮渡太湖南下，抢占长兴、吴兴，以截断由南京、镇江南逃及由宣城东逃杭州敌之退路”（后因合围达成，改沿沪宁铁路向苏州攻击前进）。令第9兵团第25、第27军“到达宣城后不必向东北，应即沿广德、吴兴公路南北向吴兴急进，以完全封锁敌人之退路，望克服疲劳、迅速猛进、至要至要。”

我军广大指战员在渡江成功的胜利鼓舞下，发扬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昼夜兼程，追击逃敌。4月25日，第28军占领宜兴，第23军占领溧阳，切断了南京至杭州的公路交通。溃逃敌军只得改由宜兴以西的山区向郎溪、广德方向突围。4月26日，我中集团先头部队已进至郎溪、广德地区；第28军亦进占长兴。4月27日，中集团之第27军在吴兴附近与东集团之第28军打通联系，封闭了合围口。南逃之敌第4军、第28军、第45军、第66军及第51军一部10万之众，在太湖西岸郎溪、广德之间山区东逃西窜，乱作一团。4月28日，鉴于逃敌已被我合围的情况，我们对三野全军部署作出调整与区分。决定由宋时轮、郭化若同志统一指挥第9、第10两兵团负责全歼被围之敌，谭震林、王建安等同志率第7兵团速向杭州攻击前进。陈士榘、袁仲贤同志率第8兵团担任南京警备任务。

4月29日，我第9、第10兵团实施多路向心突击，被围之敌全部被歼。我们向中央军委、总前委报告了这一胜利消息，同时令第9、第10兵团负责继续清剿残敌，并对我军下一阶段的作战部署作了具体规定。一是明确了各部归还原建制问题。并令第26军归三野司令部直接指挥，沿

武进、无锡、常熟之线向上海攻击前进；二是将第9、第10两兵团集结于太湖南北地区，准备攻击上海。三是令第7兵团经广德、吴兴之线以南地区向杭州进击，并强调了夺取钱塘江大桥之极端重要性，要保证不为敌人撤退时所破坏。中央军委于4月30日复电我们并告总前委：“（1）歼灭诸敌甚慰。（2）部署甚妥。如你们能于一星期内完成此项部署，并完成对于攻占上海的政治准备工作与军事准备工作，则你们可以立于主动地位。（3）总前委除直接领导南京工作外，请迅速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的准备工作，以便在一星期以后，假如汤恩伯从上海逃跑时，你们能够主动地有秩序地接收上海。”

在我围歼郎溪、广德地区之敌同时，第7兵团在谭震林、王建安等同志指挥下，于4月28日占领宁国，5月1日占领孝丰，5月2日占领余杭，5月3日，先头第21军乘胜进占杭州。由于我军行动迅速，敌人来不及爆炸钱塘江大桥便为我军歼灭。杭州的攻占，形成我军会攻上海的有利态势，并确保了我军继续向南、向西南进军的通路。5月4日至7日，第二野战军占领了上饶、贵溪、横峰、金华、衢县等地，控制了浙赣线，并于7日与我第7兵团部队胜利会师于诸暨，完全切断了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先后占领孝感、黄陂，威逼武汉，有效地牵制了白崇禧集团。从我第三野战军开始渡江到郎溪、广德追击战结束，我军共计歼敌13.9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950余门，汽车140余辆，舰艇61艘（含起义）。至此，第三野战军

在渡江战役第一、二阶段的任务胜利完成。

(六)

渡江战役第三阶段我们第三野战军的任务，就是攻占上海，歼灭负隅顽抗之敌。

早在淮海战役结束之时，敌人就以抗战爆发前上海原有的工事为基础，开始了整个上海地区防御工事的构筑。由于我军迅速扩大了渡江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军兵败如山倒，士气低落，再加器材不足等方面的原因，所以，工程进展迟缓。直到我军兵临上海城下，仍然未能完成整个防御体系，但其主阵地防御工事已经十分坚固。4月26日，蒋介石还亲自乘舰到吴淞口召开军事会议，研究部署上海防御问题，企图凭借上海丰富的资财和已经完成的4000多个永备工事作困兽之斗，以争取时间，抓紧抢运物资，并准备大肆破坏该市，阴谋挑起国际事件，促使帝国主义出兵武装干涉。

上海地区守敌为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部汤恩伯指挥下的残余部队。除第1绥靖区丁治磐率暂编第1军位于崇明岛外，其余8个军25个师连同其它特种部队、勤务部队、保安团队及交警总队等，共计20余万人，军舰30余艘，飞机120余架，密集驻防于上海市及其附近港口、村落地区。其具体部署是：以6个军20个师配属坦克、装甲车各约百辆，防守黄浦江以西地区。以2个军5个师防守黄浦江以东地区。整个防御阵地编成，是以浏河、嘉定、南翔、华漕、七宝、北蔡、川沙之线为警戒阵地，以月浦、杨行、国

际无线电台、刘行、大场、真如、北新泾、虹桥、龙华及浦东之高行、高桥地区为主要防御阵地，并以其右翼月浦至虹桥及其纵深约 3 公里地带为防御重点，借以屏障吴淞及市区，保障其出海通路；在市区则利用火车站、码头、工厂、仓库等高大建筑物，构成要点工事，形成核心阵地。

当时，我随粟裕同志率三野指挥机关已于 4 月 27 日夜由白马庙经江阴转至常州。随着郎溪、广德地区逃敌被我合围后，我们指挥的重心即已转到对上海的进攻上来。

4 月底 5 月初，我军经侦察获悉，上海之敌已运走万余人，很可能提早撤退。中央军委提出，以一个军先行攻占浏河，威胁吴淞，使敌不敢从海上逃走。但总前委和我们均顾虑我军一旦行动，可能促使蒋军迅速撤退，造成我们接收不及，引起上海城市的动乱。于是，总前委于 4 月 30 日向中央军委建议：为作好准备，避免被动，应推迟进占浏河以及进入上海等地的时间。这一建议得到中央军委的采纳。确定我军在 5 月 10 日前不占上海，以便充分准备，待命行动。根据中央军委上述决定，粟裕同志和我们在常州进一步研究了攻占上海的部署以及接收准备问题。

5 月 2 日，粟裕、唐亮同志赴丹阳将我们的大体设想与工作部署向总前委作了汇报。5 月 4 日，三野前委召开接收工作会议。传达学习总前委指示精神，以及研究接收任务的具体区分等问题。5 月 6 日，前委开会布置工作。第 9 兵团及第 26 军的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粟裕同志作了关于淞沪警备问题的报告，我向大家明确了警备任务的区分及注意事项，最后，由唐亮主任作了接收上海政治上、政策纪

律上必须注意的问题的报告。

5月7日，中央军委来电，重申“何时占领上海，仍需依照我方准备工作完成的程度来作决定，最好再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充分完成准备工作。”并令我们“即行部署于5月10日以后、5月15日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口及乍浦海口，断绝敌人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运走。”

根据军委上述指示，结合前委原来设想的方案，我们迅速拟制了攻占上海的整个战役计划，于5月7日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决心集中第9、10两兵团8个军首先扫清上海郊区敌之据点，然后从两翼迂回钳击吴淞口，切断敌人退路，阻止敌人抢运上海物资或提前逃走。待接管工作完成后，如敌继续顽抗，即对市区发起总攻，解放上海。为使城市居民生命财产和公私建筑物尽量不受或少受损失和破坏，我们还规定部队在市区作战时，力争不使用火炮等重武器。

5月8日23时许，我随粟裕同志率指挥机关移至苏州，完成了指挥战役实施的准备工作。9日午后，收到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我们对上海战役之部署。我分别转告第9、10两兵团领导同志，并于5月11日下达了淞沪战役作战命令。

5月12日，我军向上海外围守敌发起进攻。至当夜，北线第10兵团左翼第29军、第28军分别攻占浏河、太仓、嘉定等地。13日后，继续向月浦、杨行、刘行攻击前进，守敌第52军在海、空军支援下，依靠密集的钢筋水泥碉堡

(有的阵地多达七八道工事和障碍)，以炽烈的火网封锁我军攻击道路，并在坦克、装甲车的掩护下，向我连续实施反冲击，争夺十分激烈。15日，敌又增调第21军、第99师加强该地区的防御。我军虽顽强攻击，付出较大的代价，但始终未获大的进展，与守敌形成胶着状态。右翼第26军经过反复争夺，占领昆山，进逼南翔。

南线我第9兵团第20军、第27军、第30军、第31军进展顺利，先后占领了平湖、金山卫、奉贤、南汇及松江、青浦等地，进逼川沙，威胁沪敌侧背。14日，敌被迫由市区抽调第51军至白龙港、林家码头地区，企图阻止我军继续向浦东发展进攻。

根据战况发展，我第10兵团调整了攻击部署，并使用二梯队加入战斗。第9兵团也全力向川沙、高桥地区攻击前进，力求以炮火封锁黄浦江面，迅速达成对上海之敌的钳形合围。5月16日，根据粟裕同志指示，我起草了淞沪作战战术指示下达各部队，要求对敌永久性设防阵地的进攻，必须周密组织，选择其弱点，楔入其纵深，然后从敌侧背或由内向外打；集中火力突击其一点，实行对壕作业接近敌碉堡，以小群动作，轮番实施攻击，以炸药包开路，改变集团式进攻的办法等。我进攻部队也及时总结了前段攻坚战的经验教训，改变战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至22日，我军已先后攻占月浦、刘行、国际无线电台、周浦、川沙、白龙港、高行等地。

在10天的外围作战中，我第10兵团、第9兵团共歼敌第51军、第23军、暂8师等部两万余人，占领了敌人

的外围阵地，部分突入了敌人的主阵地，迫使敌人集中更多的兵力于吴淞口两侧地区，造成我攻取市区，全歼守敌的有利条件。同时，也由于我军避免攻击市区，仅以主力一部从敌人两翼实施突击，地区狭窄，部队不易展开，使敌有可能集中力量坚守上海市区至吴淞通道，我每攻一点，费时较久，消耗较大。市区守敌虽已倾巢出援，但我军受接管准备时间限制，不能乘虚攻占。

有鉴于此，粟裕同志于5月18日向中央军委、总前委建议：如对沪攻击不受时间地区限制，我们准备从四面八方方向市区发起攻击。北线力求楔入吴淞，南线先解决苏州河南与南市区之敌，尔后会攻苏州河北敌人，并询问了接管准备工作是否已经完成。当日，总前委复示：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初步完成，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我们遂于5月19日召开作战会议，第10兵团政委韦国清、参谋长陈庆先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参加了会议。我们商定增调第7兵团之第23军、第8兵团之第25军及特纵炮兵第1团和第3团各两个营及第2团全部，分别加强和配属第9、第10兵团，第24军作好参战准备。当晚，我们接到中央军委来电，指示我们：在上海已被我军包围后，攻城时间不宜拖得太长。如接管准备工作就绪，可于25日前后总攻。并提出：攻击前，必须调齐兵力，充分准备；攻击步骤以先解决上海，后解决吴淞为适当。据此，我们即令第9兵团首先歼灭浦东之敌，尔后以3个军歼灭苏州河南之敌。并令第23军于23日集结于松江。同时，派特纵陈锐霆司令员前往第10兵团部署炮兵火力组织诸问题。21日，

三野司令部根据粟裕同志指示，拟定了如下作战计划：第一步以第9兵团之第30军、第31军和第20军主力迅速攻歼高桥和浦东市区守敌，控制黄浦江东岸阵地，第27军、第23军和第20军一部积极箝制浦西之敌；第二步，第9、10两兵团协力夺取吴淞、宝山及苏州河以南市区，完成对苏州河以北地区敌军之包围；第三步，聚歼退缩于江湾地区之残敌，达成攻占淞沪全区之目的。中央军委于22日复示：“同意21日午电所述之攻沪部署，望即照此执行。”

5月23日，我们查明汤恩伯等已登舰出海，在吴淞口外指挥退却，苏州河以北敌之主力正向吴淞收缩，苏州河以南市区之交警总队亦已北撤，即令各部迅速发起总攻，大胆楔入敌人纵深，截歼逃敌。第29军于当日夜攻占月浦南郊高地，并连续击退敌4次反冲击。24日，第27军占领虹桥及徐家汇车站并攻入市区，第23军也由龙华附近攻入市区，第20军攻占浦东市区，并从高昌庙西渡黄浦江攻入市区。至25日晨，我军全部占领苏州河以南市区，并乘胜向苏州河以北追击。当晚，第30军、第31军攻克高桥，至26日午肃清了浦东地区敌人。同时，第26军攻占大场、江湾，第25军、第29军攻占吴淞、宝山，第28军、第33军攻占杨行等地。5月26日，我们三野前指随粟裕副司令员经南翔于次日晨抵上海。在圣约翰大学成立指挥所。27日下午3时，残留在杨树浦之敌4万余人，在敌京沪杭警备总部副总司令齐昌义率领下向我军投降，上海宣告解放。三野司令部即移至北四川路新亚酒店，尔后又移至四川路原日寇的港口司令部办公，继续指挥部队向浙东、福建地区

进军。在上海战役中，我军共计歼敌 15.3 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 1300 余门，坦克、装甲车 110 余辆，汽车 1100 余辆，舰艇 11 艘及大批军需物资。汤恩伯率第 54 军等约 5 万人先期登轮出海，逃往台湾、定海等地。6 月 2 日，第 25 军解放崇明岛，歼敌 3700 余人。至此，整个京沪杭战役胜利结束。

周恩来是我党我军电讯、机要和情报 工作的创建者和领导者

罗 青 长

周总理一生的丰功伟绩，有口皆碑，而尤以其折冲樽俎之智、赞画辅弼之才受到举世推崇。但他在我党我军电讯、机要和情报工作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所做出的卓越历史贡献却鲜为人知。《周恩来传》（1898—1949）出版后，以翔实的史料，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这很令人欣喜。长期以来，我在叶剑英、杨尚昆、李克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领导下，有幸跟随周恩来从事同这些工作密切相关的对敌隐蔽斗争，其间既有耳闻目睹，又得言传身教，今备述数事于后，谨表怀念之忱，同时也望能引起党史界对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关注。

我党 1927 年八七会议后，革命形势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各地人民举行武装起义，许多地方相继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同各革命根据地以及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络，迫切需要建立和发展自己的电讯事业。

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是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于 1928

年5月开始，从培训干部入手，自力更生，筹措资金，购置器材，研究技术，在艰难中起步的。1930年1月，第一套收发报机终于试制成功，从而沟通了上海中央与香港党组织之间的电讯联络。1931年9月，上海中央同中央革命根据地之间正式无线电通报，这标志着我党我军无线电通讯史揭开了新的一页。随之。在全国各地红军中，普遍建立了无线电通讯工作，有力地配合了革命战争。在此后的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中，周恩来一直卓有成效地领导了这项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我军的电讯事业有了全面的发展。尤其是周恩来亲自部署，在敌占区、国民党统治区建立了数十部秘密电台，遍及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保证了党中央对“第二条战线”的领导。

1947年3月17日，党中央、毛主席撤离延安的前夕，王诤、童小鹏与我奉命连夜去见周副主席。当时，胡宗南部大军压境，延安局势极其紧张。周副主席亲自布置在撤离延安以后党中央同各战略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组织的电讯联络。“陕北广播电台”也是在周副主席关心下，从撤出延安的第二天起即恢复了播音。在中央转战陕北的艰苦日子里，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就是通过红色电波知道党中央的声音，得到指示，上情下达，受到鼓舞。

1947年3月20日，从情报获悉，敌人靠测向机侦察我军电台位置，判断我军行动，这引起周副主席高度重视。他与毛主席立即下令中央电台停止工作3天。3月24日，他又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军委致各野战军负责人电：“蒋敌现有测量电台方向位置的设备”，“但对小电台因电波弱，不

易辨别。因此，愿你们在作战前部署期间及作战中，均不用无线电传达或将司令部原属之大电台移开，改用小电台，转拍至大电台代转，以迷惑敌人”。其后，又指示各部队利用敌人迷信测向设备的心理，将计就计，调动敌人。

在1947年10月的清涧战役中，周副主席命令我野战部队的电台联络实行伪装，使敌人摸不清我军去向。与此同时，我主力部队隐蔽地向清涧集结。攻城战斗打响后，清涧守敌曾三次致电胡宗南紧急求救，被胡一再申斥。因为据测向侦察，胡宗南判定我军主力不在清涧方向。结果敌整编第七十六师被我全歼，生俘师长廖昂。这样同敌人进行巧妙的空中电波斗争，清涧战役是成功的范例。是役，我军缴获了敌人的测向台，并迅即利用被俘人员和机器，建立了我们的测向工作。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敌人从我气象部门频繁发往试验基地的电讯中，察觉到这一震惊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的一些迹象，并准备进行破坏活动。周总理立即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并采取了相应的对策和措施，使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顺利成功。

周恩来一贯重视机要工作。机要工作的核心是密码，而周恩来堪称是我党我军的密码专家。

我党我军机要工作从诞生之日起就镌刻着周恩来的光辉名字。第一本密码称为“豪密”，就是因为它是由周恩来亲自编制，并由他的化名伍豪命名的。1931年3月任弼时将“豪密”带到中央苏区。两地电讯沟通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在上海，任弼时在苏区，亲自担任译电工作。

周恩来一贯主张要坚持干部与技术相结合，加强对机要人员的思想、纪律、保密教育。他经常教育我们：机要工作不能有一点马虎，错了一个字就会出毛病，一秒钟不小心，就会出岔子。所以我们不仅要“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且要“苟秒新，又秒新，秒秒新”。要时刻警惕不懈怠。他还说：密码是门科学，但这门科学要看由谁来掌握。共产党掌握了这门科学就一定要胜利，一定能够发展。国民党虽然掌握了这门科学，但他们还是要失败。因为科学还要加上政治，我们政治上是进步的，国民党是没落的。

1947年10月，在敌我空中隐蔽斗争异常紧张激烈之际，周副主席召集王诤、戴镜元、李质忠、童小鹏和我在陕北佳县神泉堡开会，专门研究了通讯、机要和情报工作问题。在这次会议上，周副主席与任弼时一起亲自缜密研究，制定了正确的密码方针和严格的纪律与保密制度，从而使我们在与国民党进行的秘密斗争较量中立于不败之地。据解放后在南京接收的伪总统府对我党我军密码破译检讨档案证实，敌人始终未破译出我核心密码。这样成功的范例在现代战争史上是罕见的。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身兼党政军领导重任，晝食宵衣，日理万机，但因机要工作事关国家安危，再加上国际间情报斗争愈演愈烈，因此他在百忙之中仍不断垂询，事必躬亲。1965年，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华浪潮，我驻外某些使领馆一度遭到暴徒威胁。中央办公厅和外交部对驻外使领馆都发出通知，要求如果发生不测事件，要在规定时间内

把密码销毁。1966年2月7日，周总理决定亲自检查该通知的落实情况，他要我约请有关部门负责机要工作的同志带密码本到总理办公室。他亲自听取了汇报，检查了密码，并当场要有关同志演习密码的各种销毁办法。结果，除有的密本达到要求外，大部密本的销毁都不理想。他当即严肃地批评：你们机要工作要改进。应该恢复战争年代和秘密工作时期的那种精神。最后，总理指示：一定要根据战备和应变的要求，很快使密码工作革命化。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孙子兵法》云：“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用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周恩来是我党我军情报工作的创始人和卓越领导人，他为这项事业呕心沥血将近半个世纪，其圣智、其仁义、其微妙堪与古今中外任何战略家相媲美。

作为党的最早的情报、保卫工作专业机构的雏形，是于1927年5月在武汉成立的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党中央迁到上海后，又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央特科。1981年11月，陈云曾说：“特科是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党的战斗堡垒。特科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白区党的地下组织。”事实确实如此。1929年，周恩来派遣了以李克农为组长，钱壮飞、胡底为组员的党的特别小组，打入徐恩曾控制的国民党特务首脑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和上海无线电管理局。1931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的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这一紧急绝密情报被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获悉，他立即派人赶赴上海找到

李克农，李及时报告了周恩来。在情况万分危急之际，周恩来与陈云迅速商定对策，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同志的协助下，机智果断地同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抢夺时间的斗争。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终于保卫了党中央的安全，避免了一次后果极端严重的大破坏。最近，台湾的国民党刊物也说，如果当时捕获了周恩来他们，中国的这段历史将重新来写，承认这是国民党反共的一次大失败。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周恩来继续领导和部署了党的情报工作，并使其日臻完善。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准确情报，是周恩来亲自布置打入国民党内部的阎宝航获得的，他当即电告中央并转告苏联。事后斯大林致电毛主席，说这一情报使苏联红军提前24小时进入战备，并对中共中央提供的情报极为感谢。这是周恩来对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重大贡献。

1943年6月18日，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到洛川召开军事会议，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进行反共军事部署。他们阴谋“闪击延安”，一举消灭我首脑机关，夺取陕甘宁边区。这是自“皖南事变”以来国民党策划的又一次新的反共高潮。7月2日，胡密令各部队于7月1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行动。在这关键时刻，1938年在武汉根据周恩来、董必武“深入虎穴”指示打入胡宗南身边担任机要秘书的熊向晖，及时获悉了敌人在西北的军事部署情形，立即报告了组织，使党中央得以采取相应措施。中

央一方面进行了军事部署，一方面在政治上发动宣传攻势，公开揭露蒋介石的阴谋。蒋迫于内外压力，又鉴于其“闪电战”计划的彻底败露，于7月10日下令胡宗南停止军事行动，第三次反共高潮遂被制止。毛主席称赞，在这个时期，凡胡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掌握之中，这是情报工作最成功、最模范的事例。

在以后的工作中，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我党的情报工作得到更加广泛深入的发展。周恩来经常教导我们，我党的情报工作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指导的，经历了长期实践创造，它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情报工作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服务于党的路线，他要求党的情报干部首先应该是一个模范的共产党员。要机智勇敢，遵守纪律；要依靠政治，注意方法效果；要埋头苦干，长期艰苦奋斗；要舍己救人，冒险犯难；要入污泥而不染；并传之后代。

正是因为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我情报工作人员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们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机关内，及时准确地向党中央和军委及各地供给了战略性和动向性的重要军政情报，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重要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重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党中央1949年12月发布的《关于情报工作的决定》中，称我党的情报工作“对取得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毛主席题词“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伟大的历史功绩首先应当归功于周恩来。

创业艰难百战多。周恩来从创建我党我军第一部电台，编制第一本密码，派遣第一个深入敌内的情报小组起，在将近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中，运筹帷幄，毕生为电讯、机要和情报事业的发展壮大倾注了大量心血，直到他病危时还非常关心这方面的工作。敬爱的周总理为了党的事业，真是作到了鞠躬尽瘁！

今天，历史已经跨入90年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但是，国际局势依然动荡不安，反颠覆、反渗透、反和平演变的斗争任务非常艰巨。因此，缅怀周恩来创建和领导我党我军电讯、机要和情报工作的丰功伟绩，重温他的教导，对我们全党全军同志特别是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同志尤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川陕革命根据地综述

温贤美 杨平

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1932年6月，蒋介石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进攻重点首先集中于鄂豫皖根据地。创建这个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主力于1932年10月，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被迫撤离根据地向西转移。

正当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主力沿着鄂豫边境的枣阳、新野、邓县、淅川一线西进，突破陕军扼守的漫川关进入陕西时，四川正处在军阀混战之中。1932年10月爆发的刘湘和刘文辉两大军阀争夺四川霸权的战争，给四川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四川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引下，为反对封建军阀和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曾先后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1932年秋天，川北南江和通江两县的农民还发动了反压迫、反捐税、反饥饿的民变。由于敌人的残酷镇压，上述起义和民变大都失败了，只有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仍在坚持斗争。川陕边的广大劳动人民在军阀和地主豪绅的压迫下，生活在

水深火热之中，因此，1932年12月9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南城固县的小河口地区时，受到当地共产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热情欢迎。12月10日，红四方面军在小河口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在会上，曾中生等对张国焘在向西转移中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和斗争。希望他改正错误，迅速在川陕鄂边建立新的根据地，并要求他把红四方面军今后的行动方针报告党中央。张国焘表面上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心里却耿耿于怀。

小河口会议后，红四方面军准备在汉中、西乡等地建立根据地，但那一带连年旱灾，庄稼歉收，供给困难，回旋余地也小，不宜搞根据地。于是，1932年12月中旬，又继续南进到巴山北麓的西乡县钟家沟地区。这时红军从缴获敌人的报纸上得知，四川军阀正在成都、内江一带进行混战，川北敌人守备空虚。红四方面军总部立即在钟家沟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这是进入川北建立根据地的好时机，遂决定挥师入川。

1932年12月19日，红四方面军4个师共14000余人，冒着寒风大雪，开始翻越“天险巴山”，挺进川北。12月21日，红四方面军主力经过通江北部的两河口向泥溪场推进，占领该地后，即以红十师向通江东北的洪口场前进，向东发展；占领瓦石铺后，又以红七十三师经涪阳坝、平溪坝，向南江发展；红四方面军总部则率红十一师、红十二师直取通江城，再向巴中发展。12月25日，红军解放通江城。接着，1933年1月23日解放巴中，2月1日解放南江。通南巴的解放，为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红军一到通南巴，受到了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党领导的游击队和农民自卫武装也都积极地配合红军作战。曾活动于南江北部桃园寺一带的任玮（炜）章的川北平民军2000余人，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策动下，于1933年1月举行起义，配合红军战斗。这支部队进入根据地，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独立第一师。由任玮（炜）章任师长，张逸（友）民任参谋长，红军派刘杞去任政治委员。

红四方面军为筹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在通江解放后的第五天，即1932年12月29日，就在通江城成立了以旷继勋为主席的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作为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前的最高政权机关。1933年2月7日，在通江城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川陕省委，袁克服任书记。2月17日，又在通江城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又称工农民主政府），熊国炳任主席。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成立，标志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建立。

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即在全苏区范围内领导开展土地革命和建立各级党的组织，并颁布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改革的布告》。这个布告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土地法令的摘要。它规定：“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苦的工农”，“地主豪绅家的耕牛、农具，也应没收来归庄稼人共用或分用”。土地革命大大激发了农民群众的生产革命积极性，根据地出现了一派新气象。但是，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

错误政策，却是当时“左”倾路线的表现之一，对革命事业是很不利的。

在开展土地革命的同时，也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劳动人民第一次得到了翻身解放，当家作主人！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他们踊跃参加红军，积极支援红军进行革命战争。

由于红军不断获得胜利和根据地的日益巩固，国民党和四川军阀十分恐慌。1933年1月27日，蒋介石委任军阀田頌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并拨100万发子弹、20万元军费支援田頌尧“围剿”红军。

田頌尧于2月中旬，指挥所属第二十九军30余团、约4万人的兵力，在刘湘、邓锡侯、杨森、刘存厚等军阀派兵配合下，对川陕根据地发动了“三路围攻”。为了迎战来犯之敌，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以位于南江的红七十三师及位于木门地区的十一师之一部，共同对付敌之左纵队；位于巴中及曾口场、兰草渡地区的红十二师，对付敌之中央纵队和右纵队；另以红十一师之一部坚守通江和巴中之间的得胜山，警戒可能由兰草渡、江口来犯之杨森部队；以红十师部署于通江东北的洪口和竹峪关一线，对付军阀刘存厚部，掩护侧后安全。

2月18日，敌人全线发起攻击。为了诱敌深入，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在逐步收紧阵地的运动战中，节节抗击敌人，消灭其有生力量，待机实行反击。就在这一年的三四月间，红军逐步撤离南江、巴中、通江县城，最后退守通江北部方圆百里的空山坝。5月17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在空山坝召开军事

会议，决定发起反攻，先打冒进到空山坝南面的敌左纵队13个团。5月20日，徐向前指挥红军对敌发起总攻，将敌分割包围，激战3昼夜，至24日，全歼敌7个团，击溃敌6个团，毙伤俘敌官兵共5000余人。红军又乘胜击败敌中央纵队和右纵队，连克通江、南江、巴中3座县城，进逼仪陇、苍溪、广元。至6月15日，红军彻底粉碎了敌人的“三路围攻”，先后共歼敌约万余人，缴枪8000余支，炮50余门。反“三路围攻”后，川陕革命根据地面积扩大一倍以上。军阀田颂尧的部队损失近半，余部退守嘉陵江两岸。

1933年6月底，红四方面军在南江县木门镇（今旺苍县东凡场）召开军事会议，总结反“三路围攻”的经验，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会议决定部队进行扩编和整训，还决定停止在部队中的肃反。会后，红四方面军原有的4个师扩编为4个军，即：十师扩编为第四军，军长王宏坤，政委周纯全；十二师扩编为第九军，军长何畏（抗战中叛变），政委詹才芳；十一师扩编为第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委李先念；七十三师扩编为第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政委张广才。全军共11个师，29个团。从此红四方面军已由入川时的14000多人，发展到4万余人，声威大振。

1933年7月，四川军阀刘湘和刘文辉又爆发了争夺四川霸权的“川中之战”（刘湘称之为“安川之战”），红四方面军为扩大川陕根据地，便利用这次军阀混战之机，从8月到10月，发动了仪（陇）南（部）、营（山）渠（县）、宣（汉）达（县）三次进攻战役。

8月12日，仪南战役开始。红军经过半个月的战斗，共

歼敌田頌尧部 3000 余人，缴枪 1000 余支。解放了仪陇全县，控制了广元、昭化、苍溪、阆中、南部等县的嘉陵江东岸广大地区和陕南宁强县的一部分地区。新解放的南部产盐区，很快恢复了生产，保证了根据地军民的食盐供应。

9 月 22 日夜，红军又发动了营渠战役，到 10 月 5 日结束，历时 14 天。共歼敌杨森部 1000 余人，俘敌 2000 余人，缴获长短枪 2500 余支。解放了营山县城及营山、渠县大部分及蓬安县嘉陵江以东的广大地区，根据地向南扩展百余里。

从 10 月 16 日到 27 日，红军又乘胜发动了宣达战役，对盘据宣汉、达县、万源、城口的军阀刘存厚部展开猛烈进攻。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配合了这次战役行动。红四方面军针对敌人一线式的兵力部署，决定集中兵力，实行中央突破的战法，以 15 个团的主力，打得敌人狼狈逃窜，一举攻占了宣汉城，旋即分兵进逼达县。1933 年 10 月 21 日，红军进攻绥定（今达县市），刘存厚仓皇逃跑，绥定解放。

宣达战役历时 11 天，红军解放了宣汉、达县、万源 3 座县城，共歼敌 6 个团，毙敌千余，俘敌官兵 3000 余人，缴获了军阀刘存厚 8000 多支枪、500 多万发子弹、百多万元大洋、20 万匹棉布、两万多套棉衣，以及兵工厂、纺织厂、被服厂、造币厂的全套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红军和苏维埃政府把这些战利品运到通江后方去，兴建和扩充了人民的兵工厂、被服厂、纺织厂和造币厂，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打下了很好的物质基础。

在宣达战役中，红四方面军和川东游击军胜利会师了，并于1933年11月初在宣汉城西门外举行了上万人的胜利会师大会。会上由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宣布：川东游击军正式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由川东游击军总指挥王维舟任军长，梁山（今称梁平）中心县委书记杨克明任政委。至此，红四方面军已发展到5个军、8万余人，加上地方赤卫军、游击队等，川陕根据地已拥有数十万人的武装力量了。

三次进攻战役胜利后，川陕根据地的区域已扩大到：东起城口近郊，西到嘉陵江东岸，北至陕南的宁强、西乡、镇巴，南抵营山、渠县，总面积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00万。到1933年12月，共建立23个县和一个市的苏维埃政权，计有：赤江（通江）、赤北、红江、南江、巴中、江口（今平昌）、陕南、恩阳、嘉陵、苍溪、仪陇、长胜、英安、广元、长赤、营山、阆南、渠县、红胜、宣汉、万源、达县、城口和巴中特别市。在新解放的区域内，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农民普遍开展了土地革命运动，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这是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展的鼎盛时期。

红四方面军和川陕根据地的迅猛发展，震撼了敌人在四川的反动统治。1933年9月，军阀刘湘打败刘文辉后，马上就调集军队来对付红军。10月4日，刘湘在成都宣誓就任蒋介石于7月4日任命的“四川剿匪总司令”之职。蒋介石还派代表赴会给刘湘打气，并以200万元军费，万余支枪和500万发子弹拨发刘湘“剿共”。

刘湘纠集大小军阀约110余团、10多万人的兵力（最

多时增到 140 余团，约 20 万人)，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六路围攻”。敌第一路为二十八军的 18 个团，由广元、昭化向木门、南江方向进攻，总指挥为该军军长邓锡侯；第二路为二十九军的 24 个团，由阆中向巴中方向进攻，总指挥为该军军长田颂尧；第三路为李家钰的新编第六师和罗泽洲的第二十三师，共 18 个团，由南充向巴中东南的曾口场方面进攻，李、罗分任正副总指挥；第四路为二十军的 9 个团，由蓬安向鼎山场、通江方向进攻，总指挥为该军军长杨森；第五路为刘湘的二十一军约 30 个团，由开江、开县向宣汉、达县方向进攻，总指挥为该军第三师师长王陵基；第六路为二十三军的 12 个团，总指挥为该军代军长刘邦俊。

刘湘的“六路围攻”于 1933 年 10 月底开始发动。他狂妄宣称，要在 3 个月内全部肃清川陕边区的红军。

为了粉碎刘湘发动的“六路围攻”，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反“三路围攻”的经验，决定仍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方针抗击敌人。在兵力部署上，以东线为主要方向，调集红四军、九军、三十军和三十三军的主力共 30 余团，布防于万源、宣汉、达县的东线地区，由总指挥徐向前指挥，主要对付敌之第五路；以红三十一军主力和三十军、九军的各一部，共 10 余团，配置于北起广元、沿嘉陵江以东到营山、渠县以北的西线地区，由副总指挥王树声指挥，分别钳制第一、二、三、四路敌军；另以红三十一军两个团置于通江和旺苍北部，监视陕南敌军。

红四方面军于 1933 年 11 月初开始对敌人的围攻进行

反击。12月中旬，红军开始收紧阵地，诱敌深入。红军在收紧阵地的运动防御战中，节节抗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先后粉碎了敌人的3期总攻。到1934年6月，已毙伤敌军3.6万余人，并且拉长了敌人的战线，为红军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但是，军阀刘湘不甘心失败，又调集更大的兵力，并请出一位标榜“以神治军”的“神仙”刘从云来登台拜将，挂上“剿匪”总司令部前方军事委员长的头衔，统领各路敌军，准备发起第4期总攻，并猖狂扬言3个月内要消灭红军。刘湘起用刘“神仙”，是因3期总攻失败后，军阀们灰心丧气，军心动摇，才抬出刘“神仙”来，妄图借此来号令全军，统一军心。

刘湘第4期总攻的重点是要在东线夺取万源。从万源城南到通江一线敌人进攻的兵力共50余团。万源已是红军收紧阵地的最后一线了，如果万源丢失，红军就有被敌人挤出川北的危险。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打一场万源保卫战。

万源地势险要，山高林密，利于红军坚守。在总指挥徐向前指挥下，红军在甄子坪、大面山、孔家山、南天门、鹰龙山、云雾山等地构筑了一条长约400华里的半圆形坚固防御阵地，多次打跨了敌人在飞机掩护下的轮番进攻，打得敌人尸横遍野，无法进展。1934年8月6日至7日，是敌人疯狂进攻的顶点。敌调集东线主力约26个团，第7次猛攻万源之青龙山、大面山、玄祖殿、香炉山、甄子坪等地。红军战士与敌激战3天两夜，最后将敌全线击溃，追杀10余里。8月10日，红军攻克青龙观，击溃敌刘存厚部

两个旅，毙敌团长、营长各 1 名。

红军打开了敌人阵线的缺口，乘胜向纵深发展，迅速对敌实行分割包围。敌人见势不妙，纷纷溃退。这时，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和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等都主张根据有利地形向东大迂回，围歼刘湘的主力一、二、三师，而在后方的张国焘却来电话表示不同意。他以中央代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命令徐向前率领红军向西迂回，去打同红军距离很近、又处于平行位置的敌范绍增第四师。结果范师见红军攻来，就迅速南逃到达县的北山场、江陵溪和渠县三汇镇一带，红军只追着范师的屁股打，未能消灭多少敌人。红军再改向东迂回时，刘湘的 3 个主力师已逃跑到宣汉的马家场、东升场一线筑垒固守，红军只打击到其后尾一部，战果不大，这是张国焘错误干扰的结果。至此，红军东线总攻遂告结束。

红军在万源保卫战的胜利，粉碎了刘湘“六路围攻”的东线攻势。“神仙”刘从云被迫通电辞职。刘湘也因惨败于 8 月 23 日致电蒋介石，请免四川“剿匪”总司令等职。

红军在东线胜利后，徐向前又迅速指挥红军主力向西线进行反攻。西线敌人见东线已溃败，军心动摇，红军稍一进击，就全线败退。徐向前和李先念等商量决定：这次不能再听张国焘的错误指挥了，要实行大纵深迂回，围歼敌人。于是，徐向前指挥红军主力，经巴中、凤仪场、雪山场直插木门以西的黄木垭（黄猫垭）构成口袋阵势，兜住了刚撤退下来的田颂尧部 5 个团。经过一场激烈的围歼战，共毙伤敌代旅长傅贵梁以下官兵 6000 余人，缴枪 7000

余支，迫击炮 40 余门，获得反“六路围攻”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红军乘胜向各路敌军追击，一直到嘉陵江边，彻底粉碎了军阀刘湘的“六路围攻”。

反“六路围攻”，从 1933 年 11 月至 1934 年 9 月，历时近 11 个月。红军付出了伤亡两万余人的代价，换取到巨大胜利，共毙伤敌 6 万余人，俘敌万余人，缴枪 3 万余支、炮 100 多门，击落敌机 1 架，基本上恢复了根据地全盛时期的版图，并扩大了部分新区。

川陕革命根据地能够迅速建立和发展，主要是由于红四方面军、中共川陕省委和川陕省苏维埃政府贯彻执行了党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和土地革命、苏维埃运动的总政策；川陕两省地方党组织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的配合斗争也是川陕根据地建立和发展的重要条件；苏维埃干部和群众为革命艰苦奋斗，积极参军参战，支援前线，对川陕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四川军阀混战，以及川北山高路险，物产丰富，在客观上亦有利于川陕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在中共川陕省委、省苏维埃的领导下，经过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人民的艰苦奋斗，根据地的各项建设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党的建设方面 红四方面军刚解放通江、南江、巴中等县时，有的县原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有的县即使有，也

是党员少力量弱。为了建立和发展根据地，红军派出工作队到农村，帮助各地进行土地革命和建党建政工作。

通、南、巴解放后新建置的赤江、红江、赤北、巴中、南江5县，都建立了党的县委。2月7日，在通江城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到会的地方和军队的代表共500余人。会议历时一周，通过了《关于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川陕省党的任务》、《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等。大会选举了袁克服、曾中生、吴永康、郑义斋、傅钟等37人组成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委员会，袁克服为书记。省委成立后，县、区、乡各级党的组织也随着根据地的发展逐步建立和健全起来。

1933年6月23日，在通江县新场坝召开了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00余人。这次会议是在反“三路围攻”胜利后召开的，主要任务是讨论打垮田颂尧后对新形势的估计、新苏区的干部分配和即将在巴中召开的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等问题。

1933年12月11日，在巴中县城召开了中共川陕省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1000多名代表，来自20余县，代表全省党员3万余人（不包括军队党员）。会议开了10天，中心议题是进一步动员和组织党、政、军、民全力投入反“六路围攻”。

中共川陕省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是1934年10月在巴中县城召开的。会议总结了粉碎刘湘“六路围攻”的经验，讨论了目前形势和任务、党的组织和土地革命等11项议程；改选了省委，由周纯全任书记。

政权建设方面 1933年1月，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将通江、南江、巴中三县划为赤江、赤北、红江、南江、巴中5个县。在红军的帮助下，这5县的苏维埃政府都在2月相继正式成立。在此基础上，于2月17日在通江城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20余人，会议历时一周。大会宣布以《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为指导川陕省各项工作的根本大法。大会还通过了《川陕省苏维埃临时组织法大纲》，选举产生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亦称工农民主政府），由熊国炳任主席。

1933年8月1日，在巴中县城召开了川陕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160人。会议通过了《目前的政治形势和川陕省苏维埃的任务》的决议，制定了优待红军家属和有关公粮、婚姻、禁止鸦片等条例，会议还奖励了反“三路围攻”作战中有突出功绩的部队。会议选出了由32人组成的新的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会，熊国炳仍当选为主席。改选后的省苏维埃政府设有：财政、经济建设、外交、交通、土地、劳工、粮食、文化教育、内务、工农监察等委员会和政治保卫局、革命法庭、戒烟局。在省苏维埃政府以下，是各县、区、乡、村苏维埃政府，村政府以下设“十家代表”。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有了进一步的加强。

1934年12月11日，川陕省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仍在巴中召开，到会代表1440人。会议就全省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的决议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决定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巩固根据地，以粉碎蒋介石正在策划的“川陕会剿”。会议

还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错误，颁发了各种布告，并对肃反中捕人和征发、没收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最后，会议选出了由 27 名委员组成的省苏维埃政府，熊国炳仍当选为政府主席，余洪远、祝义亭为副主席。

为了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进行了肃反工作。社会上（地方上）的肃反，平定了敌特、土匪、反动地主武装的破坏活动，对保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安定社会秩序起了很大的作用，应予肯定。但在红军和党内的肃反，由于张国焘极力推行王明左倾的肃反政策，大抓 AB 团、改组派、托陈取消派等，错杀了许多革命同志，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是完全错误的，应该否定。因此，总的说来，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肃反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1935 年 3 月，在旺苍坝召开的七县县委书记和保卫局长会议上，虽规定了肃反的四条约法，开始纠正一些错误，但为时已晚，也未能纠正根本性的错误。

经济建设方面 川陕边大巴山地区，在红军到来前，工农业都很落后。通南巴地区基本上没有用机器生产的工厂。主要的是一些手工作坊和家庭手工业。川陕根据地建立后，在苏维埃政府领导和红军的帮助下，工业生产才逐渐有了发展。1933 年 10 月，红军解放达县后，缴获了军阀刘存厚的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等工厂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并将这批战利品运到通江后方苦草坝、得汉城等地扩建根据地的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促进了根据地工业生产的发展。新办的兵工厂有工人 1400 多人，有各种机床 138 台；被服

厂有很多缝纫机，有 1500 多工人。民用厂矿还有分布在南部、通江、巴中的食盐、硝盐厂，旺苍的煤矿，通江、万源、南江的铁厂、铔厂，巴中、仪陇、旺苍、宣汉、达县等地的纺织厂等，总计根据地有工人近两万人，以手工业工人为主。各厂矿的产品支援了革命战争，促进了生产，改善了人民生活。

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在土地革命运动的推动下，有很大的发展。苏维埃政府把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耕牛、农具、种子分给农民，使农民有了生产资料。同时，组织农民兴修水利，成立“耕牛合作社”、“生产合作社”、“种子合作社”，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困难，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收成。如：通、南、巴一带，1933 年前亩产粮食不过百来斤，而在 1933 年至 1934 年，亩产就达到了 200 斤左右。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就表扬说：“四川苏区的农业收成十分良好”。

在交通运输方面也有较大的成绩。川陕根据地内山路崎岖，交通不便，货物运输主要靠人背抬，这种人被称为“背二哥”。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了支援革命战争和运输大批的军用和民用物资，就动员群众组成运输队，并以通江为中心，在通往各地的主要交通线上，每隔三五十里设置交通站和招待处，促进了交通事业的发展。在开辟运输河道上，成绩也很显著。1933 年 8 月以后，省苏维埃政府水利交通科，先后发动约 50 万人次的石工和技工，历时 3 个月，疏通了从巴中到江口的巴河和从苦草坝到江口

的大通江的河道，共长 300 多里，使舟楫畅通，便利了军民运输，也减少了下游的水患。

在金融业方面，贯彻执行了废除高利贷、统一币制、活跃苏区经济的政策，取得了可喜成绩。省苏维埃政府建立了川陕省工农银行，有职工 600 余人。还建立了造币厂，制造银元、铜元和布币。工农银行在统一币制、疏通苏区金融渠道、实行对工农的低利和无息贷款、帮助合作社发展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从 1933 年到 1934 年上半年，有很大的发展。但是，由于军阀几次围攻的破坏和张国焘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经济政策，错误地打击了苏维埃干部、工商业者，也侵犯了中农的利益，严重影响了经济建设，最终导致了经济凋敝，物资匮乏，妨碍了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这是沉痛的历史教训。

宣传、文教卫生事业方面 在宣传文化工作中起重要作用的是报刊，川陕根据地出版的主要报纸有：中共川陕省委机关报《川北穷人》后改为《共产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赤化全川》、川陕省苏维埃政府机关报《苏维埃》、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机关报《红军》，主要的刊物有《干部必读》，由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办。这些报刊都是用蜡纸刻写油印的，版面美观大方，刻字工整，内容丰富，发行量较大。这些报刊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加强党的建设，以及教育组织群众、支援红军战争、传播革命文化、巩固和建设根据地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石刻标语是川陕根据地很普遍的一种宣传形式，也是

当地的一大特色。镌刻在通江县红云岩顶部的“赤化全川”巨幅标语，每个字约高5米，宽3米，远在20里左右都能望见，宣传效果很好。它是川北保留至今的4000多件红军石刻标语中最大的一幅。其他还有《劳动法令（草案）》、《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等石刻文献和“斧头劈开新世界、镰刀割断旧乾坤”、“工农专政、无产独裁”等石刻对联。这在当时的宣传工作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苏维埃政府还在城镇和乡村设有俱乐部、阅报室和红场（体育场），为翻了身的劳苦群众进行文化和体育活动创造了条件。

为发展教育事业，苏维埃政府在各县、区、乡普遍设立了列宁小学，在有的县城和重要场镇还办了中学、专科学校和工农中学。为培养军事人才，红军还办有彭杨学校（以革命烈士彭湃、杨殷的姓氏命名的）；为了培训干部，川陕省委办有党校，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办有苏维埃学校。这些学校使劳动人民的子女享有受教育的优先权，并在培养革命干部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卫生事业的突出成绩是设立了工农医院，开展了禁烟运动。省苏维埃政府设立禁烟局，采取办禁烟院、配发禁烟药丸等办法，帮助有吸鸦片恶习的人戒烟。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就使通、南、巴一带70%的人戒掉了吸鸦片的恶习，从而增进了人民的健康，提高了劳动能力，节约了社会财富，并为红军准备了充足的、身体合格的兵员。

三、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和 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

红四方面军粉碎了敌人的“六路围攻”后，从1934年10月起蒋介石又亲自策划对红四方面军的“川陕会剿”。蒋介石除令川陕的军阀配合会剿外，又令其嫡系胡宗南部的两个旅进驻川北的广元、昭化，上官云相部的四十四师、四十五师、四十七师及独立第四旅，向川陕边境推进。敌人部署“川陕会剿”的兵力很快增加到200个团以上。1935年1月，蒋介石派贺国光率行营参谋团入川，监督“剿共”军务。

形势是严重的。还在1934年11月1日，红四方面军就在通江县毛浴镇召开了党政工作会议。会议通过的《红四方面军政治与党务决议（草案）》指出：目前我们的中心任务是用全力冲破“川陕会剿”，赤化全川，争取西北首先胜利。

11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又在巴中县清江渡召开军事工作会议，进一步讨论冲破“川陕会剿”的方案。在会上，鉴于川陕根据地几经战争破坏，人口减少，兵员不足，物力、财力十分困难，徐向前总指挥提议：依托老苏区，发展新苏区，留一部分红军坚守通南巴，派主力部队打过嘉陵江，发展新区，重点夺取甘肃的文、武（都）、成、康等县，集中力量打击敌胡宗南部，以冲破敌人的“川陕会剿”计划。会议讨论并同意了徐向前提出的冲破“川陕会剿”，向川陕

甘边发展的战略方针及作战计划，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川陕甘根据地。会议还指出：“中央红军大举西征，我们应积极配合其行动”。会后，四方面军的一些部队为宣传贯彻会议精神还石刻了许多标语：“粉碎川陕会剿！”“消灭刘湘，与中央红军共同北上抗日！”

根据上述情况，很清楚，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是1934年11月清江渡军事会议决定的，目的是冲破“川陕会剿”，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并策应中央红军。

为了执行清江渡会议的决定，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1月22日，发动了广（元）昭（化）战役，包围了广元、昭化两城，因敌据城固守，红军又有新的作战任务，乃于月底撤广昭之围。

当广昭战役刚打响后，红四方面军总部收到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1月22日的电令：“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①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为使四方面军与野战军乘蒋敌尚未入川实施‘围剿’以前，密切协同作战，先击破川敌起见，我们建议：你们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进攻”。“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至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面。”

红四方面军总部在旺苍坝举行紧急会议，讨论了中央

^① 即中央红军。

的上述电令。会议认为：根据中央电令的精神，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将离开川陕根据地，向嘉陵江以西发展，因为西进策应中央红军作战是头等要紧的事。会议决定，暂时停止与胡宗南的角逐，进行渡嘉陵江的准备工作，并以主力一部出击陕南，调动嘉陵江守敌北进，为在苍溪、阆中一线渡江创造战机，并接应已经进入陕南商县一带的红二十五军。

2月3日，红四方面军发动了陕南战役，在10多天内给了陕军以沉重地打击，攻占了宁强、沔县两城和阳平关，直打到汉中近郊，共歼敌4个团。陕南战役的目的很快就达到了，邓锡侯部的5团江防军北进接替了广昭防务，田颂尧二十九军沿江的防线由五六百里延伸到八九百里，预备队也用光了。于是，红四方面军于2月20日回师川北，准备进行强渡嘉陵江的战役。

在渡江的一切准备就绪之后，1935年3月28日夜，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苍溪县塔子山渡口发出了强渡嘉陵江的命令，红军从塔子山渡口和苍溪以北的鸳溪口及苍溪、阆中交界的涧溪口，分三路同时渡江，29日拂晓渡江成功，各路红军向嘉陵江西岸的预定目标推进。经过24天的战斗，红军攻占了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平武、彰明、北川等8座县城和青川（即青溪镇）、中坝两重镇，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抵青川的广大地区，并建立了一批苏维埃政权，共歼敌12个团，约1万余人，冲破了敌人的“川陕会剿”。

正当红四方面军在嘉陵江西岸顺利推进，并向甘南碧

口发展，去消灭敌胡宗南的主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时，在后方主持工作的张国焘面对敌人的进攻，却丧失了胜利的信心，感到悲观失望。他认为，川北苏区是挤掉了汁的柠檬，不必死守了，与其被敌人赶着走，不如主动撤走。于是，他率领后方的党政机关和红军部队，“大搬家”式的从东向西撤过了嘉陵江，放弃了川陕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失去了对老苏区的依托，乃决定转而进行长征。

川陕革命根据地从1932年12月底，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建立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算起，到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全部撤出止，虽然只存在两年又5个月的时间，但它在当时全国革命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是很重要的。50多年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全国“二苏大”的报告中就曾指出：“川陕苏区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川陕苏区有地理上、富源上、战略上和社会条件上的许多优势，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川陕苏区在争取苏维埃新中国伟大战斗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义。”^①这仅是川陕革命根据地刚建立一年时毛泽东对它作出的高度评价，以后的实际情况也完全证实了这个评价，并且更充分显示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第一，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增加了4200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和500多万人口，

^① 见《苏维埃中国》第249页，中国现代史资料编辑委员会1957年翻印出版。

壮大了苏维埃运动。川陕根据地的劳动人民翻身作主人，建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府，并实行了土地革命，这对当时根据地周围各省白区人民的革命斗争起到了很好的鼓舞和示范作用。

第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红四方面军几次反围攻的胜利，不仅动摇了蒋介石集团和四川军阀的反动统治的基础，而且还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的反“围剿”作战，策应了红二、六军团转战湘鄂川边和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第三，在川陕革命根据地锻炼、成长起来的大批红四方面军指战员和党、政干部，壮大了我党我军的力量，无论对当时和后来的中国革命事业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全国红军实行长征大转移的过程中，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就支持、掩护、接应了红二十五军、中央红军和红二、六军团的战略转移行动，在长江南北以至中国南北两部之间起到了很好的桥梁和连接作用。正如当年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的徐向前元帅所说：“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如果没有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桥梁和连接作用，将会造成更多的困难，造成更多的损失。那时中央红军撤出了江西，陕北根据地很小，四方面军在川陕的存在，它所积蓄的革命力量，对于一、二方面军的长征，对于全国的革命，是个很大的支持和掩护。当然，中央红军、二方面军和其他苏区的斗争，对于四方面军和川陕根据地同样是很大的支持

和掩护。”^①

第四，川陕革命根据地留下了巴山游击队的革命火种和苏维埃与红军的深远影响，鼓舞着革命老根据地的人民坚持长期的革命斗争。他们发展了党的地下组织，成立了游击武装，为 1949 年底解放川陕边地区贡献了力量。

^① 见徐向前为《巴山烽火》一书所写序言，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华北地区 中共顺直省委和北方局组织沿革梗概

王 乃 德

顺直省委和北方局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北方建立的两个领导机构。其中，顺直省委虽然是党的一个早期地方领导机构，但它曾受中共中央委托管辖过热河、察哈尔和绥远地区党的组织，对华北其它地区党的组织也有较大的影响。北方局则直接是中共中央派驻北方领导北方地区党组织的代表机构，曾几经撤销和建立。

本文仅对顺直省委和北方局的组织沿革和历史情况作一概要介绍，以便澄清把北方局、顺直省委和顺直省委以后的河北省委三者和组织系统上混淆不清的说法。

（一）顺直省委的成立及其工作区域的变化

顺直省委是1927年5月成立的，在此之前的北方地区中共地方党领导机构是中共北方区委（由中共北京区委改成）。1927年4月，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下的北京政府逮捕并杀害了李大钊等20余名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中共北方区委遭到破坏。北方党一时失去了领导核心，陷入困境，北方地区的革命事业随之面临严重的危机。中共“五大”闭

幕后，中共中央很快派出了以盛智僧为首的工作团赴北京，恢复和整顿北方党组织，并由盛智僧受命代理中共北方区委书记。就在这一年的5月19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决定。决定成立中共顺直省委，由彭述之任省委书记，陈为人任组织部长，李渤海为宣传部长，其他领导成员为陈乔年、于方舟、黄中税、李希逸等人。同时决定，刘伯庄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傅茂公担任唐山市委书记。因中央对彭述之的工作分配几经变动，所以中央又于6月9日决定：由刘伯庄代理顺直省委书记。顺直省委管理北京、直隶（今河北省）、天津、热河、察哈尔等地党的工作。省委驻天津。在此前后，中共中央常委会议还决定成立陕西省委、山西省委、东三省（奉天）^①省委、山东省委和河南省委。这几个省委各自领导本省党的工作，它们是中共中央领导下的省级党组织，与顺直省委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北方区委随之撤销。从此党的组织结构由过去的中央、区执行委员会、地方执行委员会、支部干事会改变为中央、省委、市委、县委、县下辖区委、支部干事会。这种改变是为适应当时的斗争形势而产生的。

1927年8月11日，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北方党组织与工作的时候，决定改组顺直省委。改组后的顺直省委由刘伯庄担任省委书记，彭述之负责宣传。顺直省委受新成立的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其工作区域是：北京、天津、河北、热河、绥远、察哈尔、豫北和鲁西等地。中共

^① 不久后，改为满洲省委。

北方局于同年9月又决定改组顺直省委。新省委由13人组成。省委常委5人：朱锦棠、于方舟、彭述之、王仲一、杨春霖。常委分工：书记朱锦棠，组织于方舟，宣传彭述之，工运王仲一，农运杨春霖。

以朱锦棠为书记的中共顺直省委，接受“八七”会议决议，到群众中去开展工作，派人巡视各地，继续整顿党的组织。

1927年10月，省委向有关党组织发出了《省委职工运动书》的工作计划，指出开展顺直工人运动的三个重要工作方向：（1）天津方面的京奉、津浦两条铁路干线，海员码头，电灯公司，电报局等处；（2）唐山方面的京奉铁路，开滦煤矿，纺纱厂，水泥厂等；（3）石家庄方面的京汉、正太两条铁路干线，纺纱厂，井陘煤矿等。工作计划要求以上地方的党组织积极领导铁路、矿山、工厂的工人开展斗争，组织暴动。

同月，顺直省委还先后派人去热河成立了绥远特支，书记为韩灵符，下辖：铁路、手工业、城市、临河、包头5个党支部。顺直省委至此已领导着3个市委、7个县委、2个临时县委和20个特支。共有党员1024人。省委还创办了《顺直通讯》，作为内部刊物下发各级党组织指导工作。

同年10月顺直省委组织京东玉田农民秋收暴动失败。领导这次暴动的省委常委于方舟、杨春霖等人英勇牺牲。以北方局书记王荷波为首的18名同志被敌人杀害。顺直省委组织已经残缺不全。彭述之被中央解除顺直省委领导职务后调回上海。同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北方局。

这时，主客观情况迫切需要重新整顿、改组顺直省委。12月8日，中共中央驻北方巡视员蔡和森抵达天津，与顺直省委常委开会，经反复研究，决定改组顺直省委。

1928年1月，在蔡和森的主持下改组了顺直省委。省委委员为：王藻文、彭真、王仲一、王德振、张明远、张昆第、尹才一、杨宗义、王宗泉、张树声、郝清玉。省委常委由王藻文、彭真、王仲一、张明远、李德贵、王德忠和京东农民王某等7人担任。王藻文为省委书记。顺直省委下辖天津市委、北京市委、唐山市委、察哈尔临时省委和玉田县委、乐亭县委、定唐县委、保定县委、献县县委，以及绥远特委等。同年4月，中共内蒙古特支成立，委员是韩灵符、郑丕烈、云润、杨洪涛、卢东白、张述、曲李霄，亦归顺直省委领导。

顺直省委这次改组，有着重要的意义。通过组织上的调整，发扬了党内民主，批评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一步贯彻了中共“八七”会议精神，推动了顺直党的工作。不久，在蔡和森主持下，选举王藻文、王仲一、蔡和森、张昆第、杨宗义、张兆丰为“六大”代表。

然而顺直省委这次改组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批判右倾错误，过分追究个人责任，未能从省委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方针等方面总结经验教训，没有对党的活动分子进行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和民主集中制的教育，滋长了党内的极端民主化倾向，对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的工农分子缺乏必要的教育和训练，以致使其中的不良分子，利用职权假公济私，助长了党员中的经济主义倾向。这些问题的存在，对

于顺直党组织以后的发展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1928年2月，蔡和森根据中央指示，停止了对北方党的巡视工作，离开天津返回上海。

之后，中共中央陆续派刘少奇、陈潭秋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北方指导顺直党的工作。但由于极端民主化和经济主义倾向的蔓延，加之王藻文的错误领导，使顺直党组织内部矛盾重重。

同年6月，奉系军阀败退关外，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改直隶省为河北省，改北京^①为北平，将河北省会设于北平市。这时，党内一部份不坚定分子认为华北已是国民党的一统天下，遂纷纷叛变革命，投靠国民党。北方党党员人数一时急剧减少，再次出现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危机。鉴于这种情况，1928年7月22日，在陈潭秋、刘少奇主持下，于天津召开了由天津、北平、唐山、乐亭、玉田、隆平、张家口、石家庄、正定、献县、晋县等地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和讨论了瞿秋白在中共“六大”上代表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以及省委关于河北政治、经济状况的报告，分析了晋系军阀阎锡山控制华北后的政治局势，制定了北方党组织的斗争任务和工作方针，批评了顺直党内的错误倾向，开展了民主与集中、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的教育。会议还在陈潭秋、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改组了省委。韩连惠（后叛变）、彭真、郝清玉、张金

^① “北京”自明成祖将都城北迁以来向有此称谓，但正式的地理辖区建置明清为顺天府亦称京师。民国以来改为京兆。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北京改为北平市，是北京地区首次设市。

岩、杨继录、张昆第、吴雨铭、杨宗义、徐义雅、张兆丰、王藻文等 11 人为省委委员，刘俊才、李希逸、郭宗鉴等 3 人为省委候补委员，省委常委由韩连惠、彭真、陈潭秋、张昆第、刘少奇、张兆丰、郭宗鉴组成。韩连惠为书记，彭真为组织部长，张昆第负责工运，郝清玉负责农运，秘书郭宗鉴。新省委还出版内部刊物《出路》。但是，这次扩大会议没有找出顺直党内产生矛盾的根源，处理问题的方法很不得当，犯了命令主义的错误，致使顺直党内事态发展到十分严重的地步。乐亭、玉田、唐山等地党组织悍然组织护党请愿团，并与在天津没有分配工作的党员纠合在一起，集中力量反对改组后的省委，使党内矛盾日益扩大，省委无法工作。鉴于此种情况，陈潭秋、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委员韩连惠不得不作出停止顺直省委职权的决定，由他们三人以“潭少连”的名义直接管理整个顺直党组织的工作。这时期，顺直党组织领导有：北京市委、天津市委、张家口市委、唐山临时市委和内蒙古委员会和天津、唐山、张家口、北平、石家庄、正定、顺德（今邢台）、沧州、保定、滦州（今滦县）等 10 个中心区。

同年 12 月，中共中央致函顺直省委，指出：停止省委职权的作法是错误的，应立即恢复省委职权，陈潭秋以巡视员名义参加省委工作，刘少奇则脱离铁总，完全作省委工作；少数党员组织的“护党请愿团”立即解散；京东五县党组织立即停止活动，由省委派出巡视员下去巡视并实行改组。同时决定派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长）到北方，进一步贯彻执行中共“六大”决议，

并解决顺直省委的问题。

1928年12月下旬，周恩来抵达天津。他在广泛了解情况、深入调查研究之后，于12月底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北方的中共六届中委，省委全体委员以及北平、唐山、天津、张家口、石家庄等地党组织的代表。会议由陈潭秋、刘少奇轮流主持，周恩来在会上讲了话。由于周恩来做了大量工作，解决了顺直党内的矛盾，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体现了“六大”精神，纠正了错误倾向，有力地推动了顺直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使工农群众运动逐步高涨起来。

会议选出了新的顺直省委，委员仍为11人：韩连惠、张金刃、陈潭秋、张昆第、郝清玉、张兆丰、秦兰英、曹策、郭宗鉴、王藻文、李德贵。常委有韩连惠、张金刃、陈潭秋、郝清玉、张昆第。书记韩连惠，组织部长张金刃，宣传部长陈潭秋，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张昆第，军事运动委员会书记张兆丰，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郝清玉，妇女运动委员会书记秦兰英。省委所属组织有天津市委（省委兼）、北京^①市委、唐山市委、张家口市委、石家庄市委和沧县县委、保定县委、邢台县委等。

1929年5月31日，中央重新调整了顺直省委常委。卢福坦、韩连惠、张金刃、陈潭秋、吴雨铭为常委，郝清玉、刘义、李华田为候补常委。书记卢福坦，候补书记韩连惠，

^① 时北京已被南京国民政府改名为北平市，但中共北京市委仍沿用北京市委名称。

组织张金刃，宣传陈潭秋，工委书记吴雨铭，巡视员郝清玉，秘书郭宗鉴。不久，因王藻文、李德贵叛变革命，省委书记卢福坦、秘书长郭宗鉴和叶玉文、彭真、詹大权、刘秀峰等党的活动分子被捕，但组织部长张金刃脱险，继续领导省委其他成员坚持工作。

8月13日，中共中央批准由张金刃、李子芬、吴雨铭、郝清玉、刘玉田、张兆丰、李培良、肖明、童长荣等9人组成新的顺直省委，以张金刃、李子芬、吴雨铭为省委常委，郝清玉、刘玉田为候补常委，张金刃为省委书记，李子芬为组织部长，李希逸为宣传部长，吴雨铭为工运部长。

1930年2月3日，中共中央再次调整顺直省委，决定调贺昌任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张金刃改任省委宣传部长，吴雨铭任省工委书记，李子芬调中央另行分配工作。不久后，张金刃奉调到长江局工作，由陈复接任宣传部长，阮啸仙任组织部长，后聂荣臻继任组织部长，廖化平负责省军委工作。省委其他成员有张昆第、郝清玉、胡锡奎。贺昌主持省委工作期间，由于执行“左”倾盲动主义，使顺直党组织又一次受到很大破坏。

这年8月，根据中央的要求顺直成立了省总行动委员会，党与团的一切工作均集中到行动委员会管理。推行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建立苏区的“左”的行动方针，致使已经遭到破坏的党组织更被暴露，损失更加严重。9月，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停止了“左”倾盲动路线。顺直省委接受中央全会决议，承认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犯了“左”的错误，并开始纠正左倾错误。

12月21日，经中央决定顺直省委被撤销，河北省委继之成立。至此，顺直省委结束了自己的活动，完成了历史使命。

（二）中共中央北方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沿革及其管理范围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最早在1927年4月召开的“五大”所通过的党章中，就作出规定：党的中央机构有权派出代表机关管理一定区域内党的工作。但实际上直到同年党的“八七”会议后，这一规定才具体付诸实施。

8月9日，即党的“八七”会议后第二天，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决定，组织中共中央北方局，以王荷波为书记，蔡和森任秘书长，其他成员为刘伯庄、彭述之。后又决定张昆第和北方青年团一名代表加入北方局。北方局领导顺直、山西、内蒙、满州、山东五省的党组织，北方局设有：组织部、宣传部、军事部、工人运动委员会。王荷波兼组织部长、蔡和森兼宣传部长和党报编辑，张昆第为工委书记，刘伯庄为军事部长。

9月，北方局进驻北京。由王荷波、蔡和森、张昆第组成北方局常委，处理日常工作。北方局根据中央指示，从组织整顿入手，改组了顺直省委，撤销了彭述之的顺直省委书记职务。派刘伯庄参加山东省委。陈为人加入满州临时省委担任书记。整顿了山西省委，由王鸿钧代理省委书记。派人赴热河，成立热河临时省委。在玉泉、建平、赤峰、西林各地组织县委与特委，并组织 and 领导了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王荷波还亲自领导并参加了玉田“双十节”举行的万人示威运动，公开宣传没收地主土地，成立京东临

时农民协会，派人去各地发展会员。举办工人训练班，恢复赤色工会等。但是，北方局在这一期间的工作犯有不顾客观形势、一味要求地方党组织暴动的盲动主义错误，致使不少党的组织被破坏，党的活动分子和工农积极分子被敌人大批捕杀。

是年10月下旬，在北京，北方局、北京市委、北方局军委、铁总、京总各机关及住所无不被敌人破获。王荷波等40多位党的干部被捕。不久，王荷波等人被敌人杀害。此后，北方局的工作便由蔡和森负责主持。

同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取消南方局、北方局、长江局等中央代表机关。17日，中央决定蔡和森担任顺直、山西、山东、满州、内蒙五省特派员兼顺直省委书记。因蔡和森对这一决定有所保留，所以，中共中央又于12月4日决定蔡和森改任中央驻北方巡视员，指导上述五省党的工作。蔡和森到达北方后，确定了山西党的工作的新方针，主持了顺直省委的改组，批评了王藻文等人闹经济主义的错误，努力克服党内的雇佣观点，使北方党的工作很快打开了新局面。

1928年2月上旬，蔡和森离开天津赴上海，结束了其北方巡视工作。

1930年7月，中共中央重新设立北方局。调贺昌任书记，阮啸仙任组织部长，于涤鸿任宣传部长，陈复任秘书长，张昆第任工委书记，廖化平任军委书记。北方局负责管理顺直、山西、河南、山东、热河、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等9省党的组织和工作。

8月，在中央指令下，成立北方行动委员会。贺昌任书记。北方局同时要求所辖9省分别成立省行动委员会，全面地准备武装暴动，争取胜利。各省随即将党、团和工会组织合并为行动委员会，并制定了冒险计划，举行武装暴动，进攻中心城市，成立红军，建立苏区。结果，在敌强我弱和各地党组织主观力量不足的形势下，各地暴动或是遭到敌人镇压，或是无法组织，致使大批党员被捕被杀，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12月，中央根据形势变化，决定撤销北方局，委托新成立的河北省委代管山西、陕西、甘肃和河南、山东一部分地区的党组织工作。

1933年3月，中共中央派田夫（又名石心，现名孔原）为中央驻北方代表，主持北方党的领导工作。中央代表的工作机构及其负责人是：秘书长洪灵霏，军委柯庆施，全总代表饶漱石，交通处长李培南，宣传朱理治，职工运动李华生，中央驻北方代表管辖河北、山西、山东、热河、察哈尔、绥远、天津、北平、河南、满州等省市党组织。并且成立了华北政治保卫局，开展对国民党各方的统一战线工作。

1935年6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返沪之前，根据中央决定，第三次成立北方局统一领导北方党的工作。北方局书记由高文华担任，柯庆施任组织部长兼军事部长，李大章任宣传部长，王林任秘书长。

同年底，中央任命刘少奇为中央驻北方代表。

1936年4月，刘少奇根据中央指示在天津改组了北方

局，书记刘少奇，组织部长彭真，宣传部长陈伯达，秘书长林枫，柯庆施、王鹤寿、李大章等人为委员。

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后，根据党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和中国北方的具体情况，批判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的错误，尽力联合北方一切可能抗日的阶层、党派、集团和个人，巩固发展了“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以来的大好形势。北方局成功地采取了隐蔽精干的方针，把党的秘密工作同群众公开的抗日救亡运动正确地结合起来，从组织上严格地区分开来。从而，大大加强了河北、天津、北平等地党的组织工作，整顿了山西工委、山东省委和河南省委以及华东、华南等地的党组织。

北方局还指示薄一波接受阎锡山的邀请，去山西利用牺牲救国同盟会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与阎锡山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成立了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薄一波任书记，专门负责山西上层统战工作，在组织上完全秘密，工作受北方局领导。

1936年3月底到“七七”事变前，中共中央北方局先后管辖着河北、山西、山东、河南等地党的组织，北方局创造性地卓有成效地工作，有力地落实了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发展了北方的革命形势，为迎接全国规模抗日高潮的到来及以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党在华北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北方局管辖地区的党组织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敌占区各项斗争的开展，北方地区的党组织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突出一点，就是不能再按照原有的行政区划建立党的组织系统，而是根据客观实际和斗争形势需要，跨一省或数省建立党的省委或战略区党委，领导党在各地的工作。随着党的斗争侧得点的变化，北方党的组织体制、工作重心均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郭子化与苏鲁豫皖特委

戚惠民 董助才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由于立三、王明两次“左”倾冒险主义的危害，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的损失更大。然而，以徐州——枣庄为中心的苏鲁豫皖特委，在严重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不仅能存在，而且不断发展壮大，成为华中和华东白区工作的一面旗帜。

苏鲁豫皖特委位于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所辖20多个县、市。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时，郭子化等同志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和灵活的斗争方法，使党的组织在敌人的眼皮底下，不但生存下来而且获得发展，并且在以后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为党在这一地区发动和领导抗日战争在组织上和干部上奠定了基础。

(一)

1930年8月，山东省委在连续遭到三次大破坏之后，革命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对恢复鲁南地区的党组织感到有

困难。于是，向中央报告^① 建议由苏鲁两省分别派干部到鲁南开展工作。建议得到了中央和江苏省委的同意。

1930年10月，徐（州）、海（州）、蚌（埠）特委派唐东华^②去临（沂）、郯（城）一带开展工作；1931年春，山东省委派田位东、郑乃序去枣庄矿区开展工作；1932年7月16日，田位东、郑乃序领导枣庄煤矿工人进行罢工斗争，由于工贼出卖，罢工斗争失败，田位东、郑乃序等同志被捕牺牲。

枣庄罢工失败以后，为了恢复鲁南党组织的工作，徐州特委曾先后两次派人去枣庄，但皆因无法立足而返回徐州。在这种情况下，徐州特委决定派郭子化去鲁南恢复党的工作。

郭子化，江苏邳县人。“五四”运动时曾任徐州学生联合会会长。1926年参加北伐，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以后，先后在泗县、沛县、永城等地从事地下革命斗争，组织领导过泗县、永城等地武装暴动，具有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特委认为郭子化是派往枣庄的适宜人选。

1932年10月，郭子化化名为庞沛霖，以行医为职业掩护，肩挑着药箱步入枣庄。他以看病为名，一边了解社会情况，一边考虑如何在枣庄立足。在初步了解了情况后，他将自己的怀表卖了，通过熟人关系在枣庄街上租了一间草棚，开起一家中药铺，以此为掩护开始着手鲁南党组织的

① 见《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2辑第22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 又名唐棣，江苏省邳县人，中共早期党员，1932年在济南牺牲。

恢复和发展工作。正是这间以秫秸篱笆为墙、四面透风、十分简陋的旧草棚，成了苏鲁豫皖特委的诞生之地。

(二)

郭子化边给人们看病，边了解矿工们的思想和生活情况，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对于生活有困难的工人，常常是免费就医，这使他深受工人群众的爱戴，也为他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所以不到两个月，他便在工人中间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发展了一批党员，并于1932年底重建了枣庄矿区党支部。

翌年春，为了进一步扩大我党在鲁南的影响，矿区党组织决定在“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一天，领导枣庄煤矿工人进行分“花红”（即红利）的斗争。这次斗争的斗争策略是：通过经济斗争的形式，达到政治斗争的目的。历史上枣庄中兴煤炭公司“里工”和“外工”^①的待遇一向不同，“里工”除了每月工钱以外，还可以分到一点“花红”，而“外工”没有“花红”。矿区党组织便利用这一矛盾，向外工宣传“花红”是他们用血汗换来的，他们有权得到。鼓励他们团结起来与资本家进行争“花红”斗争，并赢得了斗争的胜利。

这是枣庄矿区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取得斗争的胜利，它打破了枣庄矿区的沉闷空气，鼓舞了工人们的斗志，扩

^① 当地煤矿区分不同工种的术语，“里工”即（矿）井下作业工人，“外工”则为井上作业工人。

大了党的影响，为苏鲁边区特委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三)

1933年7月，徐州特委被破坏，特委书记冷启英等同志被捕，永城县委书记朱大同、共青团徐州特委书记练育才等先后叛变，郭子化和枣庄党组织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和威胁。就在这时，冷启英从狱中托人捎来一张纸条，说他得了“重病”，但据医生说“不传染”，请他们“放心”。郭子化虽然明白隐语的含义，但为了防止万一，还是做了应变的准备。一段时间后，他与组织均安然无恙，证明确未暴露，他才又回到药铺里，恢复了正常工作。

徐州特委被破坏以后，郭子化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急需与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二是肩负着枣庄——徐州及其所属各县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早在1933年4月，冷启英来枣庄巡视工作时，就已经交待郭子化，徐州形势很紧张，一旦特委被破坏，要他承担起徐州特委所辖地区党组织的恢复工作。而当形势真的需要他担负起这项任务的时候，郭子化和他的同志凭着对党的赤胆忠心，充分地发挥革命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保证党的工作继续获得开展。没有上级的指示，就按照党的一贯精神，自己摸索着干。因经费困难，已是腊月的天气，郭子化还只穿一条单裤，他把药铺里挣来的钱都作为党组织的活动经费了，其他同志也想出很多办法帮助党筹措经费克服困难。为和上级党组织重新建立联系，郭子化曾亲自到上海、北平等地去找党的关系，但都未能联系上。后来获悉他的同乡、邳

县早期党员宋绮云^①在杨虎城部做地下工作，于是，便派地下党员郭日高到西安找宋绮云联系。当时经费困难，没有钱买车票，郭日高只好步行去西安。西行到萧县，被国民党当做共产党的嫌疑分子逮捕。郭子化得知这一消息后，便通过萧县知名人士王展如将其保释。郭日高出狱后继续西行，他以崇高的革命信念，一路上讨着饭终于到了西安，并与宋绮云取得联系。自此，宋绮云经常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给特委一些帮助。

1935年10月，中共西北特别支部（简称“西北特支”）^②在西安成立。宋绮云向西北特支负责人谢华、徐彬如汇报了苏鲁边区临时特委的情况，并决定让郭子化来西安汇报工作。郭子化于1935年冬到西安，正式接上了组织关系，从此特委便归属“西北特支”领导，以后又曾多次派人向“西北特支”汇报工作。

西安事变以后，“西北特支”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特支负责人通知郭子化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王观澜和齐华接待了郭子化。中央还指定朱理治听取了郭子化的详细汇报。其后，中央又对这一汇报进行了充分研究，认为苏鲁边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和中央的白

① 宋绮云，原名宋元培，江苏邳县人。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邳县县委书记，后到西北军杨虎城部做地下工作。1941年7月与爱人徐林侠、幼子宋振中一起被捕。1949年9月，同杨虎城将军一起牺牲于重庆“中美合作所”监狱。

② 西北特支系1935年10月在西安成立，书记谢华，委员有徐彬如、李木庵、宋绮云、童陆生、金闵生、王根僧等。特支属中共中央留沪办事处领导，主要任务是做西北军的兵运工作，一般不和地方党组织发生横的联系。

区工作方针基本吻合，应予充分的肯定，并正式批准了“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建立，将其划归即将成立的河南省委领导^①。郭子化还被留在延安参加全国党的苏区代表会议和党的白区代表会议。

(四)

郭子化的白区工作之所以能得到中央的认可，是因为他的工作方针是正确的，工作方法是可行的，工作成绩是突出的。他在苏鲁豫皖四省边区党的恢复和发展中，起到了“种子”的作用。还是在徐州特委被破坏不久的时候，郭子化便与苏鲁两省的峰、滕、费、丰、沛、萧、铜边等县的地下党取得联系，并于1935年2月在枣庄建立了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郭子化任书记，丛衍瑞^②为组织委员，张光中为宣传委员，丛林为秘书。为了有效地打击叛徒和防范国民党特务的破坏，还建立了一支秘密的小武装，肖平任武装队长。

临时特委建立以后，组织的恢复和发展工作进展很快，到1936年底已发展到苏鲁豫皖四省边区的22个县。因此，特委遂将“中共苏鲁边区临时特委”改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临时特委”，增添陶洪瀛为特委委员。到1937年5月，中央决定组建河南省委时，中央交给朱理治党员组织关系共460人，其中苏鲁豫皖特委300人，河南工委70人，鄂

^① 参见《抗战时期的中共河南省委》，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又名丛玉先，江苏省沛县人。1931年入党，曾任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委员，后脱党。

豫边省委 60 人，皖西北特委 30 人。苏鲁豫皖特委的党员数占了河南省委党员总数的 2/3，这充分证明苏鲁豫皖特委的组织恢复和发展工作是突出的。到了 1938 年初，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的党员数业已发展到 1232 人。

在发展工作的方针上，特委始终坚持积极而又慎重的原则。从发展对象来看，以工、农成份为主，但也不排斥其他各阶层人士，只要是真心实意愿意参加革命的，都在发展之列。在鲁南，党的发展工作已渗透到各行各业。在矿工中、在农村、在教育界、医药界、政界、军界、商界等都有我们的人，连韩复榘在枣庄的驻军——“杨团”，都有我们的党组织。该团机枪连共 6 挺重机枪，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的就有 4 挺。在敌人的警察局里也有我们的同志。他们不断为我党传送情报、掩护我们的同志。尤其在医药界，可以说被我地下党“垄断”了。郭子化将自己的小药铺经过一番修整，挂起“同春堂”的招牌。继“同春堂”之后，郭子化又派李韶九等同志在鲁南费县高桥镇开设“广德堂”药店，派丛林等同志在山东滕县开设“元德堂”药店；派陶洪瀛等同志在滕县北辛庄开设“乾德堂”药店，派郭致远等同志在费县大北庄开设“天德堂”药店。另在枣庄街上开设“广仁医院”（后改名为雅青医院），由共产党员褚雅青担任院长。后来，郭子化又联合鲁南 70 余家药店、医院，成立了鲁南药业公会，推举地下党员李韶九为会长。同时又组织了中西药品运销合作社，由地下党员李微冬担任理事长。这样，整个鲁南的医药界都控制在我党手中，形成一个庞大的网络，以此来掩护特委的地下工作，积极发

展党的组织。

特委在发展工作上还特别强调要以职业作掩护，反对“四不象”。所以特委的同志有的开药铺，有的卷纸烟，还有的做肩挑小贩，卖油、火柴、青菜等。特委委员张光中既卖过油条，又贩过生姜。他是个知识分子，可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他脱去长衫，有意穿的破烂一些，还要装成大老粗的样子去满街叫卖。在对待党组织的发展问题上，郭子化接受以往的教训，对每一个发展对象都要做全面地、认真地考察，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尤其是对那些一度因形势恶化而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更为慎重。如沛县党组织 1934 年 1 月被破坏，张光中、丛衍瑞等逃到外地，先后到江西等地去找党，因当时中央苏区在江西，所以到江西又叫“回老家”，但他们未能和苏区党组织取得联系，于 1934 年秋又先后返回沛县。郭子化得知他们回到沛县后，先派丛林同志回沛县摸清情况，证实了他们仍然是自己的同志后，才与他们接触，帮助他们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

(五)

中共苏鲁豫皖特委是在严重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进行活动的，所以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组织内部的纯洁。1936 年春，沛县夏镇党的巡视员姜友吉叛变。郭子化通过内线得知这一消息后，特委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必须迅速除掉这个叛徒。在几天后的夏镇庙会上，特委委员张光中和武装队长肖平出色地完成了处决叛徒姜友吉的任务，并安全地回到枣庄。

“夏镇事件”对敌人震动很大，似乎感到共产党有一股力量在威胁着他们。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派特务头子庄世荣来沛县，坐镇侦察我地下党活动情况。他们疯狂地进行大逮捕，苗宗藩、郭影秋、王润生等党的骨干约20余名被捕。不久，敌人的魔爪又伸向枣庄。一次，由于偶然原因，曾与郭子化一起参加过永城暴动，后来叛变的叛徒朱大同带着几个特务分子在“同春堂”发现了郭子化，旋即将郭逮捕，并以要回徐州办个手续为名将郭子化带到徐州。

特委得知郭子化被捕的消息连夜召开会议，研究营救措施。尔后，派李韶九等同志赶到徐州，以枣庄药业公司公会会长的身份为郭子化做保，证明郭子化是“安分守己、奉公守法、不问政治、一心行医”的好人，并花钱通过特务腿子桑春田从中疏通，使特务机关确信郭子化真的弃政从医了。另一方面派人去济南向国民党山东政府控告徐州特务扰乱枣庄医药界正常营业、侵犯人权的行为，利用反动派的内部矛盾，给徐州方面施加压力。很快，郭子化被取保释放，但条件是，带回两张表，填好后送来。

郭子化回到枣庄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特委机关马上转移到鲁南抱犊崮山区的费县高桥镇。这里位于临沂、费县、峄县、滕县的接壤处，地势险要，交通不便，是敌人统治的薄弱地带。早在半年前特委就选准这块地方，并积极开展组织发展工作和群众工作，为这次特委的转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郭子化率特委机关撤离枣庄，安全到达抱犊崮山区之后，特委工作也就开始了新的一页。

(六)

“七七”芦沟桥事变，揭开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序幕。1937年10月，国民党政府为了阻止华北方面侵华日军沿津浦路南下，保卫南京及武汉，决定以徐州为中心设立第五战区，委任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官邸设在徐州。同月，第五战区成立了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作为半官方、半群众性的组织，李宗仁亲任主任委员。下设组织、宣传、战勤三个部。各部部长由李宗仁亲自委任：组织部长夏次叔，宣传部长晁庆祥，战勤部长李明扬，秘书长刘汉川。

1937年11月，郭子化在萧县黄口镇召开特委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除特委委员外，还有各县县委书记。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精神，分析了苏鲁豫皖边区政治形势，作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各种抗日民众团体以及建立自己的武装等决议，并对之进行了详细研究，作出了具体布置。会后特委机关由鲁南抱犊崮山区迁到徐州。公开办公地点设在徐州北关统一街牙税局内，秘密办公地点在徐州坝子街民众教育馆。特委根据黄口会议精神，积极开展各项工作。不久，郭子化为了打开统战工作的局面，经多方考虑关系，终于选定通过刘汉川的关系和李宗仁接触。郭子化先到萧县找到了毅忱，因为刘汉川是徐州萧县人（今属安徽省），与丁家是世交，郭子化和丁毅忱都是刘汉川的学生。当刘汉川将郭子化介绍给李宗仁，说子化同志是从延安回来参加家乡抗日救亡的时候，李对郭子化说：“我们（指桂系）和共产党八路军建立统战关系

最早，至今关系也最好。”^①李郭会谈是一次成功的会谈，李宗仁表示了三点意见：（一）接受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二）同意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允许中共在徐州设立办事机构公开活动；（三）聘请郭子化以社会名流的身份参加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担任委员。徐州专员李明扬还暗中派兵保护郭子化等人。

郭子化早在北伐时期就和国民党的一些人物有接触。北伐军打到武汉后，郭子化就曾受我党委托参与国民党江苏省党政训练班的筹办工作，由此，结识了不少国民党员，因而他和徐州地区国民党的上层人物还有很多关系。除和刘汉川的关系外，与徐州专员李明扬、丰县县长董玉珏、沛县县长冯子固、萧县县长王紫石、铜山县县长曹寅甫等都比较熟。这些人大多数是“四·一二”政变前的老国民党员，在徐州一带都有很大影响，郭子化就是通过他们开展第五战区的统战工作的。这些徐州地区的国民党要员在抗战初期，在我党统一战线的影响下，由犹豫、彷徨，而走向团结抗日的道路，与我党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

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各县亦相继沦陷，国民党在徐州的党政军要员几乎全部撤离。但和我党建立统战关系的一些国民党县长、常备队长却多数未走。如丰县常备队队长黄体润，丰城沦陷后，常备队随之解体，他成了光杆司令，正在他彷徨之际，特委派人帮助他恢复国民党丰县常备队，组织国民党临时县政府，推荐黄体润出任临时

^① 丁毅忱《我在第五战区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片断回忆》。

县政府的代理县长。黄深受感动，为表示他的诚意，主动要求我党给他常备队里派政工干部，我党遂派王效斌等 80 余名干部到该部任职，王效斌被任命为国民党丰县常备队政训处主任。在王效斌的领导下，我党干部在“常备队”里积极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发展党员 200 余人，从上到下都建立了党团组织。又如沛县沦陷以后，国民党沛县政权不复存在，县长兼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部第一支队长冯子固意欲离开沛县，沛县一时混乱不堪。我党认为，冯子固在沛县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如果他彻底垮台，沛县地区可能很快伪化，故派陈筹同志去做冯子固的工作，让他重整旗鼓，并帮他恢复政权，建立武装。冯子固感激涕零，说共产党是赤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表示要依靠共产党的力量继续抗日，从此，在沛县出现一个国共合作蓬勃发展的抗日局面。在国民党县长中，与我党配合最好是永城县县长兼县动员委员会主任鲁雨亭。我党许多抗日主张可以在他主办的青年训练班里公开传播，故引起国民党顽固分子的忌妒和仇视。国民党永城县党部书记赵铁卿伙同县党部的右翼分子联名上告鲁雨亭“赤化永城”。为此，国民党河南省党部责令鲁雨亭解散动委会，停止一切“赤化”宣传。兵来将挡，在我特委授意下，中共永城工委组织了 100 多人的“赴徐请愿团”，由工委书记刘屏江率领到第五战区总动员委员会请愿，控告国民党河南省党部非法解散永城动委会。鲁雨亭还以他个人名义拿出 100 元钱为请愿团做路费。请愿团到达徐州后，总动委秘书长刘汉川代表李宗仁接见了他们，对他们的行动表示支持。李宗仁

还亲笔致函鲁雨亭，表示对他的工作给予肯定。鲁雨亭不仅“赤化”了永城县，也“赤化”了他自己。徐州沦陷以后，他没有象其他国民党官员那样，躲到大后方，只顾个人安全，不顾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是继续留下来坚持抗日。他主动找中共永城县工委联系，将他组织领导下的近千人的抗日武装加入我党领导下的抗日义勇总队，他本人也由国民党左派爱国主义者转变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在鲁南，特委通过临沂专员兼保安司令张里元和临沂士绅万春圃开展统战工作。是年春，临沂专员张里元外受到日军逼近，内受到复兴社的威胁^①，在这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他急需找到一个能帮他巩固地位的政治力量，这只有第五战区总动委会和中国共产党。郭子化看准这一时机亲自去临沂和张里元进行会谈，使张里元表示接受我党提出的联合抗日主张，自此，张里元与我党正式建立了统战关系。万春圃是临沂的大户，号称万三爷，家有3顷多地，30余间大瓦房，并有一支二三百人的武装。他为人豪爽，有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早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曾掩护过我党同志，与我党有过接触。自被我党推任为临沂联庄会会长以后，他便在我党领导下积极从事抗日活动，为解决我军给养困难，他开仓供粮，而且还动员其他富户献粮献款，支援我军打日寇。有一次，日伪军万余人分两路包剿我鲁南特委机关，万春圃主动承担掩护特委机关转移的阻击任

^① 张里元属国民党CC系统，在山东CC系统和复兴社特务处系统的互相倾轧中，CC系统当时处于劣势。

务，在战斗中，他年仅 19 岁的次子万国英不幸中弹牺牲。他强压悲痛，继续战斗到胜利完成这次阻击任务。

(七)

特委在做好统战工作的同时，积极做好民众的组织和发动工作。这一工作主要是通过总动委会组织部开展起来的。

“总动委会组织部是动委会的权力机构，〔五〕战区所属各省、县民众抗日团体都要报请总动委会组织部登记后，方为合法。同时，各省、各县动委会的干部也由组织部任命。我们如能掌握组织部，就可以发展进步势力，限制国民党右派破坏抗战”。^①因此，特委决定争取掌握组织部，由铜山工委书记郭影秋担此重任。他通过总动委会组织部副部长赵光涛的关系，担任了组织部的总干事。当时，总动委会各部的部长、副部长是挂名的，日常具体工作皆由总干事负责处理。为配合郭影秋开展工作，特委又选派唐秉光、徐致雨、邵育才等中共党员到组织部分别担任青年干事和职工干事。这样，总动委会的组织大权实际上为特委所控制。

第五战区总动委会成立不久，各县相继成立了县动委会。我党又利用总动委会组织部的名义往各县派干部担任县动委会指导员。如丰县的陈筹，沛县的苗宗藩，萧县的李砥平，砀山县的尹易生，邳县的栗培元，宿迁县的于化

^① 郭影秋《往事漫忆》第 65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

琪，睢宁县的吴季讷，永城县的刘屏江，铜山县的佟子实，宿县的郭子豪以及烈山矿的张云榭，枣庄矿的张福林等。根据总动委会组织条例，各县动委会主任由各县县长兼任，动委会的具体日常工作则由指导员负责处理。这样，各县动委会的实际权力也为我党所控制。在我党的努力工作下，各级动委会在动员民众工作上可谓卓有成效。仅1937年底到1938年初，第五战区的民众团体，如青年抗日救国团、职工抗日联合会、妇女抗日联合会、农民抗日救国会以及儿童团、姊妹团等就象雨后春笋般地遍及苏鲁豫皖四省边区。据不完全统计，至1938年初，特委所属范围内的民众抗日团体有1518个，成员约36万人。这些民众抗日团体，绝大多数是在我党直接领导下进行活动的。如“青年抗日救国团”，郭影秋以总动委会组织部总干事的身分，亲自主持召开有几千人参加的成立大会，宣布第五战区青年抗日救国团正式成立，共产党员刘剑（后唐秉光）出任该团常务委员（即主要负责人）。会后创办《救国青年》报，共产党员李锐任该报主编。不久，各县也相继成立起“青年抗日救国团”。该组织后来逐步发展成为抗战初期该地区一支相当规模的群众抗日武装。

和“青年抗日救国团”几乎同时成立的另一个群众抗日团体——“徐州职工抗日联合会”，由总动委会组织部职工干事、共产党员徐致雨担任主任委员。接着又在津浦、陇海两路和烈山、贾汪、枣庄三矿也成立了职工抗日联合会，会员多达上万人。

在第五战区组织领导的抗日活动中，颇有影响的是

“抗敌青年训练班”。1937年冬，平、津、鲁、沪等地相继沦陷，各地的流亡学生和爱国青年纷纷云集徐州，他们怀着满腔热忱和报国之心，请缨抗敌。这是一支不可低估的抗日骨干力量，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因此，我党积极向李宗仁建议，招募这批青年，举办“抗敌青年训练班”。李宗仁采纳了我党的建议。1937年11月12日，第一期“抗敌青年训练班”在徐州中山礼堂举行了开学典礼。统战对象、原广西省教育厅厅长雷宾南先生担任训练班主任。特委选派郭影秋、陈筹、佟子实等党内同志担任政治教官。第一期训练班共300人，训期3个月。训练结束后，由总动委会组织部把这批进步青年组成11个工作团，派往徐州周围各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随着事态的发展，来徐州的流亡学生也越来越多。“抗敌青年训练班”第二期人数增加到5000人，并改名为“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以下简称青年军团），“青年军团”分政治大队、军事大队、女子大队和艺术大队。李宗仁亲自兼任该军团主任。匡亚明、张百川、郝敬涛、臧克家、佟子实等一大批党内同志和知名人士出任政治教官。这是在抗战初期较有影响的创举，连蒋介石也为之动心，试图把“青年军团”纳入蒋系“中央干训团第二团”，李宗仁没有答应。李曾为此感到骄傲，他说：“蒋介石有中央干训团；共产党有抗大；我有青年军团”。该军团培养了一大批抗日青年骨干，同时也为我党造就了一批人才。许多进步青年是在训练班受到我党的教育和影响，后来走向革命道路的。

在中共苏鲁豫皖特委同第五战区的统战工作中，还有

不应忽视的一点——这就是对台儿庄战役做出的贡献。“台战”的胜利是和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众团体的大力支援是分不开的。正当台儿庄战役期间，各县动委会在我党同志的带领下组织宣传队、担架队、卫生队和运输队开赴前线。中共党员栗培元，以县动委会的名义，把全县 10000 多辆牛马车集中在陇海铁路运河镇车站，负责给中方参战部队运送粮草、弹药和抢救伤员。他们虽然不是拿枪参战的战士，但他们和战士们同样勇敢，冒着枪林弹雨，不问白天黑夜，前仆后继地参加支前工作和救援工作。尤其是特委直接领导下的苏鲁人民抗日义勇总队，主动配合“台战”，在临城一带破袭交通，袭击日军。

台儿庄战役的胜利，对国内外震动很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志。总动委会常委、组织部总干事郭影秋在党的指示下，率领慰问团到前线慰问参战部队。全国各地的救亡团体和知名人士也纷纷来徐进行演讲和宣传。如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平津流亡同学会、北平移动剧团、上海歌咏队、上海话剧演出二队、四川旅沪同乡会战地服务团等 40 多个救亡团体以及许德珩、章乃器、李公朴、冼星海、张瑞芳、金山等一大批知名人士先后到徐州来参加抗日宣传活动。这些更有力地推动着第五战区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

(八)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特委开始组建自己的抗日武装。早

在1935年特委刚成立时就有一支小武装(亦称“打狗队”),当时只有几条枪,主要的任务是惩治叛徒特务,保卫特委机关和同志们们的安全。特委迁到徐州以后,根据黄口会议精神,在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组织民众抗日团体的同时,注意发展自己的武装。但是,根据第五战区总动委会的组织条例规定,各级动委会只许成立民众抗日团体,不许建立武装。特委在这个问题上不是“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而是根据毛泽东指示精神,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各县根据特委的指示,以动委会的名义在各地——如沛县的马庄、龙固,丰县的李新庄,铜山的和畅庄等举办抗日军事训练班,筹集枪支弹药,从而开始组织小股武装。开始名称并不统一,有的叫“农民自卫队”,有的叫“青年救国团”。但这些武装都没有得到第五战区认可,因而武器弹药、人员给养和薪饷没有来源。为了取得合法地位,郭子化、张光中等同志多次找第五战区游击总指挥李明扬,要求拨一个“人民抗日义勇军”的番号。李问郭子化:“你们有多少人?”郭答:“有200多条枪,500余人。”李说:“仅几百人还叫什么义勇军,就叫义勇队吧。”在他看来“一军之众”目标太大,“一队之众”则既不得罪共产党,对上也好交待。而郭子化等人认为,“队亦无大小”,这并不能限制我们武装力量的发展。就这样,我党从李明扬那里领来了“第五战区人民抗日义勇队”的番号。从此,我们的武装得到国民党第五战区的承认,成为我党领导下的一支抗日武装。

1938年5月17日夜,徐州失守前夕,特委撤出徐州,

回到了鲁南山区，在峰（县）滕（县）边的老古泉召开会议，将沛、滕、峰三县“人民抗日义勇队”合编为“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特委委员张光中任总队长，鲁南中心县委书记何一萍任政治委员。辖3个大队，约600余人。这支抗日武装自成立以来经常在鲁南神出鬼没地伏击日伪军，重点破坏和袭击临（城）枣（庄）铁路和津浦铁路的兖州至临城段，扰得敌人惶惶无宁之日。名震全国的“铁道游击队”就是由张光中领导的一支小武装。这些斗争为以后鲁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起到了重大作用。

1938年6月，特委决定将微山湖以西的丰、沛、萧、砀（山）、鱼（台）、铜（山）等县的抗日武装合编为“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亦称湖西人民抗日义勇总队），李贞乾任总队长，王文彬任政治委员，郭影秋任政治部主任。成立时约千余人，不久发展到五六千人，20多个大队，成为湖西地区一支强大的抗日力量，多次给日伪军以沉重地打击。

1938年7月，中共中央电示，将中共苏鲁豫皖特委划归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领导。省委决定，撤销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分别成立苏皖、鲁南、苏鲁豫三个特委，郭子化调任苏鲁豫皖省委统战部长。至此，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但她的出色工作，为苏皖、鲁南、苏鲁豫三块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斗争概述

邓 礼 峰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派遣自己的优秀儿女——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踏上了抗美援朝的征途。在抗美援朝的8年里,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并肩奋战,经过3年战争,打败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①,迫使敌人接受停战;战后5年间,又与朝鲜人民一起维护了停战协定的实现,直到1959年全军光荣班师回国。中国人民志愿军通过自己的英勇斗争,圆满地完成了祖国人民赋予的伟大历史使命,取得了具有伟大的世界意义和历史意义的胜利,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高举义旗,抗美援朝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形成了帝国主义阵营和社

^① “联合国军”有: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加拿大、泰国、法国、土耳其、菲律宾、希腊、比利时、哥伦比亚、埃塞俄比亚、南非联邦、卢森堡,还有南朝鲜,共17个国家和地区的军队。

会主义阵营，两者之间由于社会制度不同，政策不同，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激烈斗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的美帝国主义，支持各国反动派，企图维护殖民统治，推行霸权主义和侵略扩张政策，妄图独霸世界。

1949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把帝国主义势力最后赶出了中国大陆。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取得革命的伟大胜利，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政治中最大的事件，它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改变了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极大地激励和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美国不甘心其政策的失败，于1949年底提出了建立所谓新的“太平洋防线”，并强化对日本的占领，蓄意与亚洲人民为敌。

1950年6月25日拂晓，朝鲜内战爆发，美国立即迫不及待地发动了武装干涉朝鲜内政的侵略战争。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其驻远东的空、海军参战，支援李承晚集团的军队。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公开宣布武装入侵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其海军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与此同时，美国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个常任理事国缺席的情况下，故意歪曲朝鲜国内战争的性质，以“紧急援助”李承晚集团为名，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非法决议，为美国搜罗侵朝军队。30日，美国陆军第8集团军直接参加地面作战。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非法授权其指派司令官统一指挥侵朝各国军队，并使用联合国的旗帜。从此，美国就打着联合国

的“合法”旗号，公开进行了对朝鲜的侵略战争。英雄的朝鲜人民军以坚决的战斗行动，给了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有力回击，将美李军队压缩到洛东江三角地区。美国侵略者不甘心其最初的失败，乘朝鲜人民军主力胶着于洛东江、后方空虚之际，组织了美军陆战第1师、步兵第7师、炮兵、坦克兵、工兵部队等共7万余人，在舰艇260余艘、飞机500余架配合下，于1950年9月15日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截断朝鲜人民军的后方交通，配合正面进攻，夹击人民军，使人民军遭受严重损失。侵略者更企图一举吞并全朝鲜，为此它疯狂北进，并不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再警告，于1950年10月初，大举越过三八线，向中国东北边境的鸭绿江和图们江边疯狂进犯，并狂言：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把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美国侵略军的飞机也不断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的城市和乡村，打死打伤新中国的和平居民。这一事实表明美国侵略者不仅残暴地侵略了朝鲜，霸占了中国的领土台湾，而且继续严重地威胁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对此，中国人民不能不有所反应。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组成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义旗，于10月19日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一起抗击美国侵略者。11月4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这一正义行动。中国全境除台湾外很快掀起了波澜壮阔的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

五战皆捷，将敌人赶回三八线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之初，根据当时敌我双方的条件及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决定“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采取以战役进攻或防御为基本的作战手段，实行近战、夜战、速决战的战术，进行大胆的迂回包围，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以求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打退敌人的进攻。在此方针下，历时7个半月，连续取得5个战役的辉煌胜利。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出国第一仗。当时，敌人正疯狂冒进，西线先头部队已进到临近中国边境鸭江边的楚山。志愿军在开进途中与冒进之敌在温井遭遇，迅速采取了坚决勇猛的进攻，给敌人以突然打击。在东线，志愿军在黄草岭一带也阻止了敌人进犯。经过12昼夜激战，歼敌1.5万余人，把敌人由鸭绿江边打退到清川江以南，粉碎了其一举吞并朝鲜、攻略鸭绿江沿岸的计划，取得序战胜利，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敌人遭志愿军第一次迎头打击后，仍迷信其空、海军优势，对志愿军的战斗力严重估计不足，认为志愿军兵力“最多不过六七万人”，“不是一个不可侮的势力”，故仍未放弃打到鸭绿江边的野心，很快又集中精锐部队20多万人，发动了所谓“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志愿军识破了敌人恃强骄狂的心理，则巧妙地利用并扩大了敌人的错觉，将主力隐蔽，故意示弱，诱敌深入到预定战场后，

突然发起反击，粉碎敌人的进攻，并乘胜追击，收复平壤，把敌人赶回三八线。东线志愿军也对长津湖地区之敌发起猛攻，敌被歼一部以后，狼狈由海上逃窜。12月24日，第二次战役遂告结束，战役历时1个月，歼敌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也将也死于逃命中），缴获了大量辎重装备，彻底粉碎了敌人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恢复了三八线以北及瓮津半岛广大地区，扭转了战局，迫使敌人由疯狂冒进转为狼狈退却，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振奋了世界人心，配合了我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斗争。

敌军遭志愿军第二次战役沉重打击后，被迫退至三八线，并由轻视志愿军转而对志愿军发生畏惧，企图利用原有工事建立防线，并玩弄“停火”阴谋，以争取时间整顿残部，待机卷土重来。中朝方面识破敌人阴谋，决定集中两国部队主力（志愿军6个军、人民军3个军团），乘敌人立足未稳，发起新年攻势，于1950年除夕——12月31日17时，采取正面多路突破，渗透迂回，各个歼灭敌人和专寻南朝鲜军打的方针，一举突破“三八线”防线，并向敌纵深发展，解放汉城，将敌驱逐至三七线附近，接着又及时识破了敌诱我军深入的阴谋，果断地停止了战役追击。此役连续作战7昼夜，前进80至110公里，歼敌1.9万余人，粉碎了敌人固守三八线、整顿败局、准备再犯的企图，更加深了敌人内部矛盾和失败情绪，扩大了中朝两国人民和军队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

敌遭我军第三次打击，丢失汉城，败退至三七线之后，

以美国为首的侵略阵营失败情绪更加严重，争吵愈加激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周恩来总理则适时向国内外重申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主张，使美国更加陷于孤立。美国为挽救败局，乃一面整理败军，一面从欧洲、美国本土和日本急调老兵补充其侵朝军队，接着于1951年1月25日以全力发动了新的进攻，企图破坏我军进攻准备及争夺战争主动权。我军则于汉江南岸展开顽强阻击，并在横城地区对突出之敌进行猛烈地反击。随后为大量歼敌，进行了机动防御。在100公里的纵深阻敌87天，敌人每天平均爬行不到1公里半，却损兵7.8万余人，最后被我军箝制在开城——杆城一线。而我军则赢得了时间，掩护了战略预备队的集结，为第5次战役的发动创造了有利条件。

敌遭我军严重打击被阻在三八线附近后，企图以其深远预备队从我军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峰腰部建立新防线”。我军为夺取战场主动权，粉碎敌人登陆计划，确定：以一部兵力从金化至加平劈开战役缺口，将敌东西割裂，然后以主力对西线之敌实施两翼迂回，以一部兵力实施正面突击，力求在三八线以北大量歼灭其生动力量，相机向敌纵深发展的方针。乃于4月22日黄昏，发动了反突击战役。我军采取抓一面打一面的办法，首先以一部兵力箝制东线的敌人，而集中主力歼灭西线之敌人；然后则以一部兵力抓住西线的敌人，而集中主力歼灭东线的敌人。连续奋战50天，歼敌8.2万余人，粉碎了敌在我军侧后登陆、夹击我军的企图，锻炼了新入朝参战的志愿军部队。在战役结束我军向三八线转移时，敌乘机向我军反扑，在我

军顽强的阻击下，终于被阻止在三八线附近地区。是役，我军亦付出了相当代价，特别是在战役结束阶段实施转移时，由于敌我装备水平相差悬殊等原因个别部队受到较大损失。

英勇的中、朝人民军队，连续经过5个战役，共歼敌23万余人，将侵略军从鸭绿江、图们江边打回到三八线附近，剥夺了敌人战争主动权，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从而奠定了朝鲜战争胜利的基础。

开城谈判开始，粉碎敌人夏秋攻势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经我军5次打击，损失严重。美国统治集团承认：侵朝战争是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妄想进攻，又丧失了战略进攻的能力。在走头无路的情况下，不得不开始考虑接受停战谈判。但它对这样的谈判又不是心甘情愿地接受，还迷信其技术装备的优势，认为凭借这一优势，还可以赖在朝鲜同中朝人民军队抗衡。于是一面伺机进犯，一面在谈判桌上进行政治讹诈，破坏谈判的进行。由此，朝鲜战争在战场上出现了长达两年零一个月的长期对峙；与此同时，双方在谈判桌上进行了异常尖锐、曲折和复杂的长期斗争。出现了谈谈打打，边谈边打，两种尖锐斗争交织进行的局面。对此，我军采取了“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双管齐下”的方针，以不同形式同敌人在两条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1951年7月10日，朝鲜战争双方谈判代表在开城开

始了朝鲜停战谈判。但美方毫无诚意，谈判一开始便采取了拖延、讹诈的政策，不愿公平合理地解决问题。在开始谈判后的第3天，美方便以记者新闻采访的枝节问题中断会议。随后，又提出将军事分界线划在我军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我方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当这一无理要求遭到中朝方面严词驳斥和坚决拒绝后，又狂叫“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接着向东线人民军发动了“夏季攻势”，妄图以所谓“军事压力”为配合，迫我方就范。英勇的人民军，奋战1个月，给敌以严重杀伤，粉碎了敌人攻势，打得敌人把人民军驻守的“851”高地称之为“伤心岭”。敌夏季攻势未达成目的，接着，又于9月29日，向志愿军坚守的阵地发动了所谓“秋季攻势”。敌人施展其“钢铁战术”，集中使用了大量坦克、大炮和飞机发起号称所谓“特种混合支队作战试验”的进攻，我军依托野战工事，在敌人浓密炮火下，英勇抗击，逐山争夺，寸土必争。至10月22日，最终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尔后，中朝军队乘胜进行了一些战术上的反击并收复了朝鲜北部沿海岛屿。在这一时期，中朝军队共歼敌25万余人，而美方在遭我军事上严重打击后，不得不于10月25日同意恢复停战谈判，并放弃了将军事分界线划入我军阵地后方的要求，接受了我方提出的“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方案。

粉碎敌人的“绞杀战”和细菌战

1951年8月，美方为了配合停战谈判，对中朝军队施

加军事压力，在地面部队发动夏季攻势的同时，以其航空兵对我军后方发动了“绞杀战”，大肆轰炸破坏我军后方铁路、桥梁。企图破坏我军防御稳定性，分割我军前线与后方，扼杀我军补给线。这时，敌侵朝航空兵，已增加到24个大队又7个中队，各型飞机1800多架，其中大量用于“绞杀战”，对朝鲜北方轮番轰炸昼夜不停。战争期间，敌机共出动15万多架次，投弹共9.5万多吨（约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投入英国本土各类炸弹的1.5倍），我方通车路轨、桥梁和隧道被炸毁共3.4万余座次，长达2900余公里，铁路线上平均7公尺落弹1枚。为了保证作战胜利，志愿军空军、高射炮兵积极作战，铁道兵、工程兵以及后勤战线上的指战员和铁路员工，在“以重点对重点，以机动对机动”的方针下发扬了无比英勇顽强的精神，发挥了高度智慧，创造性地、适时地采取各种有效对策，创造了多种列车运行方法；在弹片横飞中，在盛暑和严寒中，迎着激流和冰水，日夜抢修被破坏的铁路桥梁。由于指战员和铁路员工的英勇斗争，此期间铁路运输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近3倍。

美军还企图以重点封锁办法，破坏我军公路运输，派飞机昼夜不息地对交通要道轮番轰炸扫射。我军则对之采取加宽、加固原有公路和构筑新公路，增设汽车厂所、便桥和对空监视哨等办法。汽车兵更是机智沉着与敌机斗智，冲破敌封锁。此间，虽然敌机轰炸日益残酷，而我军运输效率却提高70%。

由于我军采取了相应的有力措施，逐渐完善了为适应

现代化战争所需要的后方保障体系，建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1952年上半年的物资运输任务，至该年5月即已提前完成，有力地保证了军需民用。至此，敌人的“绞杀战”被我军彻底粉碎。5月31日，美国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说：“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

1952年初，美军在实施“绞杀战”的同时，又违背国际公法，侵犯人类尊严，秘密地施行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向我方大量撒布细菌，企图制造大片疫区，残害朝中军民，削弱我军有生力量。敌人采用飞机投掷或用火炮发射细菌弹布撒细菌，在投掷的昆虫和鼠类等动物中带有病毒共10余种，多以污染水源、交通要道与居民集中点为目标。截至该年3月底，美军布撒细菌即达804次之多，遍及朝鲜北方的7个道44个郡。大规模细菌战实施之初，曾给中朝军队及朝鲜人民造成了一定危害。在洞悉敌人的阴谋企图后，中朝方面十分重视，紧急动员很快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细菌战的斗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各部队和朝鲜政府、人民密切合作，组成联合防疫委员会，开展防疫卫生运动，捕打带菌毒虫，灭鼠灭蝇。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中朝军民因染细菌而死的极少。同时，中朝方面用掌握敌人的大量细菌战确凿证据，公开展览，并邀请国际科学委员会、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进行实地调查，向全世界揭露了美国细菌战的罪行，使其遭到了世界各国公正舆论的谴责，美国在政治上和道义上也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巩固阵地的斗争

我军为了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利用战线稳定的时机，采取积极手段，巩固现有阵地。广大指战员在1951年夏秋防御作战中，创造了加深的防炮洞，并逐步把防炮洞发展成为马蹄形小坑道，出现了坑道工事的雏型。这种初级坑道工事的出现，对当时我军防御的稳定性起了很大的作用。经过领导及时总结、推广逐渐发展完善。1951年底在全军掀起了构筑坑道工事的热潮，至1952年5月，我军第一线主要阵地的坑道工事已基本完成。到8月底，各军第二防御地带阵地工事又基本完成。至朝鲜停战时，横贯朝鲜半岛北纬38度附近250余公里的整个战线，形成了具有20至30公里纵深的、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史无前例的地下长城。这条坚固防线，工程极为浩大，相当于从在陇海铁路西安到连云港段挖通一条石质隧道。全部战壕和交通壕比万里长城还长百余公里。如果用挖出的土石（6000万立方米）修一条高宽1米的长堤，其长度可绕地球1周半。这一浩大工程，却几乎全部是靠人工双手筑成的。这条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的形成，标志着我军阵地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我军与现代化装备的敌人实施阵地战可靠的基础。不仅可以同敌人对垒进行可靠的阵地防御，而且可以依托它实施阵地进攻战。

当1952年春季我军阵地趋于稳定之后，在加强阵地的

同时，我军广泛开展了“冷枪冷炮”狙击活动和小部队的袭击、伏击活动，并以小型的战术出击挤占敌我接触的中间地带。坚守坑道的部队发挥智慧，研究敌之活动规律，运用假工事、编草人等办法欺骗敌人，每天杀伤敌人几十几百以至上千，打得敌人终日惶惶不安，龟缩在工事里。同时，还展开了群众性的敌前小分队活动，用化装到敌后潜伏、诱敌潜伏、夜间突然袭击、摸哨等办法，把斗争焦点推向敌人前沿，使敌人一夜数惊，更加被动挨打。还展开了地雷大搬家活动，许多战士机智地摸到敌前沿，起出敌方地雷，埋在敌军活动的通路上，炸得敌人不敢出来活动，敌人的嚣张气焰大大减杀。随着我军工事加强，敌人的空、炮轰击也更加频繁，向我军阵地进攻不断。但由于我军坚守坑道，与敌反复争夺，敌多次进攻都碰得头破血流，而我军阵地却巍然不动。总计自1951年12月至1952年8月，我军进行了攻防战斗1800余次，中朝军队共歼灭敌人11.7万余人。我方阵地的空前巩固，为尔后进行较大规模的阵地攻防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鏖战上甘岭

由于我军阵地日益稳固和敌人“绞杀战”、细菌战的惨败，加之祖国人民展开抗美援朝捐献运动（仅在一年之内即捐献了可购买战斗机3710架的旧币55650亿余元巨款），大力支援，志愿军愈战愈强。为粉碎敌人可能的局部进攻，我军先敌举行战术反击，于1952年9月，有计划地

向敌 60 个目标攻击 77 次，经反复争夺，大量歼敌，最后巩固了 17 个阵地，锻炼了部队，提高了攻坚能力，丰富了攻击敌坚固阵地之经验。

在我军发起战术反击作战中，敌军一直注视着我军行动，继续其局部进攻的准备，最后将其局部进攻的要点选在了上甘岭。上甘岭，位于我军中部战线战略要点五圣山南麓，阵地突出，直接威胁着敌之金化防线。敌人为了破坏我军正在进行的战术反击作战，为了造成在谈判席上的有利地位，为了改善其在金化地区的防御态势，于 10 月 8 日，片面中断了停战谈判，接着，在 10 月 14 日向上甘岭志愿军两个连的阵地发动了进攻。侵略军十分猖狂，调集兵力 6 万余人，大炮 300 余门，坦克 170 多辆，出动飞机 3000 多架次。对志愿军 3.7 平方公里阵地上，倾泻了 190 万发炮弹，5000 余枚炸弹（最多一天炮弹为 30 余万发，炸弹 500 余枚）。战斗激烈程度为前所罕见，特别是炮兵火力密度，已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水平。我方阵地山头被削低两米，高地的土石被炸松 1 至 2 米，成了一片焦土，许多坑道被打短了五六米。敌人虽然使用世界战史上空前集中的炮兵，但打不破志愿军的钢铁防线。志愿军部队依托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防御阵地，英勇顽强地抗击进攻之敌，每一表面阵地都反复争夺数次，战况空前紧张激烈。在战斗中，指战员们发扬了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同甘苦，共患难，团结战斗，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与敌反复争夺，顽强坚守住坑道，使我军每一个阵地都成为消耗敌人的“无底洞”。在战斗中，我军出现了以

身体堵塞敌人枪眼，为冲击部队打开道路的特级英雄黄继光；双腿被打断仍坚持指挥到最后一口气，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滚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的一级英雄排长孙占元。还有许许多多英雄人物，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上甘岭持续鏖战 43 天，敌我反复争夺阵地达 59 次，我军共打退敌人 900 多次冲锋，歼灭敌军达 2.5 万余人，而上甘岭阵地始终在我军手中。敌人大肆吹嘘的由敌第 8 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亲自指挥的攻势，最终被我军彻底粉碎，敌人的尸体填满了上甘岭阵地前的山谷。之后，敌再也没有发动过类似上甘岭这样大规模的进攻。

为实现停战的夏季反击战役

敌人在上甘岭惨败之后，其从正面进攻打破对峙局面的企图完全破产。想扩大战争，又准备不足；想扩大南朝鲜军以增加机动力量，又非一时能办到；使用原子弹，又慑于世界人民的压力还有顾忌；最后只剩从我军侧后方登陆这张王牌了。于是，敌人进行了一连串的活动和准备。我军识破敌人的活动企图，即在全军进行广泛深入的反登陆备战动员，激发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思想，树立了坚定的必胜信心，迅速地在东西海岸展开了构筑坚固阵地的浩大工程。增修道路，储备物资，调整部署，进行了规模巨大的紧张的反登陆作战准备工作。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远胜于任何一次战役准备。由于我军反登陆作战各项准备的胜利完成，严阵以待。这样，敌人在正面攻不动，我军

两翼海岸又森严壁垒，被迫不得不放弃其登陆进攻的企图，于1953年4月26日同我军恢复停战谈判。

这次谈判，虽然达成停战协议的可能性较比以往增大，但美国统治集团中的好战分子和李承晚集团仍在继续叫嚣战争，仍在谈判中节外生枝。因而，战争继续拖延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为促成停战的实现，我军发动了规模较大的夏季反击战役，在军事上给敌以更大打击，密切配合谈判斗争。战役自5月13日起，连续给敌以三次打击：第1次规模较小，歼击敌连以下目标。第2次在北汉江两侧攻击敌营团阵地，规模稍大，取得了突破敌人整营整团阵地的经验。当遣俘问题达成协议，停战签字作具体安排的时候，李承晚集团竟然破坏协议，以6月17日起，以“就地释放”为名扣留我方（朝鲜）被俘人员2.7万余人，并且狂妄地叫嚣要“单独干”和“北进”，企图破坏停战的实现。我军为了狠狠打击李承晚集团，迅速组织了第3次打击（金城战役）。我军以强大野战部队，在1360余门火炮支援下，向敌人4个师据守的宽25公里的防御正面，突然发起猛烈进攻。仅仅1个小时战斗，即全线突破，一昼夜之间将敌人全部打垮，突破敌人纵深15公里，完成了全部进攻任务。此后又打退了敌人5个师1300多次反扑，巩固了既得阵地。战役共歼敌12.3万余人，收复土地240余平方公里，给敌人以有力打击。敌人惊慌万状，唯恐我军再攻，无可奈何只得接受停战。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双方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举世关注的朝鲜停战终于实现了。

为维护朝鲜停战协定而斗争

朝鲜停战的实现，是中朝人民军事打击和政治斗争胜利的结果，它为尔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但这仅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停战后美国并不甘心其失败，它从其全球战略利益出发，继续推行敌视中朝人民的政策，阻挠和破坏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继续制造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千方百计地破坏停战协定的实施。而中朝方面为巩固停战胜利，维护朝鲜停战协定的实施，进一步争取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又展开了新的斗争。为此，停战后志愿军面临的主要任务是：严格遵守停战协定，维护停战协定的实施；以战备姿态进行整训，继续增强战斗力，严防战争再起；坚守岗位，密切监视敌人，随时准备给敢于破坏停战协定的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

停战实现之初，我军认真履行停战协定各项条款，重新调整了部署，拆毁清除爆炸障碍物，积极协助中立国监察委员会进行工作。而美国侵略者和李承晚集团则截然相反，他们有计划地继续使朝鲜处于分裂对立状态。停战协定签定后仅仅12天，美国就同李承晚集团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规定美国有权在南朝鲜无限期驻留军队；接着他们又强迫扣留大批朝中方面的战俘；拒绝出席双方已商定召开的协商一切外国军队自朝鲜撤出以及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的政治会议；公开违反停战协定，把各种增援性武器运入南朝鲜；强迫中立国视察小组撤出南朝鲜；非法向南

朝鲜运进原子武器，进行原子战争演习；加强扩充训练李承晚军队；不断派遣武装人员入侵非军事区，越界袭击我方人员，派遣大批特务间谍混入我方地区进行破坏，美方军用飞机也不断侵入我方上空骚扰，进行一系列破坏停战协议的活动。

对于敌方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我方密切注视，在几个主要问题上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即关于召开朝鲜政治会议——会议形式、参加国、议程安排等问题上的斗争；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在板门店会谈和日内瓦会议中进行斗争；在战俘遣返问题上，和美方严密控制未直接遣返的战俘，阻挠、破坏中朝对战俘的解释工作和红十字会小组的工作，纵容南朝鲜和台湾国民党强迫扣留和虐杀我方战俘，破坏战俘遣返协议的行为作斗争；在实施停战协定监督问题上，和美方违反停战协定将作战物资非法运入南朝鲜，以及其阻挠破坏中立国监察委员会视察小组工作的行为作斗争；在军事分界线上开展反入侵反挑衅的斗争。同时，我军积极修筑加固工事，进行军事、政治和文化训练，加强现代化建设，以提高部队作战能力，努力维护军事停战线上的稳定，随时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在停战后的5年里，我方警察部队机警地活动在非军事区北侧，昼夜巡逻放哨，爬山越岭，严密防范潜入的特务，先后共捕捉敌特达700人之多。在此期间，敌人在非军事区或通过非军事区违反停战协定的挑衅活动达792起，由于中朝人民军队常备不懈，保持高度警惕，严阵以待，将敌人的挑衅一一击破，从而保持了停战局面的稳定。

朝中两国人民和政府一贯主张和平解决朝鲜统一问题，对此作了一系列的重大努力，中国人民志愿军积极拥护，并在1954年9月至1955年10月，先后分3批撤出19个师的兵力，以实际行动表现了我军保卫和平的诚意和决心。

一 帮助朝鲜人民恢复经济和建设

中国人民志愿军从入朝第一天起，就遵循着毛泽东“爱护朝鲜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指示，尊重朝鲜政府，团结朝鲜军民。在战争紧张进行的时候，广大指战员在战火中抢险救灾，抢救朝鲜人民的生命财产，出现了罗盛教那样的国际主义战士；同时，在战斗空隙中，也尽一切力量帮助朝鲜人民进行生产劳动。朝鲜战争停战后，志愿军广大指战员更积极响应彭德怀司令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全军将士把朝鲜人民面临的困难看作是自己的困难，将尽其最大的努力，以自己的劳动来帮助朝鲜人民克服困难，并以此为最光荣的任务”的号召，把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重建美好家园，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战争刚结束，就以建设祖国般的热情参加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恢复重建工作。指战员们以奔赴战场那样高昂的士气，奔赴平壤、咸兴、新义州等重要城市的建筑工地和广大农村。他们的口号是：“工地就是战场”，“多流一把汗，多增加一分友谊”。

志愿军的铁道兵部队，与朝鲜人民共同努力，停战后

仅数小时，就使平壤至新义州的铁路恢复畅通；停战后的3个月，就修复了朝鲜北半部的原有铁路，并且新建和修复了大小桥梁。担任重建平壤的部队更是感到无比光荣。指战员们都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和这个举世闻名的英雄城市的名字联在一起。他们“以建设北京的心情建设平壤”，边干边学，不仅很快掌握了各种技术，并且有很多创造，从而使有的工程效率提高了3倍到10倍；他们还以厉行节约、废料利用的办法，解决了物资器材不足的困难。仅用1年多的时间，就在平壤市修建了20.7万余平方米的建筑物，其中包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综合办公厅大楼、中央综合医院大厦、人民经济大学、美术大学、革命烈士子女学院，以及其它工厂、学校、医院、电影院等。志愿军还以为数千百万的劳动日协助朝鲜人民兴修水利，到1957年底止，先后修复了“见龙”、“泰川”等8座大型水库。在施工中，指战员以高度的劳动热情，有时在齐腰深的洪水中搏斗，有时在冰水中施工，有的战士在施工建筑中献出了生命，表现了高度国际主义精神。志愿军还投入大量人力帮助朝鲜人民重建家园。当停战后朝鲜各地居民回到故乡时，志愿军各部队立即展开了帮助驻地人民重建家园的活动，指战员们进行了紧张的突击劳动。战士们变成了木匠、铁匠、泥水匠、砖瓦匠，盖房屋，修学校，填平炸弹坑，起出地雷和爆炸物，用很短的时间使居民进入温暖的住宅，使朝鲜人民安居乐业。

8年中据不完全统计，志愿军共帮助朝鲜人民修建公共场所881座，民房45412间，恢复和新建大小桥梁4263

座，修建堤坝 4096 条、全长 429.2 公里，修建大小水渠 2295 条、长达 1218.7 公里，平整农田 8.5 亿余坪，送肥料 1314.6 万担，植树 3608.6 万余棵，运送粮食物资 6.38 万吨。志愿军对待朝鲜人民的疾苦，就象对自己亲人的疾苦一样关心。8 年来，特别在战时，志愿军节衣缩食，以粮食 2126 万斤、衣物 58.9 万件，帮助部分驻地人民渡过灾荒。还为朝鲜人民治病 188 万余人次。

这一切行动，体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国际主义精神，进一步增进了中朝友谊，受到了朝鲜劳动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朝鲜人民的热情鼓励和赞扬。金日成元帅说：“我们朝鲜人民从参加朝鲜战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身上，看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光荣的人民中国的新儿女，看到了把朝鲜人民的艰难困苦当成自己的艰难困苦并为克服这种艰难困苦而奋斗努力的崇高而纯洁的新型人物的真面貌。”“这种高贵的道德品质，不能不为朝中两国人民和所有尊重人类尊严的人们引为骄傲。”

满载胜利友谊而归

中国人民一贯热爱和平，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缓和远东紧张局势，是中国政府一贯奉行的坚定政策。朝鲜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道为维护停战协定争取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作了不懈的努力。1958 年 2 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撤出一切外

国军队，谋求朝鲜和平统一”的建议充分反映了朝鲜人民要求和平统一的愿望。中国人民完全同意这一建议，中国人民志愿军随即按照中朝两国政府联合声明的精神，决定于1958年将驻朝鲜部队分3批主动、全部撤回中国。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动从朝鲜全部撤出，是为了促进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是进一步缓和远东紧张局势的重大措施；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它再一次表明了中国人民和平诚意，受到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积极拥护和高度赞扬。同时，世界舆论纷纷要求美国军队也应从南朝鲜全部撤走，使美国处于十分尴尬更加孤立的被动境地。

友谊劳动遍地开花 为了满载友谊而归，志愿军在撤出朝鲜的过程中，遵照周恩来总理撤军做到“三好”，即“交好、走好、到好”的指示，和志愿军党委“不骄不傲，善始善终；军队撤出，友谊长存”的方针，掀起了一个为增进友谊而帮助朝鲜人民进行劳动建设的高潮。在撤军之前，各部队根据朝鲜政府和当地群众的需要加紧进行各项建设。还广泛开展了为增进团结友谊积极做好事活动，指战员们提出了“多出一把力，多流一滴汗，多增一分友谊”的口号，积极帮助朝鲜修渠、修坝、修房、修路、修桥、锄草、植树……等许多劳动。他们不顾劳累，日以继夜，好多人不过星期天，每天劳动10多个小时，有的到临行前夕亦不停工，甚至来不及洗去身上的灰尘。朝鲜人民深受感动地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军队”。

交防务留友谊 在向人民军移交防务时，对前沿坑道、堑壕和掩体都进行了维修、清扫和加固。在移交防务的同

时，将营房、营具、大量物资器材和医院的全套医疗设备完整无缺无偿地移交给人民军。志愿军广大指战员提出“交物资表心意，留友谊，交者愉快，接者满意”的口号。所有部队将伙食单位自养的猪、羊，种的蔬菜，自制的生产工具赠给人民军接防部队。交接前，粉刷营房，美化环境，装饰礼堂、俱乐部，增制用具。处处修得整整齐齐、停停当当，工作仔细，用意深切。人民军接防时，部队列队欢迎，象亲人般接待人民军战友。指战员们还拿出最心爱的礼物赠送人民军同志留念，仅据一个师统计，就赠送纪念品74种、1万多件，有纪念章、照片、织锦、日记本、钢笔、毛巾等等。桌子上留下办公用具、告别信、花瓶等等。人民军官兵说：“我们想到的，你们作到了；我们没有想到的，你们也作到了。真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国际主义兄弟间的温暖”。两国军队之间洋溢着无比深厚的亲密战友情谊。

朝鲜全民热情欢送志愿军 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在长期战斗和生活中，以血汗结成了比山高比海深的友谊之情，一旦分别，互相之间都有一种依依难舍的心情，多年的友谊，集中表现出来了。因此，出现了无数难以表达的动人情景和事迹。志愿军回国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内阁专门做出欢送志愿军的决定，组成欢送委员会。金日成首相和朝鲜党政领导人，亲临欢送志愿军现场。朝鲜人民为热情欢送志愿军，在朝鲜各地纷纷组织盛大欢送会，从三八线到鸭绿江，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三千里江山处处鲜花锦旗、人山人海，有优美的演出，有丰盛的欢送酒宴，欢送群众时常歌舞狂欢通宵不散，他们说友谊联欢是最难

得的。很多老大娘带着儿女拿了礼物翻越数十里的大山，来找曾在她家住过的志愿军指战员，找到以后热泪横流，依依不舍。朝鲜父老兄弟姐妹们，为了表示他（她）们的心意，赠给志愿军指战员们深情的礼品作为珍贵的纪念。老大娘将结婚的金戒指、银耳环送给战士，嘱咐他们传诸后代；老大爷将祖传宝剑佩在干部身上；妇女们将佩巾、荷包等送给指战员们；姑娘们连夜赶制美术工艺品，小学生把作业本捧给志愿军叔叔，朝鲜人民军指战员包上英雄阵地上的泥土，交给战友带回中国。件件礼品，情深谊厚，千言万语意重情长，千万件礼物代表着千万颗朝鲜人民的心，体现着中朝两国人民的深情厚谊。甚至当志愿军指战员夜晚出发或行军时，朝鲜人民竟手执火炬站在曲折的路旁为志愿军战士照明，他们还在志愿军撤军沿途设上开水站、医疗室，妇女们不时把热毛巾送到战士手里，把一碗碗的糖水送到战士嘴边，姑娘们在指战员胸前带上大红花，老大娘把苹果、鸡蛋、栗子装进战士衣袋里，青年们为战士扛背包，儿童们围着叫：“志愿军叔叔，一路平安！”在炎热的夏天，有的老大娘跟在战士背后搨扇子，边搨边送，友谊话说了一遍又一遍，送行的人送了一程又一程，热情的泪流了一次又一次。连记者、摄影师也因激动得流泪，无法完全记下这些动人的场面。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军过程中，两国人民和军队之间表现出了人间最珍贵的高尚而深厚的友谊，显示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的伟大力量。1958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最后一批部队满载着朝鲜人民的深情厚谊撤回祖国，胜利凯旋。这标志着志愿军抗

美援朝这一光荣伟大的历史任务的胜利完成。

光辉的胜利，深远的意义

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一道，团结奋战，抵抗侵略，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总计中朝人民军队在战争中共歼灭敌军 1093839 人（内美国军 397543 人、英澳军 21099 人、法国军 368 人、加拿大军 2660 人、土耳其军 3060 人、菲律宾军 419 人、荷兰军 110 人、泰国军 406 人、希腊军 89 人、比利时军 344 人、哥伦比亚军 448 人、南朝鲜军 667293 人），美军的伤亡数比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伤亡要多 3 万余人，比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44 个月的太平洋战争中的伤亡要多 1 倍多；志愿军还击落击伤敌人飞机 10162 架，击毁击伤敌人坦克 2006 辆、装甲车 44 辆、汽车 3165 辆、各种火炮 583 门、船只 14 艘；志愿军缴获敌人各种火炮 4037 门、枪 73262 支、汽车 5256 辆、坦克 245 辆、装甲车 51 辆、飞机 11 架、船 12 艘、火焰喷射器 109 具、通信器材 5128 件、各种炮弹 381214 发、枪弹 18960095 发、地雷 12862 枚、手榴弹 134927 枚。美国在战争中消耗各种作战物资 7300 多万吨，开支战费 830 多亿美元。美国在军事、政治和道义上遭到严重挫败以后，不得不签订停战协定。侵朝美军总司令克拉克在签字后颇有感触地说：我是美国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司令官。

8 年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中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和鼓舞下，在朝鲜军民的有力支援下，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战斗，

表现出了惊天动地的英雄气概，出色地完成了党和全国人民的重托，创造了无数英雄业绩，涌现出了30多万功臣和约6000个集体立功单位；其中有494名指战员荣获各级战斗英雄或模范的光荣称号，有52万多名指战员荣获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各种勋章或奖章，其中特级英雄、特等功臣黄继光、杨根思，一级英雄、特等功臣邱少云、孙占元、伍光华、杨连弟、杨春增、胡修道、李家发和许家朋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一起，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荣誉——共和国英雄称号，为中国人民争得无尚光荣的国际声誉。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丰功伟绩在世界人民正义战争史上万古流芳。

抗美援朝战争的光辉胜利，对远东及世界局势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彭德怀同志在1953年12月全国军事高级干部会议上说：“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论从国际或国内来说，也不论从政治、军事或经济上来说，其意义是十分巨大的。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第一，夺回了三八线，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因此也就保障了我国东北的安全；第二，取得了丰富的对帝国主义作战经验，并摸清了帝国主义的底细，使我们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信心更加加强；第三，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也普遍提高，肃清了我国一部分人中间由于长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地位所产生的崇美、媚美、恐美心理，确立了对美帝国主义仇视、鄙视、蔑视的立场，并从而也推动了全国各方面的社会改革工作和建设工作，包括国防建设的工作；第四，因此也就可能推

迟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时间,使其不敢再轻易地进行冒险,并大大地鼓舞了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争取持久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的勇气和信心。”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军威,打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威。它雄辩地向全世界显示,中国百余年来遭受帝国主义列强任意欺侮的历史已经永远结束了,新中国已经成为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重大因素。任何霸权主义势力如果与新中国为敌,都只能是自取失败。

抗美援朝运动简介

孙 启 泰

1950年6月25日拂晓朝鲜内战爆发。6月27日，美国派出海军空军等武力入侵朝鲜，干涉朝鲜内政，并命令海军第七舰队向中国沿海出动，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6月28日，毛泽东主席发表讲话，严斥美国对朝鲜和中国领土台湾的侵略，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①同日，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侵略朝鲜、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宣布：中国人民必将收复台湾和一切属于中国的领土，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②6月29日、30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分别发表声明，坚决拥护周恩来外长的声明，坚决站在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

① 《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的讲话》，1950年6月28日。载人民出版社出版《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第3页。

② 《外交部周恩来部长关于反对美国总统杜鲁门6月27日声明和美国武装侵略我国的声明》，1950年6月28日。

的世界人民一边，反对美国的侵略战争。至此，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运动拉开序幕。

1950年7月10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并于7月14日发出《关于举行“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周”的通知》。此后，各地分别举行集会游行和广泛宣传，积极参加“运动周”活动。抗美援朝运动开始波及全国，形成第一个高潮。

朝鲜战争爆发后，正当朝鲜人民军节节胜利之际，美国出于全球战略利益的考虑，于1950年9月15日，纠集约7.5万人的部队，在261艘军舰和500余架飞机的掩护下，在朝鲜中部西海岸的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转入战略退却。美军和南朝鲜军则乘机大举北进，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在这同时，美国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进行侦察和轰炸扫射，美国军舰也不断侵入中国领海进行挑衅。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0月8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签署命令，令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人民军向侵略者作战。

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到达朝鲜前线。10月25日至12月24日，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先后发动了两次大规模战役，歼敌5万余人。于12月6日收复平壤，把美军等赶回到三八线附近，扭转了朝鲜战局。

10月26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的统一领导机关——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抗美援朝总会）成立。此后，各大行政区、省、市成立了地

方分会。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宣言：“誓以全力拥护全国人民的正义要求，拥护全国人民在志愿基础上为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①11月4日至11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联合会、中华全国科普协会、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等群众团体分别发表宣言，坚决拥护各民主党派的联合宣言，号召本团体群众积极参加抗美援朝运动。11月6日、16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社论《为什么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和《中国人民志愿部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意义》，阐述了中国人民要抗美援朝的原因和意义。对动员群众参加运动起了很大作用。在此前后，根据中共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全国纷纷开展了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觉悟。为了加速国防建设，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1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务院公布了《关于招收青年学生青年工人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的决定》。青年团中央、全国学联、全国总工会等分别发出倡议书，号召广大青年团员、青年工人和广大学生积极参加各种军事干部学校。广大青年怀着极大的爱国热情，积极响应，到1951年9月，报考者达58万余人。

抗美援朝运动兴起以后，宗教界、工商界的爱国人士也积极投身之中。9月22日，中国基督教著名人士吴耀宗、邓裕志等40人联合发表宣言，表示“彻底拥护共同纲领，

^① 《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1950年11月4日。

在政府的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①12月12日，四川广元县天主教徒王良佐、尚锡祝等500余人联名发表《自立革新运动宣言》，号召广大天主教徒“积极地以实际行动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巩固世界民主和平阵营，共同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坚持与帝国主义者割断各方面的关系，并肃清亲美、恐美、媚美的思想。自力更生，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新教会。”^②11月30日，天津工商界人士4万多人举行示威游行大会，会后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要“为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到底。”^③在此期间，北京工商联发起了爱国公约运动，各大城市的工商界热烈响应，以积极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交纳税金、捐献财物来支援抗美援朝。此外，北京、哈尔滨、青岛、西安、武汉等地的工商界，都先后举行了数万人以上的示威大游行，12月16日，上海工商界举行了15万人的大示威游行。

在日益高涨的抗美援朝运动中，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发起了慰劳中朝人民军队的活动。11月27日，全国政协召集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举行联席会议。接着，全国政协又于12月1日发出了《对慰劳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运动的协议的通知》。12月22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又发出了《关于开展新

① 《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1951年9月22日。

② 《四川广元县天主教徒自立革新运动宣言》，1950年12月12日。

③ 《天津工商界致毛主席电》，1950年11月30日。

年拥政爱民拥军优属运动的指示》。之后，全国各地广泛开展拥军优属活动，部队同时开展拥政爱民活动。许多地区通过军民座谈会、新年团体、联欢晚会等活动，扩大了抗美援朝宣传，密切了军民关系，坚定了反帝必胜的信念，使抗美援朝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

为了更广泛深入地进行抗美援朝运动，1951年2月16日，全国政协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致各地政协委员会的电文》，要求各地把抗美援朝运动“进一步的普及和深入到每一农村、每一机关、每一学校、每一工厂、每一商店、每一街道和每一民族聚居的区域。”3月14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决议并在全国普及深入抗美援朝运动的通告》。这份电文和通告公布后，立即在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广大群众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先后召开会议、通过决议，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工作作为中心政治任务，积极领导本系统的广大群众深入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

为了慰劳中朝人民军队和援救朝鲜难民，抗美援朝总会于1951年初发起了大规模爱国募捐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据有关材料统计，到5月30日，全国人民就捐款1186亿余元（旧币），捐献慰问袋77万多个，慰问品126万多件。^①

1951年1月，抗美援朝总会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其中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阶层、

^① 郭沫若《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

各界、各地区、各民族的代表。总团团长廖承志，副团长陈沂、田汉，秘书长李颀伯，副秘书长许宝騫。4月初至5月中旬，慰问团八个分团普遍地慰问了中朝人民军队及朝鲜各阶层、各界人民，分送了大批慰问信、锦旗及其价值500多亿元（旧币）的慰问品和慰劳金。随团的文艺工作者表演了多场文艺节目。慰问团归国后，又分赴全国各地，介绍朝鲜战场情况，揭露美军暴行。同年2月，抗美援朝总会又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到国内各地宣讲。2月至9月，志愿军归国代表团走遍了全国20多个省的127个市县和广大乡村，行程10.2万余里，和1025万余人见面，向3450多万有组织的听众作了广播讲演，并运用广播录音、报刊、小册子、开会传达等方式，向全国人民报告了中朝军民英勇斗争的事迹，使全国人民受到了生动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有力推动了抗美援朝运动的发展。

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全国各地还深入、普及地开展了制订爱国公约运动。1951年3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普及爱国公约运动》。6月2日，该报又发表《广泛订立并认真执行爱国公约》的重要社论，号召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政府机关和各人民团体，要“发动人民群众普遍订立爱国公约”。8月8日，《人民日报》再次发表《加强党对爱国公约运动的领导》的社论。在上述社论的推动下，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大力开展广泛订立并认真执行爱国公约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据有关材料统计，到1951年10月，北京、上海等城市，已有80%的

人口订立了爱国公约，河北省 80% 的城市和乡村居民订立了爱国公约。这不仅促进了抗美援朝运动，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国家经济建设发展和财政税收的增加。

为了改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争取抗美援朝战争的早日胜利。1951 年 6 月 1 日，抗美援朝总会发出通告，号召全国各界同胞为志愿军购置更多的飞机、大炮、坦克等武器而捐献。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团中央、全国青年联合会、中国红十字会等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宣言、通告，号召广大群众踊跃参加这一活动。此项活动，再次得到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到 9 月 25 日为止，各界人民共捐款 9970 亿元（旧币）。此外，一些志愿铁路职工、志愿医疗队、汽车司机、防疫队等大批开赴朝鲜，支援中朝人民军队作战。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 50 多个志愿医疗队开赴朝鲜前线。

在抗美援朝运动深入发展的高潮中，1951 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场上也取得了重大胜利。由于看不到胜利的希望，美国不得不接受举行停战谈判的建议。7 月 10 日，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由于双方谈判目标差距很大，难以达成协议，朝鲜战争开始出现边谈边打的局面。

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不仅极大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而且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其他工作。1951 年，在抗美援朝运动的推动下，土地改革深入发展，镇压反革命运动成绩显著。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基督教、天主教的“三自革新”运动更加深入。到 1951 年 10 月 1 日，全国已有 27 万余名基督教徒和大约 18 万的天主教徒在革新宣言上签

字。抗美援朝运动，还大大推动了工厂、农村的生产劳动竞赛运动和增产节约运动。全国工商界除了热烈参加捐献飞机大炮活动外，还开展了集体纳税活动。这些都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952年初，美国公然违反国际法，向朝鲜北部和中国境内撒放带毒菌昆虫。为此，1952年2月24日，抗美援朝总会主席郭沫若发表声明，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坚决声讨并制止美军无视国际公法进行“细菌战”的罪行。1952年3月8日，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声明，严重抗议美国使用细菌武器和侵犯中国领空。为了战胜美国的“细菌战”，中朝两国人民紧急动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防疫卫生运动和抗议声讨美军实行细菌战的运动。全世界人民纷纷谴责美国的细菌战。在世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美国总统不得不于这年4月宣布由克拉克接替被称为“细菌将军”的李奇微，继任侵朝“联合国军”的总司令职务。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中朝军队按照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对被俘的美军和南朝鲜军队的官兵给以宽待。然而，美军却对中朝人民军队的被俘人员施行野蛮的摧残。1952年2月至10月，《人民日报》多次发表声明，揭露和抗议美军迫害战俘的罪行。全国人民积极投入了抗议运动。

在抗美援朝总会和志愿军总部组织下，“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也于1952年1月到达中国，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分赴全国28个省、8个行政区、201个专署、11个自治

区、1054个县市、390个乡镇，共作了5589次报告，直接见面听取报告的人有3660多万人。共组织335次广播会，有组织的听众达1534万余人，文字宣传稿件474篇。他们还把朝鲜前线带回的实物和图片，在31个城市中举办了展览，观众达220万以上。^①朝鲜人民访华代表团也分别访问了中国北京及华北、西南、西北、中南、华东、东北等各大行政区。访华团共参加了5241次欢迎大会，作了访问报告，听众总数达3220万余人。组织广播大会281次，有组织的听众达1232万余人。此外，还通过个别谈话、座谈会、报告工作，向中国人民介绍了朝鲜人民的战斗事迹，揭露美军暴行，宣传了中朝两国军民团结战斗的巨大威力和深厚友谊。1952年5月25日，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朝鲜人民访华团胜利完成任务，在中国人民的热烈欢送下返回朝鲜前线。

1952年9月至12月，由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组成的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再赴朝鲜前线，走访、慰问了中朝人民军队，并于10月26日受到金日成首相的接见。这次慰问，进一步加强了中朝军民战胜侵略者的信心，加深了中朝人民的战斗友谊。

在朝鲜战场上，克拉克为了迫使中朝方面接受其无理的谈判要求，于1952年10月14日又在上甘岭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攻势。但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士，依托

^① 《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李雪三团长在首都各界人民欢送大会的答词》，1952年5月25日。

坑道工事，战胜各种困难，英勇顽强地守住了阵地，取得了歼敌 2.7 万人的胜利。

1953 年 5 月中旬至 6 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为配合停战谈判，先后发动了两次进攻性作战，歼敌 4 万余人。6 月中旬，停战谈判各项协议均已达成，但南朝鲜李承晚集团拒不接受，叫嚷要“单独干”。为了打击李承晚集团，实现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于 7 月 13 日发起金城战役，歼敌 5 万余人，收复土地 178 平方公里。在形势更加不利的情况下，美国侵略者终于在 7 月 27 日，同中朝方面在板门店签订了《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历时 3 年零 32 天的抗美援朝战争至此结束。8 月 11 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回国部队从朝鲜前线回到祖国，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至此，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运动胜利结束。

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是建国后历次群众运动中失误较少而比较成功的一次。这次运动的成功经验值得认真总结。在这次运动中，那些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做出重大贡献的人们，将永远受到人民的崇敬和铭记。

罗瑞卿传略

黄 瑶

青少年时期

1906年5月31日（农历闰四月初九），罗瑞卿出生于四川省南充县舞凤乡清泉坝马家坡（今南充市舞凤乡双女石村）。这里在南充以北，东面依傍着碧绿的嘉陵江，夹江是一片片茂密的竹林，风景十分优美。

罗瑞卿的祖父叫罗盛于，是一户地主，中年逝世后，三个儿子分了家。他的妻子蒲氏随最小的儿子罗春庭生活。这就是罗瑞卿的父亲。罗瑞卿的母亲姓鲜，大户出身，1905年同罗家结亲，其父鲜锦堂在南充北乡有田产，在南充城里还开有绸缎铺，因此两家可算是门当户对。第二年罗瑞卿出世，是难产，请了接生婆。所以，取小名叫接娃子，后来为了讨个吉利，又改名为吉娃子。然而由于罗春庭从小娇生惯养，养成了抽大烟和赌钱的恶习。对于这个家非但不负任何责任，而且还卖地卖家具，卖一切可卖的东西。鲜氏过门不久，这一门非但说不上什么吉祥，而且迅速败落。与此同时，罗瑞卿的弟弟、妹妹一个接一个出世，最小的

妹妹（排行第七）生下是六指，父母以为不祥，加上养活不起，不久便将其送到育婴堂去了。支撑这个家的唯一支柱是罗瑞卿的母亲。她既当妈，又当爹，除了孝敬婆婆、服侍不争气的丈夫和抚育子女外，还要经营家庭的经济。劳累使她心力交瘁，过早地衰老。罗瑞卿热爱他的母亲，对他的父亲十分厌恶。

罗瑞卿在外祖父的资助下，6岁入私塾，13岁入大林寺小学高小读书，三年毕业后入县立中学普通科读书。不久，因家境窘迫，罗春庭想让罗瑞卿也能挣钱贴补家用，便让他辍学到一个绸缎铺当学徒。同时，由父母包办给他娶了一位姓林的姑娘为妻。对于这个包办婚姻，罗瑞卿很不满意，后来这也成为促成他离家出走的因素之一。几个月后，鲜锦堂知道外孙当了学徒，把罗春庭臭骂了一顿，又重新将罗瑞卿送到县中学读书，后来转入蚕桑科。

鲜锦堂平时十分吝啬，然而却舍得在大外孙身上花本钱。原来他虽有三个儿子，却没有一个成器的，于是，便把光耀门楣的希望寄托到罗瑞卿身上。他想按照自己的愿望来塑造外孙，给外孙立了“约法三章”：一是不准看鼓吹“异端邪说”的书刊；二不准参加任何党派；三要规规矩矩读书。如果违约，便要停止经济供应。此时，已是“五四”运动之后，北伐战争之前。鲜锦堂所谓“异端邪说”既包括鼓吹科学与民主的民主主义思潮，也包括马克思主义思潮。鲜锦堂所谓党派指的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

对于外祖父的要求，一心想继续求学的罗瑞卿都应承了。但是，罗瑞卿在学校并不是用功的学生。他把大量的

时间用来踢球、看戏、看小说，尤其是武侠小说。在游戏和课外活动时，他又好胜心极强，输了不服气，不赢不肯罢休。他尽管不用功，但成绩却不坏，这要归功于他的聪明、有捷才。他在读高小时，一次和同学们去一个罗汉堂游览。当看到一尊睡罗汉的塑像时，信口吟道：“一睡睡得好，万事皆了了。我要同你睡，大事没人搞”。由于他的成绩无可指责，对于他上课看小说之类的毛病，老师也就不怎么管了。

罗瑞卿身材高大，交朋友讲究信义，有一股豪侠之气。课外活动，举凡踢球、演剧，他都是积极分子。同学们外出吃东西，他争着会钞。为此，深得同学们的拥护，大家都尊称他为“罗大哥”。

罗瑞卿 1924 年复学后，本想履行同他外祖父的协定，但一入学便碰上了反“佃当捐”的斗争。

20 年代，在大小军阀统治下，四川的苛捐杂税多如牛毛。1924 年，驻南充的军阀何光烈又挖空心思，征收“佃当捐”，亦即由地主和佃户、当铺老板和当户双方各出地租和典当钱数的 1/10，作为捐税。何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南充各界的公愤。在南充中学校长张澜的支持下，南充中学的进步师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佃当捐”的斗争。一开始是上街宣传，接着就兵分几路，下乡抗捐。罗瑞卿参加了东路宣传队。出城过江，走了几十里山路，到达会龙场，同学们得知绰号叫“秦大狗”的何光烈的征收委员秦同淮在一个茶馆打纸牌，便想马上去找秦算帐。罗瑞卿摆摆手，说：“大家一齐去，会打草惊蛇。”他提议由他和另外两位同学

闯茶馆，其余同学埋伏在茶馆周围，以防意外。于是，罗瑞卿一行三人提了木棒，一直闯到牌桌旁，把秦同淮按在牌桌上痛揍一顿，直到秦答应不再收捐才罢手。同学们的正义行动得到了南充工商各界的拥护。众怒难犯，何光烈被迫取消了佃当捐。

罗瑞卿参加反“佃当捐”的斗争，违反了他外祖父的约法三章，但一来这是“初犯”，二来把“佃当捐”反掉，鲜锦堂也得到了好处。因此鲜锦堂对于他的大外孙，还只限于警告，让其“下不为例”。但是，罗瑞卿要冲破他的束缚的行动一旦开头即已是一发而不可收了。

接下来的冲突是为了演剧。罗瑞卿是一个川剧迷，由酷爱川剧而及其他剧种。先是爱看，进而手痒而自己演。开始是演古戏，进而演现代剧。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他参加了《孙中山之死》的演出。戏子，属于下九流。好好的书不念，却去当戏子，鲜锦堂已经大惑不解。而演出《孙中山之死》，在当时军阀统治下的四川，已经牵涉到“异端邪说”，鲜锦堂再也不能容忍了。他去训外孙，外孙不听，两人就吵，乃至砸东西，于是裂痕便一步步扩大。这时，在南充中学已经有了共产党的活动，公开的名义是国民党左派，秘密地建立了共青团（C·Y）的组织。罗瑞卿作为班上推选出来参加学生会的代表同师范班的代表任煜（任白戈）、王义林等结识。他们读了《新青年》和萧楚女主办的《新蜀报》等报刊，思想都倾向进步。当罗瑞卿得知任白戈即将加入共青团时，对任说：“虽然我和外公有约在先。现在还不能参加C·Y，但有什么事大家一起干，我

和革命生死同心”。

这年秋天，共产党员吴玉章以国民党员身份入川建立国民党左派。吴到南充后，任白戈带罗瑞卿去拜访，吴玉章对他们说：“人生在世，要做出一番对人民有益的轰轰烈烈的事业。如同小说、舞台上的英雄豪杰一样。他们一出来，人人高兴。”这番话很对罗瑞卿的心思，听得字字入耳。当时，在南充中学，代表豪绅利益的国家主义派也大肆活动，并同国民党左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有一次，国家主义派诬蔑任白戈贪污了学生会会费，对任进行围攻。罗瑞卿打抱不平，把桌子一拍，接着又跳到桌子上，拍着胸脯说：“哪个要算帐，找老子来算。有理讲理，不许欺人！”理直气壮而又声若洪钟，加上身旁还有一群爱好体育的朋友，罗瑞卿的气势很快便把对方吓跑了。

罗瑞卿这一行动虽然解了任白戈的围，但也把他的政治倾向公开化了。一不作，二不休，以后他便索性置外祖父的禁令于不顾，同任白戈等一道投入士兵运动和工人运动。1926年，南充成立工会，他担任了工会举办的夜校教员。这一切都进一步加剧了他同外祖父的冲突。同年4月，罗瑞卿的母亲因患肺结核，吐血而亡。这个家对于他已毫无值得留恋之处了。他决心出走。于是，说动了他的祖母，得到很少一点路费，便摆脱了他的外祖父和父亲的监视，去成都投考高等蚕桑学校。

求 索

1926年7月，罗瑞卿和同学郑培济结伴走旱路到达成都，不久便考上了高等蚕桑学校。但是，因为没钱交学费，无法入学。写信向鲜锦堂要，鲜不仅分文不给，还大骂了一通“忤逆不孝”。罗瑞卿在成都逗留了两三个月。这时，北伐军已经攻克武汉。他听说黄埔军校要到重庆招生，便想：“国家这么乱糟糟的，学蚕桑也未必能够救国。”于是，打算投笔从戎，投考黄埔。可是他不仅没有盘缠钱，连在成都拖欠的饭费也付不出。这时，一位同学从南充来信，劝罗回去。他说，鲜锦堂那里，他可以从中斡旋，让鲜汇路费来。不久，鲜锦堂果然汇来了20元，可是罗瑞卿并未回南充，而是乘船南行，到了重庆。

在重庆，他见到了已先期到达这里，在共青团省委工作的任白戈，并通过他结识了任伯芳、任启愤等共产党员，听了四川著名共产党员杨闇公、刘伯承的演讲。他对任白戈等再次提出自己想搞军事、去国民革命军的愿望。这时，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来重庆招生的人员与主持四川省国民党左派工作的杨 公已接上头，组织了招生委员会，吸收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入校。任白戈便介绍罗瑞卿去报考，被武汉分校录取。年底，他随招生人员乘船东下，同行的有徐彦刚、潘先知、陈伯钧和女生赵一曼、游曦等人。入校后，罗瑞卿被编入入伍生总队（属黄埔军校第六期）政治第一大队第二队。严格的军队纪律、紧张的军事

训练很快使他由青年学生转变为革命军人。

5月中旬，武汉分校编为中央警卫师。6月间，在叶挺指挥下参加讨伐夏斗寅。在战斗前夕，罗瑞卿听到他以前在南充中学、现在又是他的军校老师的李鸣珂说：“打仗不要怕死，枪子打死不仅光荣，且比什么死都痛快，扎个眼就过去了。”这番话对他影响很深。于是，他便抱着这种单纯而又豪迈的生死观投入了击溃夏斗寅部的土地堂战斗。他在战斗中的勇敢表现为团长蓝腾蛟所看中，蓝把他调入团部当传令兵。这一期间，罗瑞卿耳濡目染，对中国共产党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曾几次提出入党要求，但未得要领。不过，这一段战斗生活对他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使他坚定了站在共产党一边的信念，也使他日后一参加红军便由于他具备的政治军事素质而成为其中的骨干。

部队回师武汉不久，汪精卫集团日益暴露其反动面目，7月15日，武汉分校在打野外时，被唐生智部所包围。仍然打着“左派”旗号的张发奎将军校从唐生智手中“解放”出来，随即将其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罗瑞卿任副班长。8月2日，部队奉张发奎之命，东征讨蒋。4日，到达九江，为已开始反共的张发奎缴械。同学们纷纷离队。罗瑞卿此时正发烧腹泻，但也带病离开队伍，同一位四川同乡冯开琮一同回到武汉，住进了四川会馆附近的一个小旅馆。

不久，罗瑞卿的病越来越重，冯开琮陪他去一家教会医院，医院说是伤寒，应住院，需预交两个月的住院费和伙食费。罄二人之所有，仍然不够。冯允诺家里汇来钱即

补上，医院才勉强将罗瑞卿收下。一开始冯还常去探视，每次去，医院都向他讨债，于是冯也不再露面了。医院便雇了一辆黄包车，让车夫把罗瑞卿拉回原住的小旅馆。旅馆老板见到人都快死了，不收。车夫又将罗拉回医院。医院知道罗是四川人，让车夫把罗拉到四川会馆。这一次车夫有了经验，他怕会馆不收，便悄悄把罗瑞卿背进一间久不住人、又霉又暗的小屋内，让他躺在一块板子上。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罗瑞卿苏醒过来，他举目四顾，无亲无友，大病缠身，自己只剩下皮包骨，感到绝无活的可能，想以自杀结束痛苦，但却连动一动的力气也没有了。然而，就在这必死无疑的情况下，罗瑞卿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救命恩人是一位看房子的姓熊的师傅。他偶然发现了罗瑞卿，出于同情心，端来了一碗粥。罗瑞卿顽强的生命力借助于这碗粥终于又缓过劲来。罗瑞卿一生有三次大难不死，是为第一次。

罗瑞卿稍稍康复，又给外祖父写了一封信，讲述了自己死里逃生的经过，希望他们寄点路费来好回家。回信是绝情的，除了大骂一通以外，还用幸灾乐祸的口吻写道：“你堂堂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还要这个家接济？”罗瑞卿十分气愤，回了一封信：“我虽在外冻死饿死，也绝不再求助于若是之家庭也！”。病好了，罗瑞卿便同失掉党的关系的共产党员任启愤等一起找党。这时，武汉已是一片白色恐怖。找得到的党员不是被逮捕抓进监狱的，就是被送上刑场，还有一些是已经在报上登了反共启事的变节者，而这些人已经不成其为党员了。真正的、仍然在进行着革

命活动的党员呢？在茫茫人海中却一个也找不到。他们从武汉找到常德，任启愤在一支地方部队落了脚。茕茕孑立的罗瑞卿又到澧州找到同学任伯芳，而他也是一位失去关系的共产党员。两人商量决定到上海找党。这已是1928年8月了。

到上海后不久，罗瑞卿又同任白戈、王义林等相遇，五六个人挤住在田汉举办的南国艺术剧院出租的一个亭子间里，过着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花的“共产主义”生活。

这时，罗瑞卿在军校的同学潘先知等人看到他大病初愈，衣食无着便劝他投靠由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组织的国民党改组派。他说：“我宁可冻死饿死，也不参加这个组织，绝不背离共产党。”不久，罗瑞卿得知任伯芳已经接上了党组织关系，便再次向他提出入党要求。任伯芳说，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党已经转入地下的情况下，要想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可以说是在军校入党，失掉了关系。任让罗写个报告，由他作证明人。罗瑞卿虽然感到这样做不妥，但由于入党心切，仍然照办了。中央军委随即派欧阳钦同他接上了关系。

显然，罗瑞卿的入党手续并不完备。而这是由于他迫切要求入党，不愿长期等待下去。在那白色恐怖笼罩四野、风雨如磐的年代，入党意味着受苦受难，意味着坐班房、掉脑袋。对共产党，许多人像对待瘟疫一样，避之唯恐不及，而罗瑞卿偏偏那么急切地找上门来，要加入这个一进去就注定要受苦受难的队伍，这只能说明，他已经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愿意为此而献出一切。鲁迅曾把埋头苦干、拼

命硬干、为民请命和舍身求法的人称作中国的脊梁。罗瑞卿入党及其以后的一切行动说明，他这样做正是在舍身求法。

到红军中去

罗瑞卿入党前后，经常和同志们谈论井冈山的朱毛红军。他们把红军善于利用湘赣两省统治者之间的空隙和矛盾，在边界地区活动，称之为“梭边边”，对其寄予无限向往。

考虑到他个人的愿望，中共中央军委于1929年1月派他去湘鄂西贺龙部队，走到宜昌，交通断了。他又返回上海。3月间，朱德、毛泽东率领的红四军打下了福建汀州。于是，中央军委又派罗瑞卿到红四军去工作。

同月，罗瑞卿和曾省吾乘船到达厦门。红四军已返回江西。福建省军委便把他们派到在闽西上杭一带活动的游击队当教官。罗到达上杭县蛟洋后，与当地游击队领导人傅伯翠会合，随即将参加过永定、蛟洋暴动的游击队员分批集中，进行训练，教游击队员们出操、瞄准、打野外，给游击队员们讲政治课。罗瑞卿服装整洁、口齿清晰，说话鼓动性强，深得队员们爱戴，大家都称他为“罗老师”或“罗教官”。由罗瑞卿等作为骨干，这一支由农民组成的游击队开始有了战斗力。在此基础上，罗瑞卿又向游击队员们进行党的教育，发展贫苦农民入党，建立当地党的支部。5月间，红四军第二次入闽，罗瑞卿闻讯后率领游击队到上

杭北面的新泉、庙前去迎接，然后随红四军主力于5月23日攻克龙岩。5月26日，上杭一带游击队编为红五十九团。傅伯翠任团长，曾省吾任党代表，罗瑞卿任参谋长。

6月，红四军三打龙岩之后，闽西的地方武装又合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傅伯翠为司令，张鼎丞为党代表，龚楷为参谋长，李力一为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任参谋主任。随后，罗瑞卿参加了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接触了红四军党内的争论。刚到红军的罗瑞卿对于党内还会存在严重的分歧和斗争，一开始感到很不理解。会后，毛泽东离开部队，陈毅赴上海参加党中央召开的军事联席会议并就红四军的现状及党内存在的分歧向党中央请示报告。朱德率第二、第三纵队出击闽中。罗瑞卿随第四纵队和第一纵队一道，坚持闽西斗争。8月，朱德率部回师闽西与一、四纵队会合，攻克上杭。曾省吾在爬上杭城墙时，英勇牺牲。罗瑞卿被调到第二纵队任支队党代表。在上杭，罗瑞卿出席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会议反映了红军官兵要求毛泽东回来的强烈情绪，给罗瑞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红四军“八大”之后，即奉命出击粤北东江地区，失利，于11月中旬返回闽西。这时，陈毅已带着中央的九月来信返回部队。23日，红四军攻克汀州。26日，朱德、陈毅等将毛泽东请回部队。毛泽东在一次干部会上注意到了个子很高的罗瑞卿，问他是从何处来，现在干什么。这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交谈。

随后，罗瑞卿在1个月内几乎每天同毛泽东都有接触。

他回忆道：“在汀州以及后来部队向上杭龙岩地区前进时，主席召开了支队党代表以上干部开调查会，我每次都参加。会议每天都开，行军时，则一到宿营地就开。主席亲自口问手写，并与到会人展开讨论，会议空气十分活泼、自然、愉快！这就是有名的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的准备。”

1929年年底，罗瑞卿出席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亦即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结束后，秋收起义的参加者罗荣桓任第二纵队政委，随后，罗瑞卿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

第二纵队原来的领导干部较差，这个纵队战斗力较弱。罗荣桓、罗瑞卿等即以古田会议决议为指针，在行军、战斗间隙，对部队进行整顿。在这一过程中，罗荣桓经常向罗瑞卿等讲井冈山的传统。他们很快互相熟悉起来，虽然罗瑞卿活泼、罗荣桓稳重，性格上一动一静，迥然不同，但配合十分默契，开始建立深厚的友谊。因为他们都姓罗，又先后任第二纵队、红四军政委，为区别起见，大家便称呼罗荣桓为大罗，罗瑞卿为小罗。

经过二罗和赖传珠、张际春等干部的努力工作，二纵队面貌焕然一新，得到了前委的重视和肯定。1930年5月，赴上海开会的红四军代理军委书记熊寿祺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二纵队过去没有很好的上级干部，军事政治都无中心，因此战斗力差于一、三纵队。最近上级干部已经另换人，二纵队又复兴起来了。”

第二次大难不死

1930年6月，立三路线要求全国红军扩编50万，分别进攻南昌、九江、长沙，然后“会师武汉”，争取“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红四军奉命扩大为一军团，随即北上，在南昌郊区打了几枪便转入湖南，与三军团会合，罗瑞卿接替已调任红四军政委的罗荣桓任十一师（即原二纵队）政委。部队随即攻长沙，不克，在毛泽东的主张下，转到赣江东岸活动。

这年年底，罗瑞卿和师长曾士峨一道率部参加了第一次反“围剿”。

1931年4月，蒋介石又派何应钦率20万大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4月20日，红军主动后撤到根据地腹部东固、龙冈一带隐蔽待机。

敌军进入根据地后，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行动十分谨慎。到5月14日，红军已等待了25天之久，敌王金钰师和公秉藩师准备离开富田坚固的工事向东固推进。红军总部获悉后，立即命令一、三军团分三路攻击运动中之敌。红四军担任右路，抢占观音崖、九寸岭两处隘口，正面阻击敌人。从富田到东固，中间横一大山，只有两条大路可通，观音崖、九寸岭是必经之地。5月16日，曾士峨、罗瑞卿率十一师迅速抢占了观音崖，十一师师部设在观音崖山顶稍下的独立房屋内。房门很矮，身材高大的罗瑞卿进出都要低头。师特务连长杨得志又领人在旁边搭了一个棚

子，作为师指挥所。

部队刚刚进入阵地，敌人便打来猛烈炮火，那个棚子很快被炸塌。曾士峨、罗瑞卿此时正在棚外用望远镜专注地观察敌情。不一会，罗瑞卿看到敌人的一路，正向左面三十三团阵地迂回，立即告诉曾士峨。曾士峨点头说：“三十三团前面还有一个山头，敌人只有通过这个山头才能接近三十三团阵地。”随即吩咐杨得志派人通知三十三团团长聂鹤亭，让聂坚决顶住。

杨得志刚把人派出，又是一阵密集的机枪扫射过来。高高的罗瑞卿首当其冲，左颊中弹，倒在独立房屋面前。由于打断动脉，顷刻间满头满脸是血。看到政委倒了下去，曾士峨一面命令医生抢救，一面把全部仇恨都集中于对付当面之敌。他命令杨得志立即率特务连去抢占三十三团前面的那个山头，自己也挥舞着驳壳枪冲下山去……

听说罗瑞卿负了伤，朱德立即派总部的医生叶青山前去医治。叶飞快赶到，采取措施止住了血，然后带着民工将他抬了下去，把他交给一位看护，便又返回前线抢救别的伤员。这位看护是一位新手，从未受过医护训练。他看到罗瑞卿脸上结了紫黑色的血痂，血痂上还有一些泥土、草棍，便动手去清除污物而把血痂揭开了。这一来，动脉中的血又冒了出来，他吓得手足无措，又到前线去找叶青山。朱德知道后，吩咐叶青山留在后方护理罗瑞卿。叶赶了十几里路到后方，好不容易才又止住了血，而这时罗瑞卿已经十分虚弱了。叶青山怕他再出血，便陪伴着他。叶青山和罗的勤务兵王保林还有两个民工轮流抬着担架，一个星

期后把罗送到位于上田的后方医院。由于失血过多，加上一路上烈日暴晒、风吹雨淋，罗瑞卿又并发了大叶性肺炎，高烧不止，昏迷不醒。

有一天，他稍稍清醒，看到了叶青山，便立即让叶回前方去，不要再管他。叶答应后，他又昏迷过去，不知过了多少时候，他忽然听到外面有锯木头的声音，还有人说话。一人说：“这个人恐怕不行了，赶快做棺材吧！”另一人说：“棺材得做长一点，没见那个人，个子长得好高咧！”

罗瑞卿模模糊糊知道，这说的大概就是自己。他又想起在武汉军校，他的老师李鸣珂的一席话。可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被枪子儿击中，并不是“扎个眼就过去了”。不过，大约总是活不成了……

然而，为他准备的棺材并没有用上。他在昏迷数日后，又一次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这要归功于他年青而又旺盛的生命力，这是他的第二次大难不死。

红 四 军 政 委

1931年10月，罗瑞卿伤愈赴瑞金出席了苏区党代表会议和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毛泽东就拟调罗瑞卿到总政工作征求他的意见。罗瑞卿希望返回前方，会后便回红四军任政治部宣传部长兼随营学校政委。

1932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不顾毛泽东的异议，决定进攻赣州，付出很大代价，打了33天，无功而返。3月间，组建一军团新的领导机构，由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

委，陈奇涵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王良任红四军军长，罗瑞卿任红四军政委。

同月，根据毛泽东的倡议，由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了东路军入闽作战，直下漳州。王良、罗瑞卿率红四军担任主攻，4月19日突破敌人十二岭、风霜岭主阵地后于20日占领漳州。23日，东路军分兵发动群众，红四军前进到海边的石码镇。当地的保安队长李玉泉不了解红军的性质，竟在街上摆下茶点，恭候红军大驾光临。因此，当红军先头部队进入石码时，当地地下党组织有些疑惑了。直到部队住下来，这个误会才解除。

第二天，召开欢迎红军群众大会，罗瑞卿即席讲话，他不带稿子，台前一站，双手叉腰，就讲了起来，他首先说：红军初到此地，因为有些情况不了解，致使反动分子来欢迎我们，而我们的基本群众倒不敢和我们接近了。这叫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接着他对红军战士说，这次红军来到漳州、石码，和过去山区环境不同，同志们不但要注意军容风纪，还要遵守城市政策。不要看见洋房子就认为是土豪的而乱打。打土豪之前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不要搞错……。他又对与会的乡亲们说，国民党造谣，说“共产党杀人放火，扫帚也要过三刀”。我想，你们已经相信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们会用更多的事实来向你们证明我们是一支为穷苦大众谋利益的仁义之师……。接着，他又运用了刚刚了解到的材料说：此地有这么一句话；叫做张毅换张贞（二人都是军阀），捐税加二升。昨天我问过一个老阿婆，她说她的一只小猪娃到养大卖出去，共缴了

6次税！红军来了，就是要废除一切苛捐杂税，让老百姓直起腰来……。

罗瑞卿常对人说，他在武汉军校时最佩服邓演达口若悬河的口才，而对蒋介石说起话来“这个这个”不敢恭维。而自从他自己当了红军党代表之后便更以讲话有鼓动性、能抓住听众而著称。在他讲话的风采上，不仅可以看到邓演达的影响，而且又揉进了毛泽东每到一地都要进行调查研究的新的风格。他负伤后说话嘴不能完全张开，有时显得咬牙切齿，但大家都爱听。到抗战时，在太行山的老乡中便流传了这样一句谚语：“看戏要看抗大文工团演的，听报告要听咬牙切齿的人讲的。”

王良、罗瑞卿率红四军在石码、漳州、长寿等地驻扎了40余天。这一期间，他们经过调查，没收了敌产，对工商业者进行筹款，并在周围农村打土豪，所得财物，部分分给群众，部分运回苏区。与此同时，他们广泛发动了群众，成立了当地苏维埃政权，吸收了数百人参加红军。

6月13日，红军主动撤回中央苏区，途经武定县时，大禾镇内的地主武装凭借高墙深沟，向红军队伍打冷枪，妨碍红军前进。东路军指挥部特务连长带路，来到大禾镇外一间破屋内。王良和罗瑞卿正用望远镜观察地形，镇内打来两枪，王良突然倒下，罗瑞卿赶紧去扶他，但他已中弹牺牲。罗瑞卿和王良有深厚友谊，他十分悲痛，不愿承认王良已死，大禾镇攻克后，仍然用担架抬着王良的遗体，直到进入苏区，才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将王安葬。王良留下一块怀表，罗瑞卿一直珍藏着。每逢战斗胜利，他就要

打开包着这块表的红绸，给表上满弦，同时低声说到：“我们又胜利了！”在他心目中，王良仍然活着。

兼管文化娱乐的保卫局长

王良牺牲后，周昆继任红四军军长。红四军随即参加南雄、水口战役，然后在江西省最南部的全南、龙南、定南地区分别发动群众。8月间，罗瑞卿由于面部伤口老不封口，又住院治疗。

1933年1月，一军团在黎川县三邵整编，决定撤销军的番号，军团直辖七、九、十、十一共四个师。罗瑞卿归队后被任命为军团保卫局长。不久，第四次反“围剿”开始。2月27日，罗瑞卿和一军团参谋长徐彦刚奉命率七师、九师作为一军团的右翼（左翼是林彪、聂荣臻率领的十师和十一师）参加了歼灭敌五十二师的登仙桥伏击战，随后又随林彪、聂荣臻，参与了歼敌十一师的草台冈战斗。

从第四次反“围剿”到长征结束，加上到陕北后又任一方面军保卫局长，他任保卫局长约三年半时间。

当时，各级保卫局有垂直的领导系统，其设置以及其工作职责范围和工作方法都仿照苏军模式，并不切合中国红军的实际，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孤立主义、神秘主义的色彩。而限于历史条件，当时人们还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只是由于罗瑞卿已经能够做到在主管工作中注重调查研究，才使一军团的保卫工作得以避免发生大的差错。这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罗

瑞卿非常注重培养保卫干部实事求是的作风。他在向保卫干部讲课时，提出侦破每一案子都要弄清六何，即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何故和如何，要求办案人员必须从事实出发。例如，在第四次反“围剿”期间，卫生部曾误将吗啡当作奎宁下发，使疟疾病人发生过度兴奋的反应。军团卫生部长姜齐贤由于是从国民党军队俘虏过来参加红军的，所以被怀疑是故意破坏，姜本人也忐忑不安。在聂荣臻参与下，罗瑞卿调查了此事，发现确实是发错了药，从而避免了一起错案。聂荣臻回忆道：“我记得我们在一军团，干部有了错误就批评一顿，没有随便扣上‘敌人’的帽子，没有杀过一个干部。”

保卫局除了侦破案件，防止敌人混入红军内部破坏外，另一任务则是训练警卫人员保卫首长安全。在这一方面罗瑞卿一贯以身作则。在行军、作战时，他总是跟着林彪、聂荣臻，不离左右。由于他工作成绩优良，1933年荣获二等红星奖章一枚。

罗瑞卿自幼爱好文艺，尤其是戏剧。参加红军以后对此道仍不能忘怀。在红军攻打梅县途中，他还同人争论郁达夫小说的革命意义。他当了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后，开始显露组织戏剧演出的热忱和才华。他一就任保卫局长，知人善任的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立即委托他在保卫局里面开办一个文化娱乐训练班。于是，便把歌声笑语引进了这个颇令人生畏的机关。训练班的主要任务是排戏，而罗瑞卿则是导演，有时还兼编剧。

罗瑞卿编写的第一个剧本叫《谁给我的痛苦》，揭露了

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有了剧本和导演，还要有演员。除了训练班的学员外，罗瑞卿还动员了不少机关干部上台。在分配角色时，反派角色不大有人爱演。罗瑞卿便自告奋勇地演地主。他指着自已脸上的伤疤对大家说：“你们瞧，这颗该死的子弹，哪里不打，偏偏打在老子的嘴巴上。这就破了相了。但演个地主倒还凑合。我就演地主吧！”

由于这出戏对于发动群众打土豪有很大推动作用，以后它便成为保留节目。红军每到一地，宣传队在演出之前，都要到村里作一番调查研究，然后将剧中人换成当地真人的姓名，剧情再稍作变动。演出效果非常好。群众反映：“红军真神了，才来了三天就将我们这里的事编进戏文了。”

一军团的演剧高潮出现于第四次反“围剿”的两大战斗之间。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和宣传部长张际春编了一部大型剧本，叫《庐山雪》，描写红军打进了南昌，杀上了庐山。蒋介石反动统治就像春天庐山上的残雪，很快瓦解、消融。剧本中有许多角色是红军的高级干部。为了体现官兵同乐，罗瑞卿将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等都动员上台，各人按当时实际担任的职务扮演角色。至于反面角色，罗瑞卿又自告奋勇地扮演蒋介石，李卓然则扮演德国顾问赛克特。这么多的军团干部上了台，在部队内引起了轰动。部队的文娱活动也更为活跃了。

文化娱乐训练班除排戏外，还学习歌咏、墙报、游戏等知识。三个月后，训练班结业。在此基础上罗瑞卿又吸收了部分机关文艺爱好者，组织了一个业余剧社。由于一

军团的小报叫《战士报》，这一剧社即起名为战士剧社，长征以后改为专业宣传队。它就是广州军区战士歌舞团的前身。罗瑞卿对它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4年10月16日，罗瑞卿率一军团保卫局随一军团从江西宜都出发，开始长征。在长征中，他除了行军外，还要用很大精力主持保卫局的日常工作，以保证部队和首长的安全。在过草地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毛泽东、周恩来还有李德等随一军团行动，罗瑞卿要求做好对他们的外围警戒工作，保证绝对安全。他在工作中兢兢业业，一丝不苟。1935年1月，在路过贵州桐梓时，他了解有一股地主武装盘踞在一个险要山洞内，便亲自仔细向群众调查，掌握了全部情况，然后指挥保卫队一举拿下山洞，不仅保障了部队行动的安全，还缴获了大批金银等贵重物资。行军时，他经常随林彪、聂荣臻行动，到宿营地后便回保卫局检查人员是否到齐。1935年2月，在第二次打遵义时，保卫局和保卫队遭敌机轰炸。他回到宿营地时已经很晚了，但仍然详细了解了部队伤亡的情况，直到伤员都已安置、烈士都得到妥善处理，才去休息。

同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组成中央红军先遣队，为红军北上开路，刘伯承任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罗瑞卿为参谋长。罗瑞卿协助刘、聂参与了强渡大渡河的指挥。一、四方面军会师分左右路军北上后，张国焘又反对北上方针，要南下逃跑，在班佑罗瑞卿召集保卫局开会，要求大家一切行动听中央和军委指挥，坚决跟着党中央北上。

长征途中，尤其是翻越雪山之后，生活异常困难，全

军都处于饥寒交迫之中。而罗瑞卿由于腮部负伤，嘴只能半张，吃饭十分缓慢，比大家吃得更少，经常饿肚。但他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加上年青、有旺盛的生命力，终于从雪山、草地走了出来。

一、三军团在中共中央率领下越过草地北上，9月下旬到达哈达铺后，改编为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一军团编为一纵队，三军团编为二纵队，中央军委直属队编为三纵队。罗瑞卿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直到10月下旬长征结束。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1935年10月，罗瑞卿随中央红军到达长征的终点——陕北吴起镇。翌年2月，罗瑞卿作为一方面军保卫局长参加了东征。东征回师陕北后不久，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红军大学，罗瑞卿被任命为教育长，一面工作，一面参加培训师以上干部（少数为团级）的红大一科的学习。1936年6月，红大在瓦窑堡开学，不久迁往保安，在县城南部，将一些年深日久的旧石窑洞加以修整，红大一科便在这里安了家。在红大，罗瑞卿听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结合自己的实践，总结了十年内战的经验教训，政治素养和军事素养都大大提高了一步。

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派罗瑞卿等随同周恩来赴西安搞统战工作。在西安，罗瑞卿先任周恩来的联络副官，随后被派往东北军，以东北军政治部民运科长名义，向东

北军的政工人员介绍红军政治工作特别是群众工作的经验。这是罗瑞卿第一次接触统战工作。

1937年2月，罗瑞卿返回陕北，来到延安。此时，红大已随党中央迁至延安，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校长是林彪，副校长是刘伯承，政治部主任是傅钟，训练部长是刘亚楼，教务部长是杨立三，罗瑞卿继续任教育长。

为了加强对学校的领导，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教育委员会，由毛泽东兼任主席。毛泽东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基本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学校开设了哲学、党的建设、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和游击战术等课程。毛泽东、张闻天、朱德、董必武等都曾到校授课。

七七事变以后，林彪和刘伯承分别任第一一五师和第一二九师师长，奔赴前方，抗大的全面工作即由罗瑞卿主持。1938年1月，罗瑞卿任抗大副校长。3月间，林彪被阎锡山部队误伤回延安后，曾在抗大小住，但并未过问抗大的工作。

抗战爆发以后，大批知识青年从全国四面八方乃至海外涌向延安，抗大敞开大门吸收。教学重点逐渐由训练红军干部转向训练知识青年。转变学生的思想成为学校一切工作的目的，政治教育成为中心一环。

1937年8月1日，抗大第三期开学，共吸收知识青年477人，到1938年4月16日，第四期开学时知识青年更猛增到4000人。面对抗大日益兴旺的局面，罗瑞卿高兴地说：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

为了接纳日益增多的知识青年，中共中央决定，除抗大外，另办一所陕北公学，要求抗大让出部分校舍。抗大校舍本来就拥挤不堪，再让出一部分，便无论如何也住不下了。解决校舍问题便成为当务之急。罗瑞卿经过调查研究，决定用挖窑洞的办法解决校舍问题。10月间，他亲自扛着镢头，率领1000多名教职学员，开到凤凰山工地。经过半个月突击劳动，共挖成窑洞175孔，还修筑了一条3000多米长的盘山公路——抗大路。一到晚间，凤凰山从山顶到山脚，一排排窑洞灯火闪烁，宛如高楼一般，使人几乎疑惑到了大城市。斯诺、史沫特莱等交口称赞这是古今中外未曾有过的“窑洞大学”。

大批知识青年涌入延安，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补充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使之更加朝气蓬勃。这些知识青年同老红军相处关系融洽，迅速融为一体。但是，在这一期间也出现了黄克功事件这样的坏事。

黄克功，红军时代曾当过团政委，1938年任抗大六大队的大队长。黄与陕北公学学员刘茜确定恋爱关系后不久，刘突然变卦。心胸狭仄的黄克功丧失理智而开枪打死了刘。

此案发生后，有一些人认为这是一般的桃色事件。他们认为黄克功参加过长征，为人民立过功，主张宽宥他，把他放到前线去，让他到战场上去带罪立功。然而许多老干部却认为黄既然杀了人，就要偿命。罗瑞卿认真听取了各种意见，在一次研究此案的会议上说：“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犯了法就应当受法律的制裁，而不应当有什么例外和

特殊。黄克功自恃有功，目无法纪，必须依法惩办。”罗瑞卿将抗大党组织的意见和群众的反映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很快批准对黄依法执行枪决。临行前，罗瑞卿以惋惜的心情到狱中看了黄克功，问黄还有什么后事要交代并答应将来如有可能帮助照顾其亲属。

处理黄克功事件引起了极好的反映。广大知识青年称赞共产党、八路军法纪严明，不徇私枉法，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1938年，罗瑞卿还按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提议并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写成《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一书。书的内容主要是向国民党抗日部队介绍红军政治工作经验。这本书共有20万字，对红军政治工作经验作了全面和详细的总结。这本书除由延安的解放社出版发行外，邹韬奋等主持的生活书店在国统区也出版了。写这本书反映了共产党希望国民党军队走向进步的满腔热情。但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存在着戒惧之心，这本书在国民党军队中未能广泛流传。尽管如此，此书由于系统总结了红军政治工作经验，已成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历史文献。

到敌人后方去

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后，由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上自然灾害，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遇到极大困难。中共中央号召开展生产运动，自力更生，克服困难。1939年初春，罗瑞卿率领抗大数千师生上

山开荒，至4月下旬，即完成每人开荒2至3亩的任务。秋收时，抗大总校已离开延安。这一大片土地共收获粮食100多万斤，基本上解决了留在延安的抗大三分校的口粮。

由于开荒生产仍然不能解决经济困难的燃眉之急，1939年6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作出《关于抗大陕公等学校迁移到晋东南的决定》，指出：“最近敌人企图进攻边区，加之地区贫寒、粮食困难等，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抗大本校、陕公本校等移驻晋东南，由北方局及前总负责监督与领导。唯学校的方针及组织改变仍由中央决定。”

翌日，罗瑞卿在抗大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的决定。他指出，抗大向敌后挺进，说明了在华北不仅可以发展游击战，而且还可以办学校，这会给全国人民一个信心。反共分子、磨擦专家污蔑八路军专事在后方宣传，抗大上前线是对他们有力的回答。抗大总校上前线同时也是向日寇证明，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精神是永远毁灭不了的。

中共中央的决定得到抗大和陕公等校广大师生的热烈拥护。随即，进行出发之前的整编。抗大总校除留下少数人员组成抗大第三分校留在陕北以外，其余人员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不久改称青年纵队），由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任副司令员，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王智涛、欧阳毅分任正副参谋长。抗大四个大队改称一至四团，陕北公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陕北工人学校等单位合编为华北联合大学，改称为独立旅，全纵队共

有 5000 余人。

7 月 7 日清晨，在延安 1 万多军民的欢送下，在蒙蒙细雨之中，罗瑞卿带领抗大东进队伍踏上了征程。几天以后，罗瑞卿率先头部队渡过黄河到达永和关后，得悉汾河涨水，不能徒涉，同时日伪正在对晋东南根据地进行了疯狂“扫荡”，敌情也有变化，按原定行军路线行动已不可能，罗瑞卿乃率部返回延长县。

8 月初，经请示中央，纵队分为三个梯队由葭县达盘堂渡过黄河，到达兴县；随后，即由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和独立第一团护送东进，越吕梁山，涉汾河，再翻过云中山，到达同蒲路封锁线。

同蒲路两侧为敌占区，据点林立，铁路已被严密封锁。在过铁路以前，各团都进行了庄严的宣誓，坚决完成中共中央给予他们的光荣任务。大家表示，如遇非常危险，宁肯义死，决不变节。

这一支 5000 多人的队伍，除由少数战斗骨干组成的、配备有步枪的小分队有较强战斗力之外，广大学员虽然学过一些军事知识，但缺乏行军、作战的实际经验。他们有的手无寸铁，有的只带了一颗手榴弹作为防身武器。要把这样一支队伍带到目的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尽管有一二〇师的两个团掩护，罗瑞卿仍然丝毫不敢大意。

过路的这一天，部队急行军 150 里。接近铁路时发现，敌人已有埋伏，于是第一梯队改从原定地点以南 10 余公里处过路。第一梯队刚过完，被敌人发现了，于是又北移至原定地点过路。学员过路时，罗瑞卿便站在铁路中央，嘱

咐大家跟上队，同时又动手一个一个把那些经过长途行军已经步履蹒跚的同志搀扶过铁路。

这支部队除第三梯队的后续部队因有人点火看地图被敌人发现而稍受损失外，绝大部分连夜顺利通过同蒲路，随即翻上系舟山。这时正在下雨，雷声在脚下回旋，空气中夹杂着一股雷击后的硫磺味，显得十分清新。

九十月间，“青年纵队”到达河北省灵寿县陈庄，胜利完成了东进的第一阶段的任务。

在晋察冀经过3个月训练，抗大第五期毕业，13个连队的学员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和一二〇师工作，6个连转到抗大二分校继续学习，并将总校第三团调到冀中。余下的人员于2月10日从陈庄出发，越过正太路封锁线，于26日到达武乡县的洪水、蟠龙一带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驻扎地区，同由何长工、赖光勋率领的抗大一分校留守大队会合，胜利完成了挺进晋东南的任务。

这一次东进，历时半年，途径陕西、山西、河北三省约30个县，行程约3000里，通过同蒲、正太两道铁路封锁线，又被人们称为小长征。

1940年4月，抗大第六期在太行山上开学，这一期学员主要是晋、冀、豫地区土生土长的、有一定斗争经验的基层干部，工农出身者占86%，他们忠诚、朴素，能吃苦耐劳，但军事素质较差。针对这些情况，罗瑞卿等提出，要加强基础理论教育，把朴素的阶级感情引导到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终身的境界，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同时要进必要的军事训练，尤其是进行坚持敌后游击战的训练，以

适应敌后抗日斗争的需要。

从野战政治部到延安

1940年6月16日，罗瑞卿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其时朱德已回延安，驻太行山的八路军总部由彭德怀主持，参谋长是左权。

罗瑞卿到任不久就赶上了“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开始时是交通破袭战。7月22日，彭德怀、左权部署这一作战行动时，估算参加者约有20几个团，其目的是以彻底破袭正太路为中心，同时破袭平汉路、同蒲路。彭德怀在向晋察冀军区、一二〇师和一二九师下达这一计划的同时报告了军委。

为了抓住战机，未待军委批准，彭德怀即下令，从8月20日起实施这一作战行动。一开始，发展十分顺利，捷报频传，激战三日后，正太路被彻底破坏，井陘煤矿被炸毁，八路军攻入井陘、娘子关、阳泉等地。到8月26日，参战部队已发展到100个团，彭德怀乃将这一战役定名为“百团大战”。这是罗瑞卿参加革命后第一次听说自己的部队有100个团一起作战。他万分兴奋，情绪高涨地布置整个战役中的政治工作，并在整个作战行动中四处联络、督促、检查。在战役快结束时，他还参与了彭德怀亲自指挥的一二九师围攻关家垴高地之敌的战斗。

当时不仅是罗瑞卿，从中共中央领导人到全国人民都为“百团大战”的辉煌战果而感到振奋和鼓舞。9月10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各根据地，指出：“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力量，在目前加强团结时期，应集中其主要注意力打击敌人，应仿照华北百团战役先例，在山东及华中组织一次至几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对敌进攻行动，在华北则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到那些尚未遭受打击的敌人方面去……”9月20日，延安各界群众1万余人隆重集会，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毛泽东、朱德、洛甫、王稼祥、陈云等均出席了会议。

经过3个多月的英勇战斗，八路军共作战1824次，歼灭日军和伪军各2万余人，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缴获各种炮53门、各种枪5800余支，使正太路中断1个多月。八路军伤亡1.7万余人。这次战斗沉重打击了敌人，坚定了中国人民的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对坚持抗战、遏制妥协投降逆流，起了积极作用。

在“百团大战”开始时，晋冀鲁豫地区的八路军进行了整编，新组建了一些旅。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决定，成立巡视团，帮助新部队进行整顿。罗瑞卿负责组织，他任命组织部长周桓为巡视团团长，总部作战处长阎揆要为副团长。巡视团下设军事、政治两个研究室和一个负责训练营连干部的军事教导营。此外，还配备了一个警卫连、一部电台，共300余人。

在巡视团出发之前，罗瑞卿召集他们开会，提出，巡视团的主要任务是整顿连队和培训连队干部。罗瑞卿要求巡视团注意加强调查研究，不要当“钦差大臣”。要增强军

政、军民团结，发现问题要用商量的办法解决。巡视团下去之后，深入到冀西、冀南、冀鲁豫等军区的连队，一面参加破路斗争，一面帮助连队工作。教导营共培训五期，训练了约 1500 名连队干部。

由于敌人封锁平汉路，巡视团遇到一般问题都是就地解决，涉及重大问题则电报请示总部。至于回总部请示汇报，两年多时间内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在 1941 年的二三月间，解决了主力部队与地方游击队的关系问题，纠正了将游击队全部编入主力的倾向。第二次是在同年 9 月，解决了正确执行好政策的问题。1942 年 9 月，巡视团工作结束，大部分人员留在当地工作，团长周桓带了少数干部返回总部。除派巡视团外，罗瑞卿还带人到驻太行、太岳地区的部队进行了调查研究。

当时，由于敌伪封锁交通困难，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对于华北各根据地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相当多的是通过电报和编发《八路军军政杂志》，交流各部队经验，进行业务指导。罗瑞卿主持野政工作期间，发表了《应当大大提高我军政治工作的顽强性》、《关于后勤诸部门的政治工作》、《目前政治工作建设上的一些问题》、《谈谈军队党支部与非党群众的联接问题》、《在建立对敌斗争对策上的几个原则问题》、《对连队政治工作的全面检讨》、《在宣教会议上的总结》、《把日军工作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敌伪工作方针与基本政策》等文章，内容涉及组织、宣传、干部工作、群众工作、敌伪工作、连队政治工作以及政治工作作风等各方面，对八路军政治工作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除此之

外，他亲自动手或主持进行了组织、宣传、秘书以及敌工等方面大量的实际工作。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在遭受“百团大战”的沉重打击之后，调集重兵对敌后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报复性“扫荡”。各敌后根据地进入了抗日战争中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

就在这艰苦的环境中，一颗爱情的种子在罗瑞卿和郝治平之间萌生。

郝治平，河南省临漳县人，1937年初中毕业之后适逢七七事变。她考入开封第一女子师范后半年即投笔从戎，于1938年3月奔赴延安，入陕北公学，4月入党，5月调往抗大女生队，1939年6月结业后分配在抗大二大队任技术书记，随后参加了“小长征”到达太行山。

在延安时，他们互相并不熟悉，在郝治平的心目中，罗瑞卿是一位令人敬佩的老红军、老首长。而在罗瑞卿眼里，郝治平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名抗大学员而已。

直到到了太行，罗瑞卿才同郝治平从相知到相爱。1941年4月，正是春雨如酥、桃李芳菲的时节，他们在一幢小楼内结了婚。婚后的战斗生活十分艰苦，但他们感到非常幸福。1975年4月，在经历了十年浩劫的生死考验之后，罗瑞卿在纪念他和郝治平结婚34周年之际，回忆道：“婚后在太行的岁月确属艰苦难言的岁月，但也是我们感到十分美满幸福的岁月。这是我们的骄傲，亦足见我们相爱之革命基础及其情真心挚。”他还用四川谚语“公不离婆，秤不

离砣”来形容他们水乳交融、牢不可破的感情。

罗瑞卿夫妇婚后在太行山的艰苦生活，最紧张、最危险的莫过于反“扫荡”的日日夜夜了。罗瑞卿率抗大一进入敌后，便经常碰到反“扫荡”。“扫荡”和反“扫荡”是敌后斗争的主要形式。它每次都有所变化，但其大的框架又在不断重复。到1941年之后，这种斗争就来得更加频繁了。在这无数次的反“扫荡”中，又以1942年1月和5月这两次为最惊险。

1942年1月，郝治平分娩第一个孩子刚11天，便赶上了反“扫荡”。婴儿被放进一个垫了小棉垫子的木筐，由通信员背着走。这一天风雪弥漫、滴水成冰。郝治平十分想看看孩子，但部队在转移，沿途又无处可以避风。罗瑞卿解开马褡子上的一块油布，盖在木筐上面。在当时，这是他作为父亲能够给予孩子的最好的礼物了。经过一天一夜的不断转移，到第二天傍晚，才在一个小村庄住下。进入屋内，郝治平赶忙掀开木筐，只见婴儿浸在屎尿之中，冻得皮肤青紫，连哭声都没有了。郝治平的心都凉了。一阵沉默之后，房东老大娘把孩子抱起，看了一眼说：“别急，我来试一试。”然后把孩子放在炕上，用手一遍一遍地周身按摩。许久，孩子才哭出声来。

1942年5月，日军两2.5万余人，兵分七路，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进行“铁壁合围”，于24日完成对窑门口、青塔、艾铺地区的包围。25日，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在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一部的奋力掩护下，向西、北、南三个方向突围。彭德怀突出了重围，但左权

和总部几位干部却在突围时壮烈牺牲。罗瑞卿和供给部长杨立三等总部机关大部分人仍在敌人包围中，几天后仍未突出重围。罗瑞卿命令大家分为战斗小组，化整为零，分散突围。而猖狂的敌人在飞机指引下，拿了八路军几位负责人的照片到处抓人，一时间情况十分危急。有一些机关干部缺乏战斗经验，在敌人追赶下，又逐渐集聚成大堆，形成了敌人的目标。罗瑞卿非常体谅大家，便带领越聚越多的人，翻山越岭，寻找突围的道路。敌人越逼越近。在一座山顶上，鲁艺校长陈铁耕激动地对罗瑞卿说：

“罗主任，鬼子已经压倒我们鼻子底下了，我们同生共死，和他们拼了！”有几个宣传队员也高声呼喊：“和他们拼了！”

罗瑞卿看看大家，大部分人都赤手空拳，只有极少数人身带两颗手榴弹，个别干部有驳壳枪，通信班有几支步枪。他一挥手深情地说道：“同志们啊，我们同生共死，不等于同归于尽。分散突围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他把政治部直属队特派员张之轩叫来说：“你负责带他们突围，一个也不准丢！”在这一队里有宣传队的吕班、左漠野，宣传部的黄远，新华日报的杜玉润，鲁艺的杨角、肖飞、艾岩、陈克等等。

罗瑞卿分派了各游击小组后又指定秘书长陈志彬带领组织部负责收容掉队人员。队伍随即分散活动。

化整为零之后，被动局面被扭转过来了。在内线，各游击小组和留下的朝鲜义勇队等小部队到处骚扰、牵制敌人。在外线，一二九师等部队到处打击敌人。经过1个月

苦战，敌人终于灰溜溜地撤回据点。

各部陆续返回八路军总部原驻地麻田一带后，在清漳河畔，召开了左权和组织科长李文楷、干部科长龚竹村、保卫科长李月波等牺牲的烈士的追悼大会。在大会上，罗瑞卿沉痛宣告：“左参谋长和好些干部、战士、民兵和群众牺牲了，同志们，我们要做三件事：第一件是报仇，第二件是报仇，第三件还是报仇！”

在野政和文工团，有不少知识分子干部，对于他们，罗瑞卿非常重视。不仅在反“扫荡”中予以重点保护，平时也十分关怀。有一些干部出身于地富家庭，个人历史也较复杂，罗瑞卿按照他们的现实表现，积极主张吸收他们入党，并亲自作入党介绍人。1942年野政宣传部长王东明因患肺结核去世。罗瑞卿十分痛惜。在追悼会上他既批评总务部门也是自责地说：“在敌后，我们的条件很困难，不可能给他以好的照顾，但是，给他买些鸡蛋总是可以做到的吧？但是我们没有给予特别的照顾……”

1943年6月，罗瑞卿带领巡视团正在太岳军区检查工作，接到中共中央要他回延安参加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电报，随即返回总部，将工作移交给代理主任张际春（不久，在太行山的总部与一二九师合并），然后全家同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夫妇、太岳军区政委薄一波等经太岳军区北部，过同蒲路，经汾河平原入晋西北，再渡过黄河，于1943年冬季抵达延安。

1944年初，罗瑞卿入中央党校。在此他系统学习了党的整风文献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著，在具有深

远意义的整风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素养有了进一步的提高。1945年4月，罗瑞卿出席了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在“谈”和“打”两条战线上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瑞卿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副政委。

1945年9月9日，有一架美国飞机要从延安飞往晋察冀，去接走被当地军民援救的美军飞行员。罗瑞卿和聂荣臻、肖克、蔡树藩以及日共的野坂参三等便搭乘这架飞机于当日在灵丘县降落，随即换乘汽车到达张家口。

张家口是抗战胜利后八路军解放的第一座大城市。这里是华北平原通往山西、内蒙的交通要冲。清水河西岸，戏院、酒楼林立，市面十分繁华。著名的歌唱家郭兰英当时就在这里演唱山西梆子。

八路军进入张家口后，军纪严明，但也有少数官兵居功自恃，有的军容风纪不整，有的去看戏不买票，说什么“老子流血牺牲打败了日本鬼子，看戏还买票！”罗瑞卿得知后便要求军区政治部的部长们带领干事们到各公共场所去维持秩序。

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的电报，指出：“目前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

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

为了控制热河，11月9日，中共中央任命罗瑞卿为冀热辽军区第二政委。罗瑞卿和司令员肖克一道，经密云、古北口，于1946年初到达承德，与中共冀热辽分局书记程子华会合。

1946年1月5日，国共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0日又达成《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军事调处执行部，简称军调部，是履行停战协议的机构，受由周恩来、张治中和马歇尔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领导，设立三委员，即中共方面的叶剑英、国民党方面的郑介民和美方的饶伯森。三委员为军调部最高领导。三方各设参谋长一人和六个业务处。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共方面的参谋长。他前后仅在承德停留了10天便来到北平履行新的任务。

国民党方面所以同意签署上述协议，其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以便进一步调动军队，完成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他们妄想通过谈打两手，限制以至消灭人民的力量。针对国民党的两手，共产党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方针，罗瑞卿等的任务便是用谈判桌上的斗争，作为战场上的斗争的配合。由于国共双方立场尖锐对立，执行军调部的任务便离不开吵架，而美方则袒护国民党，拉偏架。罗瑞卿回忆道：“在执行部的工作就是三方天天开会，亦就是天天吵架。”

“吵架”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往哪些地区派执行小组，中共方面希望将小组派往国民党集结重兵的地区和准备进攻的地区，以便制止其进攻，而国民党方面则表

示反对。二是交通问题，国民党方面为了加紧运兵打内战，主张立即恢复交通，而中共方面提出，恢复交通必须以全面停止内战为前提。三是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战协定，然后组织调查组就地进行调查。对这些争吵，罗瑞卿回忆道：“他们诬蔑我们违反停战协定，我们据理驳斥反击。我们如实抗议他们违反停战协定，他们蛮横狡辩、抵赖。他一篇，我一篇，美国人一篇，都是针锋相对，越吵双方距离越远。美国人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是偏袒国民党的，只在某些次要的小问题上装作公正的样子，企图欺骗我们上当。开会，吵，再开会，一遍又是一遍，一场接着一场，如此翻来复去，周而复始，没有終了。”

这种“争吵”留下了许多舌剑唇枪的记录，这里仅举一例。一次开会，罗瑞卿说：狡辩改变不了事实。国民党方面的参谋长蔡文治说：罗这话侮辱了他，要罗道歉。美方参谋长海斯凯莫明其妙。蔡便向海斯凯解释：狡字是反犬旁，狗的意思，罗这样说是对他的侮辱。于是，海斯凯也要求罗略表歉意。罗听了蔡自动对号入座的解释，心中暗笑，但仍拒不道歉。海斯凯又转而对蔡说，罗用的是第三人称，不是指你，可以不道歉，还是接着开会。蔡又不干。于是休会，以后因美方坚决要求，又无条件复会，这件事便不了了之。

除了吵架外，还有出席鸡尾酒会之类的应酬。这种场合虽然用不着吵架，可罗瑞卿不胜其烦，仍视为苦事。他渴望到战场上去同敌人真刀真枪地干一场。

由被动到主动

罗瑞卿渴望的时机很快就来到了。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以30万军队分四路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罗瑞卿奉中共中央之命撤出军调部返回晋察冀。随后，毛泽东让他搭乘美军飞机到延安，向他提出：晋察冀军区应出击平汉路，消灭一些弱敌，扫除敌一些据点，以和冀中解放区联成一片。罗瑞卿在返回晋察冀路过晋绥军区时从贺龙处得悉，中央军委已同意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提出的，由他们联合攻下大同，然后再出击平汉路的建议。8月2日，罗瑞卿参加了两军区联席会议，研究攻打大同问题。会议确定成立双方负责人共同组成的前线指挥部，由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张宗逊任总指挥，罗瑞卿虽然未参加这一战役的准备工作，但由于参战部队中多数是华北部队，于是，他主动提出，由他任前线政治委员。

由于对国民党守军坚固设防的力量估计不足，己方力量未予集中，打了1个多月，只扫清了大同的外围。蒋介石看到大同即将不保，以将大同划归傅作义管辖的第12战区为条件，要求傅去解大同之围。傅即派了3万人马从归绥东进，围攻集宁。前指匆忙决定从大同前线调兵到集宁城下与傅部会战。傅部援军一〇一师又到，前指又决定去打援，结果两头落空，于9月13日放弃集宁，16日撤围大同。这一来，从张家口撤退就成为时间早晚的问题了。

在主动撤出张家口之前，晋察冀野战军把注意力放在张家口以东，在怀来地区设防，以求在北平敌人西进时，大量消耗其有生力量。但是，傅作义又抄了后路，派骑兵直插张北，然后从坝上进兵张家口。晋察冀野战军乃于10月11日撤出了张家口。

对于大同、集宁战役，后来罗瑞卿作了反思。他写道：“这是一次战役方针不对，在执行战役时无明确计划（如究竟重点打城，还是打援），是完全没有预见的。先着重打城，而后又被迫打援，以及轻敌，不慎重初战，不集中兵力等完全违反主席军事思想的一个相当典型的战例！”

“反之，如果执行主席原来的指示，把四个纵队集中起来，出平汉线，其结果将是另一样。不仅可先消灭一些弱敌，使部队在俘获中得到一些补充，部队士气必随之增多，而且搞得好的话，还可能求得在运动战中歼敌一部分主力部队的歼灭战，取得更大的胜利。……即使张家口最后还会被敌人占去，但我对敌作战定会有了主动而不致于长期处于被动地位。”

由于大同、集宁战役失利，使华北局面陷入被动达半年之久。

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华北战局，摆脱被动，争取主动，1947年3月，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分别召开了重要会议，明确了今后的作战指导思想，要不计一城一地得失，大踏步进退，先打弱敌，调动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

罗瑞卿主持了军区的政治工作会议。在会上，罗瑞卿

作了题为《如何加强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按照中共“七大”的决定，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尤其是军队工作的指针。在报告中，他详细阐述了古田会议决议和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谭政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提出的政治报告的精神，认为这“应是我军政治工作建设的指导思想”。报告还针对当时军民关系、军地关系不太协调的情况，按照毛泽东所说，军队与地方关系搞不好，主要由军队方面负责的精神，着重批评了军队内骄傲自满情绪和不守纪律的现象。要求军队尊重地方，“先喊地方万岁”，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群众工作，帮助群众生产，增强军民、军地团结。这一做法争取了主动，促进了团结，受到中共中央的好评。

1947年春，晋察冀部队转入反攻。为了便于机动作战，5月在晋察冀军区领导之下，重组^①晋察冀野战军，由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第一政委，杨成武任第二政委。罗瑞卿的任命得到已到达晋察冀的刘少奇、朱德的推荐。朱德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称赞他是“此间优秀干部”，“平时训练、战时指挥均能胜任”。

在组建野战军的干部大会上，杨得志说：“在红军时期，罗瑞卿同志当师长政委时，我还是一个通信班长呢。现在要我来当司令员，我们要在老政委领导下，好好工作。”罗

^① 张家口失守后，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在总结战役得失后，为了集中作战指挥，于1946年12月初撤销了野战军指挥机构，由军区直接指挥各纵队。这次重组野战军是在党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下，将军区和野战军分开，单独组成独立的指挥机构及下辖的纵队（军级单位）。

瑞卿立即插话，要求大家听从杨司令员的指挥。以后，他们互相尊重，关系亲密无间。

4至6月，晋察冀部队连续发动了正太战役、青沧战役和保北战役，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同全国各战场所打的大歼灭战比较还有差距，十分要强的罗瑞卿感到颇有压力。然而此时，他领导部队开展的以诉苦、三查为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配合地方上进行的土改，极大地提高了指战员的阶级觉悟。为即将到来的华北打翻身仗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1947年6月，全国性的战略反攻开始。9月间，为了应付东北野战军的秋季攻势，蒋介石挖肉补疮，从华北抽调三个师出关增援。晋察冀野战军乘敌人兵力减少之机，于10月11日派第二纵队围攻徐水，以相机打援。国民党军从涿县、霸县方向来援。晋察冀野战军以第三、第四纵队北上阻击，双方胶着于徐水、固城、容城之间。15日，驻石家庄之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率一个师又一个团北上，企图南北夹击晋察冀野战军。该敌孤军北上，有利战机出现了。晋察冀野战军一面以一部伪装主力继续围攻徐水，抗击援军，一面调集主力六个旅秘密兼程南下，于19日将敌1万余人包围于清风店地区，于22日将其全歼。这一仗扭转了晋察冀战局，中共中央来电祝贺，称赞此役“创晋察冀歼灭战新纪录”。战役结束之后，罗瑞卿和聂荣臻、肖克接见了被俘的国民党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罗历戎是黄埔第一期的学生，同曾在黄埔军校任教官的聂荣臻有师生之谊。罗瑞卿曾就读于武汉军校，同罗历戎也算是先后同学，而罗

历戎还当过军调部石门（即石家庄）执行小组的国民党代表，彼此也可以说久已闻名了。

清风店一战，国民党第三军半数被歼，石家庄守敌只剩下三十二师一个师。而守军因主将罗历戎已经被俘，人心浮动。10月22日，聂荣臻向中共中央工委提出了“乘胜夺取石家庄”建议。对此，罗瑞卿完全赞成，他对杨得志说：“清风店一战，部队打得很苦，可是我看不会有多长的休整时间。‘夫战，勇气也。’聂司令已建议一鼓作气打下石家庄。”10月23日，朱德、刘少奇代表中央工委致电聂荣臻，同意夺取石家庄，并提出：朱德将于日内到达野战司令部。10月31日，野战司令部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朱德在会上讲话，针对有些部队当时不重视战术技术的倾向，提出了“勇敢加技术”的口号，罗瑞卿就战役的政治工作做了报告，会议确定了进攻石家庄的具体部署。

11月6日拂晓，各部队在炮火掩护下扫清石家庄外围，7日，急袭发电厂，使敌内外沟壕的电网全部失效；占领机场，断敌空中通道；四纵队攻克云盘山制高点。这一期间，奉中央命离开前线，已到冀中军区的朱德和正在主持土地会议的聂荣臻都打电话到野司，希望各部队再接再厉，尽快拿下石家庄。罗瑞卿随即让参谋迅速把朱总司令和聂司令员的期望通知各部队，要他们传达到每一个战士，告诉大家，朱总司令和聂司令员正在等待我们的胜利消息。到11日晚，野战军已占领大部分街道，野司决定12日晨向守军核心工事发起总攻。杨得志赶到四纵，罗瑞卿和参谋长耿飏在野司掌握全面情况。当日中午，敌师长刘英被

俘，守敌 2.4 万人被歼，石家庄全部解放，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打成了一片。石家庄是解放军攻克的第一座较大的城市，朱德曾称赞这一仗“是夺取大城市之创例”。后来，罗瑞卿回忆道：“这两个战役（清风店和石家庄战役），才算是晋察冀军民打了一个翻身仗。”

驰骋晋察冀热绥

石家庄战役后，杨得志、罗瑞卿等率野战军进行短期休整后，即分为左翼右翼两个兵团，北上出击察（哈尔）南绥（远）地区，攻占了吉家庄、蔚县、广灵、阳原、阳高、丰镇、凉城、和林格尔等城镇，消灭傅作义的一些地方部队。

1948 年 4 月，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一道从陕北转移至阜平城南庄。四五月间，毛泽东电召罗瑞卿到城南庄，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要求集中统一的形势下，指出晋察冀中央局、晋察冀军区和野战军对中央、军委请示报告不够，同时要求野战军去冀东寻找战机，准备配合东北野战军作战。毛泽东要求晋察冀野战军争取在一年左右时间内将驻华北的国民党军主力消灭，并夺取除平、津以外的大片地区。

5 月 9 日，中共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及其党政军机关合并，组成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行政委员会和华北军区。聂荣臻为华北军区司令员，徐向前为第一副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罗瑞卿为政治部主

任。野战军分为两个兵团，徐向前率由晋冀鲁豫一些部队组成的第一兵团在山西转战。杨、罗、耿率领的部队编为第二兵团。

罗瑞卿返回前线后不久，第二兵团一分为二。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率第三、第四纵队过平绥路东进。杨成武率第一、二、六纵队留于平汉路以西，举行了保北战役。8月间组成第三兵团，进军绥远，迫使傅作义无暇东顾，以配合东北作战。

杨、罗、耿率部东进以后，经延庆、怀柔，攻克石匣、隆化、丰宁、切断了平承路，随即继续东进，连克榛子镇、丰润、昌黎，与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会师于遵化地区。

由于在冀东未获战机，二兵团又挥师西去，于9月间掩护三兵团西进绥远，随后便转战于平张线以北。10月下旬，傅作义准备偷袭石家庄，其前锋已过保定，中共中央驻地河北省平山县受到威胁，杨、罗、耿奉命率二兵团从宣化地区赴平张路南下，但第四纵队十二旅被阻割于铁路以北，然而谁也没有料到后来在新保安战役中，这个旅却成为平津战局中的一着好棋。

二兵团赶到易县、曲阳时，东北野战军已经拿下锦州并围歼了廖耀湘兵团。傅作义见华北野战军已有准备，其南下部队迅速缩了回去。

11月2日，东北野战军攻克沈阳，东北全境解放。4日，蒋介石电召傅作义到南京磋商。蒋傅估计东北野战军翌年春天方能入关，决定采取固守平、津、张地区，同时确保塘沽海口，以观时变的方针。

傅返回北平后立即调整部署，收缩兵力，将其 50 万军队摆成从塘沽到归绥的长达 1000 余里的一字长蛇阵，随时准备东逃入海或西窜绥远。

为了抓住蒋、傅两系在华北的军队，就地歼灭，毛泽东一面命令东北野战军迅速秘密入关，一面命令华北一兵团停攻太原、三兵团停攻绥远。

从 11 月 23 日开始，东北野战军主力 10 个纵队继先遣部队四纵、十一纵之后向关内进军。24 日，毛泽东发出了平津战役指示。按照这一指示，华北三兵团隐蔽东进，于 29 日向张家口外围发起进攻。华北二兵团则由曲阳北上，于 12 月 1 日集中于紫荆关地区待命。傅作义错误地认为东北野战军主力尚不能入关，乃速运其主力三十五军等部三个师于同月 4 日抵达张家口，与守军会合。毛泽东立即连发三封电报给杨、罗、耿，命令他们迅速占领宣化下花园一线，“务使张家口之敌不能东退”。5 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攻克密云，傅作义发现东北野战军已经进关，忙令三十五军迅速撤回北平。三十五军乘汽车突破三兵团在沙岭子的防线，急速东退。中央军委严令第二兵团迅速占领下花园，阻止三十五军东逃。同时命令华北三兵团重新占领被三十五军突破的防线，严密包围张家口，命令东北四纵队占领怀柔、八达岭一带，切断傅作义东、西联系。此时，二兵团大部分部队尚在大洋河之南。杨、罗、耿命令部队破冰下水，徒涉布满冰茬的大洋河，急速前赶。6 日清晨 3 时，兵团机关正准备渡河，又接到电报，毛泽东命令他们仍“全力在宣化、下花园一线坚决堵击”三十五军。杨、罗、

耿正打着手电传阅毛泽东的电报，作战参谋赶来报告：“三十五军已过下花园，正奔向新保安。”

耿飏脱口而出：“下花园到新保安只有15公里了。”

“这当中还有个鸡鸣驿，下花园到鸡鸣驿有多远？”罗瑞卿问道。

“10公里。”耿飏回答。

杨得志说：“马上通知十二旅，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堵住三十五军，一定要坚持到大部队赶到！”

“同时发报给三纵、八纵和四纵，加快行军速度，拿出拼命的劲头来！”耿飏作补充。

“要让大家都明白。”罗瑞卿严肃地说：“如果让三十五军从我们手里逃出新保安，那我们二兵团是交不了帐的，是要铸成历史大错的！”

电台迅速发完电报，司令部立即在夜暗中渡过大洋河，向北疾进。天明后，人们可以看到罗瑞卿一边扬鞭疾行，一边对正在赶路的部队干部喊道：“你们要快啊，把三十五军拖住，中央要求我们分秒必争！”

这边，大部队在向北飞奔；那边，被隔在平张路以北的十二旅已在鸡鸣驿附近同三十五军接上了火。他们一面在前面顶住敌人，一面在后面抢挖工事。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的王牌，其军长郭景云骄横异常。他竟满不在乎地命令就地宿营，这为二兵团挡住三十五军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

8日，十二旅边打边退，让出了新保安，同时二兵团的大部队终于赶到，完成了对新保安之敌的包围。从时间上，部队比中央军委的要求虽然晚到了一天，但终于将三十五

军包围，仍然得到了中央军委的表扬。

将新保安围起来后，指战员们纷纷请战。杨、罗、耿也向军委建议，尽快消灭新保安之敌。然而，毛泽东在11日发出的《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却提出，为使蒋介石不能迅速作出让傅作义集团放弃平津南下的决策，在两周内对张家口、新保安采取“围而不打”的方针，以便在部署完成之后按照“第一塘芦区、第二新保安、第二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两区，最后北平区”的顺序，各个歼灭敌人。“只要塘沽区（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

罗瑞卿、杨得志等在掌握了这一决策的精神之后，立即向部队贯彻。他们联袂来到三纵队，参加了纵队的党委会。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讨论“为什么围起来又不打？”在纵队领导汇报了指战员的思想动态后，杨得志首先说明了“围而不打”是为了稳住平津守敌，不使其从海上逃跑，然后再就地全歼。罗瑞卿接着具体分析了三十五军在傅系中的地位，他说：“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的王牌，光汽车就有400多辆，丢掉他们南逃，傅作义心痛。围起来不打，就等于给他留下个‘想头’，拖住了他的腿。”最后，罗瑞卿要求这个纵队在7天之内做好一切准备，保证做到一攻即克。

为了将毛泽东的决策化为指战员的思想 and 行动，罗瑞卿殚精竭虑，日夜操劳。杨得志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罗瑞卿同志在这方面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亲自组织各级政治工作干部向广大指战员讲述“围而不打”对全歼华北之敌、夺取平津战役胜利的伟大意义，宣传战役中局

部必须服从全局的道理，深入细致地做工作，帮助大家克服急躁情绪。同时采取广播喊话；阵地前竖起写着“缴枪不杀，欢迎过来，立功者受奖”的标语牌；释放俘虏，让他们带回大量的《告傅作义官兵书》、“通行证”，给三十五军领导人写劝降信等多种形式，向三十五军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

这一期间，三十五军曾多次突围，企图与驻在怀来的暂三军会合，但都被挡了回去。

20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已完成对平、津、张的战略包围，傅作义的一字长蛇阵已被斩为三截。21日中午，总攻即将开始，罗瑞卿和杨得志站在离新保安只有3公里的指挥所观看。罗瑞卿激动地对杨得志说：“这锅饭到底做熟了！”一位参谋插话：“这锅山药蛋都要煮烂了。”罗瑞卿挥了挥手说：“你只看到了‘山药蛋’，毛主席那个锅里煮的，可是既有天津的海，又有北平的山，还有‘皇帝’的金銮殿啦！”

当日，对新保安的总攻发起。翌日，攻克新保安，全歼守敌1.5万余人，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自杀身亡。新保安之役，终于将傅作义的王牌三十五军来了个连锅端。罗瑞卿、杨得志、耿飚和二兵团的广大官兵都为之兴奋不已。

23日，我军攻克张家口。翌年1月15日，攻克天津。17日攻克塘沽。31日，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此时，华北野战军的一、二、三兵团已依次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十九、二十兵团。杨、罗、耿率十九兵团驻扎在颐和园以北的大有庄。一天，他们应邀赴宴。罗瑞卿

又一次踏进了分别已有两年半的北京饭店。在宴会上，他同已站到人民方面来的傅作义见了面。至此，他们终于“相逢一笑泯恩仇”。

早在进入北平前，罗瑞卿等就接到毛泽东要他们休整后开赴太原前线的命令。此时，一些指战员因胜利而产生了骄傲轻敌情绪，罗瑞卿授意政治部主任潘自力搞一个闯王李自成的材料发到部队，要求大家以闯王进京为鉴戒，戒骄戒躁，将革命进行到底。

二三月间，十九兵团奉命开赴太原前线，途中，罗瑞卿赴西柏坡出席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会议期间，他曾向林彪提出，要求随四野大军南下。林同意并报告了毛泽东。彭德怀得悉后也要求将罗调到西北。毛泽东说：是南下还是西去，待打太原后再定。

二中全会以后，罗瑞卿赶到太原前线。3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太原前线司令部，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为副司令员，罗瑞卿为副政委，统一指挥十八、十九、二十兵团，以十九兵团司令部为太原前线司令部；成立中共中央太原前线总前委，徐向前为书记，罗瑞卿为第一副书记，周士第为第二副书记。由于徐向前有病，军委决定由罗、周暂代徐指挥。太原战斗发起前，彭德怀来到前线。

从4月1日起，共产党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开始会谈。至15日，国民党政府代表表示可以接受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但南京国民党政府却下令拒绝签字，和谈破裂。同一天，对太原的

总攻开始。激战4天后，太原解放。

太原打下后，罗瑞卿作为太原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徐向前为主任，另一副主任是赖若愚），十分注意掌握城市政策，严格执行纪律。对于违犯政策、纪律的现象，他从不马马虎虎，而是铁面无私，坚决执行纪律。当时，有的纵队曾从商人已经出走的商店里搞来黄金，有的剧团到仓库搞布来做幕布。他发现后，立即予以纠正，对黄金他要求退回原物，对布，他要求折价付款。对于严重违犯纪律的事例，除给当事人必要的处分外，还要大会、小会批评。他的批评既理直气壮，又尖锐泼辣，没有什么委婉、含蓄，不讲什么情面，常常说得被批评者心跳耳热，宛如屁股下面着了火，再也坐不住了。由于从上到下严格要求，太原驻军的纪律深得各界人士的好评。

1949年6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电召罗瑞卿赴北平。这不能不使正焦急渴望南下或西去参加解放全中国新的战斗的罗瑞卿心情格外地振奋。他迅速向继任政委李志民交代了工作。在向杨得志等话别之后，便同赴青岛休养的徐向前一起乘车前往北平。几天后，周恩来在北平找他谈话，向他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决定由他出任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的首任公安部部长。周恩来同他谈话的当天晚上，毛泽东主席也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了。作为一名革命老战士他虽然渴望着歼灭更多敌人的更大的战斗，但他又是一名随时准备听从党的调遣的共产党员。于是，他欣然接受了中央的决定。同年7月6日，中央军委公安部成立，8月14日开始办公。1个半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

宣告成立。从此，罗瑞卿告别了民主革命时期的戎马征战生活，开始为人民中国的公安保卫事业殚精竭虑、继续奋斗。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斯内夫利特（马林）在华纪事

（1920年1月—1924年4月）

杜 魏 华

1920年

1月 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开始探讨成立共产党的问题。陈独秀迁居上海，他和李大钊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3月 李大钊和邓中夏等商定，在北京大学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4月 1919年中国“五四”运动发生后，共产国际更加关注中国的革命运动，采纳了俄共（布）远东局领导人的建议，派出以魏金斯基为首的党员小组来中国，使命是了解中国的工人运动情况，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到京后，即会晤了李大钊，讨论了建立青年团和共产党组织等问题。尔后，李大钊介绍魏金斯基等去上海，会见陈独秀。

5月 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中国建党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5月至7月 魏金斯基在上海多次与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人座谈，酝酿筹建上海共产党小组，即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

6月 斯内夫利特（即马林）离开荷兰，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会议。

7月19日至8月7日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苏俄彼得格勒召开（7月23日后移到莫斯科举行）。列宁为大会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提出了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中，共产党应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的策略。在这同时大会决议还确立了以苏俄为世界革命中心的理论。会上，斯内夫利特以殖民地委员会书记的身份于7月28日和8月6日两次发言，提出：“应当给东方革命者在苏联学习理论的机会，以使远东能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有朝气的成员”。他还强调了“东方对共产国际所具有的重大意义”。会议期间，列宁提议委派斯内夫利特来中国，任命为共产国际驻远东的代表。其主要任务：“研究远东各国的运动与之建立联系并就共产国际是否需要和可能在远东建立一个办事处，做一些调查”。斯内夫利特受命后，即着手结束在欧洲的一些工作，作来华的准备。大会最后决定，筹备召开东方人民代表大会。

8月中旬 在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中心的上海，陈独秀、李汉俊、李达、俞秀松、施存统等，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亦称上海发起组），并成为创建全国统一

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心。上海党小组成立后，即把《新青年》改为自己的机关刊物。

9月1日至7日 东方人民代表大会在苏联巴库举行。大会就共产国际“二大”决议的精神，提出了促进东方革命的具体措施，如建立东方人民宣传与行动委员会、出版刊物等。斯内夫利特对共产国际开始注重东方深表赞同。

10月 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刘仁静、张申府等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其后至翌年夏，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都陆续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也建立了这样的组织。

11月 魏金斯基接受陈独秀的建议，在上海会见孙中山，共同讨论了有关中国南方的斗争和如何与俄国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等问题。

12月5日 孙中山、陈炯明邀请陈独秀到广州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并请他设立一所宣传讲习所。陈独秀征得李大钊和党的上海发起组同意后，于16日乘船南下就任，并利用宣传讲习所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和筹建成立全国性党组织的活动。

1921年

1月 魏金斯基在华工作告一段落。回国前，在北京与李大钊、张国焘等人会谈数次，谈及有关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运动的情况，他建议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召开大会，成立中国共产党。

3月 陈独秀草拟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党章草案，供党内同志讨论。

春 张太雷赴伊尔库茨克，3月到达，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任中国支部书记。当时成立的中国支部，是由远东书记处工作人员和中共代表张太雷组成。魏金斯基奉调回国，在远东书记处工作。

4月7日 广东国会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孙中山在会上当选为非常大总统，于5月5日在广东就职。

4月初 斯内夫利特由柏林启程来华，途经维也纳时被捕入狱，4月14日出狱。16日离开维也纳，于5月21日到达新加坡。

6月3日 斯内夫利特乘意大利“茵斯布鲁克”号轮船（原名“阿奎利亚”）抵达上海，下榻“东方饭店”32号房间。翌日，他化名安德莱森到荷兰领事馆办手续，以英国杂志“东方经济学家”记者身份进行活动。14日起搬进公共租界，先在麦根路32号住，后又迁到外滩路6号居住。

同月 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接替魏金斯基在中国工作的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尼科尔斯基到达上海，与斯内夫利特密切配合工作。

6月22日至7月12日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代表参加了会议，并于12日发表演说。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参加了会议。会后决定筹备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大会，张太雷参加了筹备委员会工作。

7月23日至8月初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上海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等 12 人。共产国际代表斯内夫利特和尼科尔斯基出席了会议。最后一天的会议是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举行的。会议的中心任务是讨论正式成立党的全国组织。大会通过了党纲，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

8 月 11 日 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斯内夫利特起草了宣言。书记部机关报《劳动周刊》同时在上海创刊。

8 月 21 日 斯内夫利特在上海撰写了《评勃莱斯福特的著作与〔共产〕国际在东方的政策》一文（载于《美洲快讯》），批评了英国作家勃莱斯福特对于共产国际东方政策的错误看法，指出：“第三国际号召有色人种中的工人和农民在国际大学中单独组成强有力的队伍”，其中包括“中国人”。

28 日 孙中山在广州致信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叙述了辛亥革命及其后的历程，并总结了经验教训，希望今后加强联系。

同月 张太雷回到上海，担任斯内夫利特的翻译和助手，并负责联络与组织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选派代表去苏俄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事宜。斯内夫利特建议陈独秀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回上海专任中央局书记的工作。党中央派包惠僧去广州接请，他们于 9 月中旬回到上海。

9 月 5 日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和伊斯兰联合会，授权

斯内夫利特为两党全权代表：“在其认为必要的一切地方，均可行使权力”。

同月 党中央开会，就参加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团的组成问题做出具体安排。

10月4日 陈独秀、杨明斋等5人在上海环龙路渔阳里住处被法国巡捕房逮捕。经张太雷与斯内夫利特等人竭力营救，陈独秀于6日获释，余者均于27日获释。

11月21日 在张太雷陪同下，斯内夫利特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的代表张继。国民党决定派张秋白为国民党出席远东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时邀请斯内夫利特去桂林访问孙中山。

12月4日 孙中山抵达桂林，成立北伐大本营。

月初 尼科尔斯基奉调回苏俄。

10日 党组织委派张太雷陪同斯内夫利特（当时化名为西蒙博士）离开上海，前往广西桂林。途经汉口时会见了包惠僧。后经长沙时，斯内夫利特出席了当地青年团的集会，讲解了阶级斗争和俄国革命等问题，并由文化书社经理易礼容介绍，张太雷还陪同斯内夫利特在清水塘会见了毛泽东。

23日 斯内夫利特和张太雷抵达桂林，下榻广西银行，停留约两周。在这期间，他在孙中山设于独秀峰附近旧桂王府之北伐大本营与孙前后会谈3次。斯内夫利特谈到苏俄与国民党结成联盟的可能性，并提出建立革命武装，应先创办军官学校等建议。孙中山均表示赞同，但认为与苏俄结盟问题要在北伐战争取胜后才能实施。

同月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制定了统一战线提纲。鉴于反动派向工人的进攻日益加强，文件号召西方各国共产党应立即着手建立工人统一战线。苏维埃共和国全权代表巴意开斯率第一个苏俄外交使团来中国，同北京政府谈判两国邦交正常化问题。

1922 年

1 月 10 日 斯内夫利特撰写了《重振中国与对苏关系》一文，指出：华盛顿会议把中国推向困难的处境，而帝国主义势力又相互勾结，使中国与苏联成为其牺牲品。作者认为：这就决定了中苏双方应相互帮助，要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四国联盟。

12 日 香港 6000 多中国海员工人举行反英大罢工，3 月初增至 10 万人。罢工坚持 56 天，终于迫使港英当局让步，取得胜利。

1 月 21 日至 2 月 2 日 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中国代表团 30 余人，团长张国焘。团员包括有国共两党以及工人、文教、新闻等各界代表。东方大学学员任弼时、瞿秋白、肖劲光等列席了大会。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张国焘、邓培、张秋白等人，关切地询问了国民党和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等问题。这次大会的主旨是贯彻共产国际“二大”关于殖民地革命的理论。会议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23日 斯内夫利特一行抵达广州，正值海员罢工期间，翌日即开始了调查工运的活动。除此之外，在停留的10天中，斯内夫利特还出席了广州、海丰等地的青年集会，介绍了十月革命的情况。他还与张继、陈炯明等南方国民党政府人员谈话接触，了解国民党及其领导人的情况。

2月3日 斯内夫利特离广州乘船北上，7日抵达上海。

19日 斯内夫利特离上海从陆路返回汕头，目睹了汕头工人罢工的具体情况。

28日 斯内夫利特于汕头致函三宝垅，热情称赞香港海员大罢工“干得漂亮”，比西欧的工人罢工“更为出色”。据他调查，至2月20日止，就有几千名罢工者被动员参加了当时的进步革命组织国民党。

同月 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撤销远东书记处。中国、朝鲜、日本等国的革命运动，由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负责。

3月7日 斯内夫利特离汕头经海路回到上海，因途中患病，在《上海俄文生活报》编辑戈尔曼家中暂住。在沪期间，斯内夫利特向中共中央提出中国共产党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

19日 斯内夫利特撰写了《远东通讯》一文，发表在同年5月6日、8日出版的《论坛报》上。文章详细介绍了香港海员大罢工的经过和会晤湖南省长赵恒惕的情况。

20日 斯内夫利特离上海于23日抵达北京，下榻六国饭店（现北京饭店旧楼）。在京期间他访问了苏俄使团官

员巴意开斯，并请巴意开斯转交给苏俄一份介绍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情况及建议莫斯科委派一位苏联使者来中国南方工作的报告。在此前后，斯内夫利特还和蔡元培、李石曾等人会晤。

29日 斯内夫利特因病未愈，离京返沪，办理回荷兰的签证，准备探望亲属。尔后，再转往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沪期间，与朝鲜人及《上海俄文生活》的主笔戈尔曼等经常联系。

同月 张太雷与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到达上海，负责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决定张太雷参加与孙中山的会谈工作。

4月初 驻北京苏俄使团成员巴意开斯召达林到京，传达莫斯科指示，并授达林以正式全权代表身份同孙中山会谈。

6日 陈独秀给远东局的魏金斯基写信申明：“共产党与国民党革命之宗旨及所据之基础不同”；“国民党联美国、联张作霖、段祺瑞等政策和共产主义太不相容”。中共中央不同意斯内夫利特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的建议，并要求魏金斯基代向共产国际陈述。

24日 斯内夫利特离沪乘“小岛丸”号轮经新加坡、马赛、柏林，于6月初到达荷兰阿姆斯特丹。16日在议会选举会上作报告，介绍中国革命情况及南方工人运动，资产阶级运动与无产阶级的关系等问题。7月初，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革命等情况。

月底 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对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方针问题。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出席了会议，并根据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精神，谈及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反帝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会议尚未作出决议，但对国民党的态度开始有了改变。

4月末至6月15日 张太雷和达林在广州与孙中山进行多次会晤，谈论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等问题。

5月1日至5日 根据党中央的决定，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口号，通过《全国总工会组织原则》等决议案。大会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人组织的总通讯机关。

5日至10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通过了团的纲领和章程，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大会选出团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施存统为团中央书记。

6月15日 中共中央第一次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要解决中国的混乱政局只有“打倒军阀，建设民主政治”，认为“中国现有的各政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表示“邀请国民党等革命的民主派及革命的社会主义各团体，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16日 陈炯明公开叛变孙中山，围攻总统府。孙中山脱险抵海珠海军司令部，登永丰舰讨逆，与叛军对峙40天

之久。

30日 陈独秀在给魏金斯基的信中表示：“我们很希望孙文派之国民党能觉悟改造，能和我们携手，但希望也很少”。

7月10日至12日 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10日作出委派斯内夫利特的决定，并于12日签发了委任书，指出：“斯内夫利特同志代表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在中国南方同党中央联系，并代表我们同南方国民革命运动领导人合作”。“本委任书于1923年9月前有效”。

11日 斯内夫利特在莫斯科完成了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并于17日提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报告中，他详细地介绍了中国、朝鲜、日本三国的革命运动情况。关于中国的工人运动，他认为上海较差，南方较好，而且认为在南方“工作定会卓有成效”。他对国民党的情况作了分析，认为国民党的性质“是民族主义的”“与罢工工人之间联系紧密”，国民党的纲领允许“各种不同的团体都能加入进去”。因此，他建议共产党“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并通过国民党联系广大群众。在报告中，他还对孙中山的联俄态度作了分析。

16日至23日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党成立后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探索，明确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并通过了《关于“民族联合战线”的决议》、《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等。大会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

17日 巴意开斯正式照会北京政府外交部，宣布苏俄政府“业经允准本代表回莫斯科，派越飞为全权代表，使与中国政府商议一切。”

18日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正式同意斯内夫利特关于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建议。魏金斯基代表共产国际起草一文件指示，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接此短笺后应根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利浦（斯内夫利特——编者）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指示打印在斯内夫利特的衬衣上，秘密带来中国。

24日 斯内夫利特与新委任的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及其家属一行启程乘火车离开莫斯科来华。

同月 斯内夫利特撰写了《中国南方的革命民族主义运动》一文，登载在《共产国际》杂志俄文版1922年第22期上。文章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作了较详尽的介绍；对南方的革命运动及孙中山、陈炯明等人作了具体的分析；并对年初爆发的海员大罢工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认为国民党在海员中进行的宣传非常成功。“国民党领导人参加这次罢工斗争所采取的方式和我们参加革命工会的方式完全一致”。他认为“在这些工会中工作的共产党员目前正试图与华北的工人取得联系并建立工人总部，如果他们想要在工作中取得成就，就应该注意与华南民族主义运动之间保持友好的关系”。

月底 拉狄克根据斯内夫利特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主持拟定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八月指示”。文件指出：

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训练能保持独立思想的党员”来“组成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共产党人应“支持国民党内代表无产阶级分子和手工业工人的那一翼”。应“组织劳动群众”等。文件由斯内夫利特带回中国。这一指示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西湖会议上进行了讨论落实。

8月9日 孙中山离开广州经香港于14日到达上海。

12日 越飞率随行人员24人经东北抵达北京，与北京政府谈判中苏建立外交关系等问题。尔后，斯内夫利特赴上海，旋即与张太雷、张继等联系，讨论国共合作等问题。

13日至24日 斯内夫利特与张太雷、陈独秀、邓中夏等多次商谈召开党的会议，以贯彻共产国际“八月指示”的有关问题，并决定通知李大钊等来沪参加会议。

8月中旬 达林、巴意开斯先后离华回苏。

18日 李大钊在北京宴请越飞并答应介绍其与孙中山会见。尔后，李大钊还前往乐交民巷会见越飞，并为其在北京大学举行了欢迎会。

23日 李大钊到达上海，在香山路7号会见孙中山，“讨论建国种种问题”。尔后，又进行了多次交谈，对“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林伯渠等参与讨论，宋庆龄在座。不久，李大钊由孙中山主盟，张继介绍以个人身份率先加入国民党。

25日 斯内夫利特作为苏俄使者越飞的代表在上海法租界与孙中山会谈，向其介绍了苏俄革命的情况及共产国际的在中国问题上的有关看法。孙表示现深感与苏俄建

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尔后，越飞亦曾多次致函孙中山，商谈两国合作等问题。

下旬 斯内夫利特多次与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讨论国共合作等问题。在这期间还与孙洪伊讨论了工作问题。

28日至30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等。斯内夫利特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和“八月指示”，要求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进一步建立民主统一战线，推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是由于党内多数同志对此做法有疑虑，所以会议后，只有少数中央领导同志加入国民党。

9月1日至3日 西湖会议与会者休会后旅行下榻于上海，尔后又开会讨论有关青年团等问题。在这期间，斯内夫利特与李大钊、张国焘、陈独秀、张太雷等进一步讨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斯内夫利特还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同去拜访了孙中山，向其说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实行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主张。

4日 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各省市国民党负责人50余人开会，讨论改组国民党的问题。斯内夫利特、陈独秀、张太雷应邀参加会议。会后，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会后，斯内夫利特还单独与张继讨论国共两党的关系问题。

6日 孙中山指派张秋白、丁惟汾、陈独秀等9人组成国民党党务改进案起草委员会，7日开始筹商。

30日 孙中山分别与斯内夫利特、《申报》记者、香港《申报》记者会晤。

10月9日 李大钊陪同孙中山的代表张继前往洛阳与吴佩孚会谈，直至11日离洛回京。

中旬 中共代表团陈独秀、刘仁静、王俊等3人出发，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

14日至11月1日 斯内夫利特给季诺维耶夫、越飞、魏金斯基分别发出了第三个工作报告，谈中国的政治形势及中国共产党的状况。在这期间，斯内夫利特还与越飞进行过多次会晤，讨论与吴佩孚的接触方针。

23日 开滦煤矿等5矿工人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联合罢工。斯内夫利特在此期间，曾亲临天津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特派员罗章龙商讨罢工的问题。

11月6日 李大钊与越飞在北京会晤。越飞给李大钊1000元（墨西哥元）作为支援工人罢工的费用，并答应再筹措400元。

7日 北京各界团体召开“苏俄十月革命纪念会”，李大钊任大会主席，并在会上发表演说。当日晚8时，越飞设宴招待各界人士，庆祝十月革命节。

同日 越飞致函斯内夫利特，认为孙中山不应猜疑吴佩孚与陈炯明有联系；催促斯内夫利特尽快北上来北京商讨工作。并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尽快迁北京，以利于领导罢工运动。

11月7日至12月5日 共产国际在彼得格勒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11月9日起改在莫斯科继续举行),陈独秀率领中共代表团成员张太雷、刘仁静、王俊等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做了报告,瞿秋白任翻译。大会通过了《东方问题总提纲》,魏金斯基和陈独秀参加了制定提纲的讨论。刘仁静就中国的国内形势和国共合作等问题在会上作了发言。会上陈独秀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17日 越飞函告斯内夫利特:孙中山已派张继持信赴北京与越飞会面,想尽力说服越飞不要信任吴佩孚;也不要派军队去攻打张作霖。

17日后 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到北京。

23日 斯内夫利特撰写了《中国劳动群众的觉醒》一文,对中国劳工运动热情地给予了肯定,他认为一年来“他们的组织发展起来,集中起来”,“已经很可以阻止野心的军事行动并帮助那些为国家统一和自由作功夫的领袖与国民运动了”。他高度地赞扬中国“近代产业的工人已经醒了;他们已经不象以前一样是一个没有意志的奴隶了”。文中批评了国民党“还未见到中国劳动觉醒的重要”“太注全力于军事组织,把群众的教育疏忽了”。

12月中旬 越飞与斯内夫利特合写《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尤其是在中国的工作问题》提纲,共14条。

12月23日 斯内夫利特离中国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的工作情况,“为继续执行八月策略而辩护”,并讨论俄国对华北的政策。在莫斯科期间,斯内夫利特与工人西玛·里沃夫娜结为夫妻。

1923年

1月1日 孙中山在上海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宣布对时局主张。

2日 孙中山召集会议，重新推选干部，宣布各重要干部的使命。陈独秀被推选为议委。林伯渠为国民党的总务部副部长，协助孙中山办理改组国民党的有关事宜。张太雷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干事。会上还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翌日又公布了《中国国民党总章》。

1月初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布哈林致斯大林一便笺，介绍斯内夫利特与其谈话，交换对苏联在中东铁路和蒙古问题上有关政策的看法。

1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了会议。会议认为“马林和魏金斯基同志参加下一次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是适宜的”。

同日 斯内夫利特在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上作了关于中国形势和革命运动情况的汇报。布哈林根据斯内夫利特提供的情况起草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后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认为，在目前条件下，“国民党与年青的中国共产党合作是必要的”，但“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斯内夫利特在莫斯科期间，曾与斯大林、加拉罕、布哈林等交谈，特别与斯大林交谈了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斯内夫利特认为：

最好把中东铁路归还给中国，而斯大林认为归还铁路，将会导致波斯事件的重演，即另一个国家插手的问题。

同日 为在日本、朝鲜和中国开展革命运动的需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决定：“建立由片山潜、马林和魏金斯基三人组成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并提出七条任务。

11日 斯内夫利特被任命为共产国际东方部符拉迪沃斯托克局的第三名委员（12日签署）。

同日 斯内夫利特离莫斯科回中国。途中，他在赤塔与远东共和国原负责人谈话，后者强调指出，仍应维护苏俄在中东铁路的利益。

15日 越飞致中国外交官员，在其“出京期内应由本国参议达夫庆氏暂行代理”职务。

16日 越飞离京，17日抵上海，20日至25日赴莫利爱路29号会见孙中山，就中苏关系、中东铁路及蒙古等问题，进行了多次会谈。

26日 《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国民党正式确立了联俄政策。

28日 孙中山派廖仲恺赴日本热海，继续与越飞商谈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的具体事项。越、廖相处月余经常谈及十月革命等问题，使廖对俄国革命有了进一步认识。廖归国后协助孙中山积极投入了联俄工作。

2月1日 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成立。

3日 斯内夫利特回到北京，尔后与李大钊等中共领导人在苏联代表团驻地，讨论了国共两党合作等问题。

4日 京汉铁路爆发全路工人总罢工。

7日 直系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对京汉铁路罢工工人进行了血腥屠杀，造成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为“二七”惨案告全国工人书》，号召全国工人“把工人阶级组成一个极大极强的团体”，“打倒敌人军阀，建设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来代替军阀政治”。

11日 斯内夫利特持孙中山的介绍信，作为柏林《国际新闻通讯》的代表赴奉天。13日抵奉天后即与张作霖讨论中东铁路问题及张与东北地区白俄的关系等问题。

15日 斯内夫利特启程返回北京。回京后，立刻与中共中央领导人讨论“二七”罢工问题，认为当时北京政局压迫加剧，中央应随即迁往上海，并提及中央今后还需迁往广州以更便于工作。会上斯内夫利特还提议中央应派专人到共产国际报告“二七”大罢工情况。

同日 孙中山离沪南下，17日抵达香港，出席香港各公团宴会，赞扬工人为讨陈（炯明）所作的贡献，并希望今后继续团结救国。

20日左右 张国焘受中共中央委托，启程赴莫斯科，报告“二七”罢工情况。

21日 孙中山抵广州，当天在东郊设立大元帅府，就任大元帅职。

2月中下旬 中共中央机关迁回上海。

3月3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表《就京汉铁路罢工工人流血事件告中国铁路工人书》，指出：中国铁路工人已同为反对各国剥削者而斗争的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了。

8日 斯内夫利特撰写了《中国铁路工人的罢工》一文，文中报道了年青的中国工人阶级运动的情况，特别介绍了华南和华中的工人运动，还揭露了殖民主义者与反动当局勾结镇压铁路工人的罪行。并赞扬说“东方人也能为了崇高的思想献身”。

21日 斯内夫利特于上海致函布哈林，陈述数年来的艰苦工作，望共产国际照顾其妻子与孩子的生活。

30日 斯内夫利特在北京李大钊家里召开会议，和张太雷等一起讨论并着手解决湖北代表团与张国焘之间日益增大的分歧。

同月 俄国铁路工人捐赠3万卢布支援中国工人运动。

4月3日 斯内夫利特于上海致函拉夫斯坦，坚决反对某些人只在中国居住很短时间，就在俄国报刊随意发表对中国政治形势完全错误的分析文章，而且在“二七”罢工后还提出“吴佩孚是中国军阀中最开明的人”的错误看法。指出“这很容易引出荒谬的结论”，“只会使中国出现第二个袁世凯”。

月底 斯内夫利特抵广州与孙中山建立联系，并致函达夫谦详细介绍孙中山的近况。自此，他投入了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党中央由上海迁往广州。

5月1日 斯内夫利特在广州参加公众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

同日 苏联政府致电孙中山，督促其加强政治宣传；答应给予援款；并答应助其组建非野战部队。

2日 斯内夫利特致函达夫谦，报告：“孙中山星期日派汪精卫赴奉天，力促张作霖接受俄国关于铁路的建议”。

9日 斯内夫利特在《向导》第24期上发表《吴佩孚与国民党》一文，指出吴佩孚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是一个祸害”，“他是一个比以前世界上一切的专制皇帝还专制的人物”。同时还批评“国民党的注意太完全放在军事上和放在政客议员秘密的计划上”了。

12日 孙中山于广州复电越飞，表示赞同苏联政府5月1日来电所提出的一切建议，并对苏联政府的各种支持表示感谢。

13日 共产国际对即将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发出13点具体指示。

21日 张国焘乘船启程回国，29日到达广州后即与斯内夫利特会晤，转告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意见，认为：在中国的问题上，东方部的拉狄克和萨法罗夫属于左派，布哈林属于中派，而斯内夫利特属于右派观点。同时他把共产国际通过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的决议》带回来交于中共中央。

24日 孙中山致函达夫谦和越飞。表示：将立即着手改组国民党；加强宣传工作，定创办几种报刊，并“望支付已承诺的援款”。

30日 斯内夫利特致函拉狄克、萨法罗夫，谈及中国革命运动的情况，并声明不能苟同在中国的工作问题上划

分左、中、右观点的看法。

31日 斯内夫利特写报告致共产国际，汇报了孙中山财政困难、军事形势更加不利的状况，认为“孙中山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在南方控制局面”。报告还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的各种状况，并特别强调了召开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的“绝对必要性”。

月底 汪精卫、张继从奉天启程返回南方，经上海于6月13日到达广州，随即到惠州向孙中山汇报与张作霖商谈情况，并与斯内夫利特会晤。

同月 斯内夫利特与陈独秀共同拟定了国民党改组计划草案，其中注重政治、宣传工作。草案提交孙中山阅后，孙中山予以批准并表示满意。

5月至6月 斯内夫利特记录并撰写了《关于京汉铁路工人运动》的详细调查报告，为中共的“三大”召开做准备。

6月5日至8日 斯内夫利特于广州致函达夫谦和越飞，详尽叙述了自己近来的工作，提出不要为孙中山“在南方毫无意义的军事行动提供财政援助”，并向达夫谦建议“任命张太雷同志作罗斯塔社驻广州的代表”，称赞他“能干、可靠”。

11日 斯内夫利特在广州住处，与李大钊讨论中国革命形势等问题，李大钊转告斯内夫利特，达夫谦要他写有关最近广东的情况报告。

12日 斯内夫利特致函达夫谦，详细地报告了广东省的目前形势，特别是军事形势，认为“情况又有所好转”。

但是吴佩孚“来自北方的威胁还是很严重”，“国民党在这里几乎没有开展什么工作去争取人民对孙的支持，以达控制广东的目的”。

12日至20日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大会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月12日通过的在中国实行国共合作的决议，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大会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和《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发表了宣言。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罗章龙五人组成中央局。斯内夫利特出席了大会，作了回顾第一、二、三国际历史的报告，并把大会宣言英译后，寄往共产国际和远东局。

16日 周恩来和尹宽、林蔚等一起到里昂，与奉孙中山之命到法国筹组国民党支部的王京歧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双方协议：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员80余人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不久，孙中山和国民党总部委任周恩来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筹备员，聂荣臻、李富春等人也参加了筹建国民党巴黎通讯处的工作。秋季，周恩来被委任为国民党驻欧支部特派员。

24日 新的中共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了北方的政治危机及国共合作问题后，对当时的中央工作又作出了4点具体决定。

同日 斯内夫利特在广州致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报告中共“三大”召开期间，讨论国共两党关系的有关情

况。他明确表示不同意会上张国焘等人提出的：要建立一个纯粹工人阶级政党和排斥资产阶级，认为它没有革命性的观点。他认为“中国资产阶级自身的民族利益与外国资本家是对立的”，他们在政治上的要求是革命的。因而“不能断言中国资产阶级对国民革命没有价值”。斯内夫利特指出：“列宁的重大作用乃在于他密切结合俄国实际，在于他善于运用革命策略”。他认为中国共产党内“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少”，因此必须“出版自己的宣传材料以扩大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

25日 斯内夫利特于广州致函在北京的李汉俊，劝其为党好好做事，多为党的报刊写些理论文章，并应积极支持新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27日 加拉罕被任命为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其后，他向共产国际建议：请鲍罗廷到中国，任孙中山的顾问。

同月 斯内夫利特撰写了《中国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一文，指出辛亥革命没有影响到广大群众，没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组织做革命宣传。认为中国的“革命如若对于农民没有一点影响有何意义？”“国民党不能算一个政党”。但他很有信心地讲“有许多证据可以证明中国人民很有伟大的质分”，“我们决计不至失望”。

7月1日 中共中央于广州致函国际红色工会，函称：“支援中国工人运动的278英镑（……）我们已经收到”，以后定“将每月预算随信附上”。

同日 中共中央致函苏联铁路工人联合会，感谢苏联对中国工人阶级的援助。

3日 斯内夫利特致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萨法罗夫，提出中国“因罢工失败确实使这个小党（指中共）处境艰难”，“建议你们批准至少从7月到今年年底这个期间每月资助1400卢布”。

4日 由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对于时局之主张》在广州发表，《主张》指出：“只有国民会议才能真正代表国民，才能够制定宪法，才能够建立新政府统一中国”。

7月上旬 中共中央局召开会议，接受斯内夫利特建议，由陈独秀、蔡和森等以《向导》编委身份出面与孙中山会晤，座谈北方的形势及孙中山今后的计划。

13日 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会议，针对孙中山单搞军事计划，忽视政治宣传工作的状况，认为中央局“在广州做不了很多事情”，应转到北方“进行召开国民会议”的宣传等工作等活动，并计划在上海召开学生代表会议和劳动大会，决定中央局“将于近日启程”迁往上海。斯内夫利特参加了会议。

同日 斯内夫利特致函达夫谦和越飞，报告了中共中央会议的详细内容，认为：“从经济上支持孙〔中山〕在南方的军事计划并无益处”，孙中山的“那些计划其实并没有革命意义”，而“支持我们的同志进行召开国民会议的宣传倒可能很有益处”。他还指出当时中共“最大的困难是没有经费来进行大规模的宣传”。为此，希望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援助”，并随信附上了陈独秀所拟定的《召开国民会议进行宣传半年所需费用表》。

15日 斯内夫利特于广州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详细报告了中国北方危机的形势、孙中山的现状及共产党积极开展工作的情况。他认为：“国民党作为政党不关心〔北方〕危机”，仍主张发展南方军事力量。“曾多次试图改变他（孙中山——编者）的观点，然而毫无所获”，他还提及一些兼任《向导》编辑的中共领导人也曾向孙中山做工作，但收效不大。因此斯内夫利特认为孙目前“更不愿改组国民党了”，而中共中央则想在北方通过新的地方组织去推动国民党的现代化并“在农民中进行宣传”。他向共产国际呼吁：眼下最大的困难是“还没有费用”。他在报告的最后部分还特别提出，在目前中国的革命运动中要警惕一些列强在“存心干涉”。

18日至20日 斯内夫利特先后致函越飞、达夫谦，详细汇报了中共中央19日会议内容。他认为孙中山如果“仍然坚持他的一个政党的观点，只要他不请共产党人去工作，就根本不可能指望国民党会现代化，不可能指望他们进行反帝宣传”，他希望共产国际把钱用来资助共产党进行宣传工作。

19日 中共中央在广州举行会议，讨论中共同志“在国民党中的处境问题”，认为：为了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为了发展国民运动”，“必须批评国民党在政治上的无所作为和它的错误行动”。斯内夫利特参加了会议。为了争取达夫谦的具体帮助，会上决定派李大钊、瞿秋白先去北京工作。

21日 斯内夫利特在任职期满、准备离华之际，致函

廖仲恺：“十分坦率”地批评了国民党的行动、策略以及体制等问题。他指示：虽然国民党的主义是革命的，但实际行动趋于封建主义，而“共产党人都可成为真正革命的民族主义政党中的优秀分子”，国共两党的合作只能建立在友谊和一定的纲领的基础上，“决不能建立在服从的基础上”，“必须清除服从个人和朋友义气的旧观念”。他呼吁国民党的急进分子，要做“真正的革命者”，而“绝不做违背革命信念的事情”。

下旬 中共中央从广州迁到上海。斯内夫利特随中共中央一起前往上海。

8月5日 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在上海会见了斯内夫利特，他们和张继、汪精卫等一起商议了组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的问题。

16日 蒋介石率代表团离开上海，经大连、满州等地赴苏，于9月12日到达莫斯科。代表团成员中有中共党员张太雷、沈定一、王登云等。

20日至25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大会拥护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也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

中旬 斯内夫利特离开上海，于8月底抵达莫斯科，并会见了鲍罗廷。

月底 苏联政府和苏共派鲍罗廷来华为驻广州常设代表。他先到哈尔滨，后到沈阳与张作霖商讨了中东铁路问题。9月底到达北京，开始接触中共党员，了解中国情况。

8月 孙中山致函越飞，建议他和苏联政府把中苏有关中东铁路的谈判推迟至适当时候（该信由斯内夫利特转发给当时在东京的越飞）。

9月1日（或2日） 加拉罕一行到达北京，与北京政府谈判恢复中苏两国邦交问题。

9月中旬至10月下旬 斯内夫利特在莫斯科先后与正在访苏的蒋介石等人以及魏金斯基多次交谈国共合作和援助孙中山等问题。

月底 鲍罗廷到达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其他领导人。10月初持加拉罕的介绍信南下，于10月6日到达广州。

10日9日 孙中山举行欢迎鲍罗廷的招待会，18日又亲笔书写了聘请鲍罗廷为中国国民党组织教练员的委任状。

中旬 鲍罗廷同当时在广州的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开会，讨论改组国民党的方法，并决定力劝孙中山召集改组国民党的会议。

25日 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讨论改组国民党的必要性和这年5月斯内夫利特与陈独秀一起拟定的国民党改组计划。会上，孙中山指派廖仲恺、谭平山等9人为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等5人为候补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聘请鲍罗廷为顾问，办理改组事宜。

11月初 魏金斯基再度来华，接替斯内夫利特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11月8日至28日 蒋介石多次致函斯内夫利特，邀请他再来中国工作，并希望他与张太雷联系路费等事宜。

12日 张太雷函告斯内夫利特：谈及蒋介石将建议孙中山邀请他再次来华工作之事，并请他帮助购买书籍。日后又多次通信联系有关斯内夫利特来华工作事宜。

24日至25日 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会议决定：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区，中国共产党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一并加入”；凡国民党无组织的地区，我党则为之建立。会议还决定中国共产党要通过党团性质的秘密小组，在国民党内贯彻共产党的纲领和政策，努力争取“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

25日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国民党旅欧支部在里昂正式成立。周恩来在会上发表演说，对国民党内腐败现象作了切中要害的批评。会上，周恩来当选为国民党旅欧支部执行部总务部主任，李富春当选为宣传主任。在王京歧回国期间，周恩来代理其执行部长工作。

25日至28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举行会议，28日通过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决议以民主革命精神解释了三民主义的观点。蒋介石于会后致斯内夫利特一函称：“回穗后我将同孙中山博士晤谈，将发电邀请你，望你尽快前来”。尔后不久，蒋介石一行离莫斯科回国。会议通过的决议，由蒋介石带回，为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所用。

12月22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发出《第24号通告》，要求大家努力同国民党合作，帮助国民党改组。

25日 中共中央发出《第13号通告》，要求全体共产党员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

12月 李大钊到达广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筹备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年

1月初 中共中央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国民党改组问题。陈独秀、瞿秋白和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出席了会议。

15日 魏金斯基于上海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国共两党的近况及朝鲜、日本等国近况。

20日至23日 在孙中山主持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中共中央组织了一个由李大钊为首，有谭平山、瞿秋白等人参加的中共领导人小组出席了大会。李大钊为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大会通过了有共产党人和苏联顾问参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从而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大会选举了有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10名共产党员担任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接着改组国民党中央党部，共产党人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农民部的部长。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以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这样，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民主

革命联盟。

3月13日 斯内夫利特致函共产国际远东局，问及能否准其回荷兰3个月后，来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会议，尔后能否再安排其来中国工作的问题。

4月3日 斯内夫利特要求再次来华工作的愿望，经多方联系未能实现。他于3月27日离开莫斯科，在柏林停留了两日后，即返回荷兰定居。回国后，他参加了当地的工运活动，并于5月任荷兰全国劳工组合书记处主席。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立的 震东社会科学院

陈 汉 初

“震东社会科学院”，附设于汕头市花园路震东中学，创办于1926年，主要负责人是我国早期著名马列著作翻译家、共产党员李春蕃（柯柏年），理论家、著名“非党布尔什维克”李春涛等。“震东社会科学院”得以创办的原因是，由于东征军进驻潮汕，周恩来主政东江，工农群众运动急剧发展，急需大量具有一定马列主义水平的工农骨干，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指挥部总政治部便在东江发起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会，政治部驻各县宣传员也在各地相应组织了社会科学研究分会。社会科学研究会是一个遍及东江城乡、具有广泛群众基础、以宣传研究马列主义为宗旨的革命学术团体。后，中共潮梅特委（后改中共汕头地委）为进一步加强这一工作的领导，便决定在震东中学内设立“震东社会科学院”，对外名义称由国民党汕头市党部创办。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创办的一所融马列主义教育、研究、宣传于一体的正式机构。

为了把马克思主义的书，“介绍给喜欢研究社会科学而

又不能直接阅读外国书的同志们”^①，“震东社会科学院”翻译了大量马列著作，并及时刊印出来，将最新的译作献给震东社会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以外的研究社会科学的人”^②。据现有资料，记载李春蕃当年在震东社会科学院的译作，有的是刊于当时《岭东民国日报》《革命》副刊上，仍保留版权的新作，有的是当时刚出版或将出版的。如：

列宁：《唯物史观与马克思〔思〕》（保留版权）

马克思：《1848年6月巴黎无产阶级之失败》
（保留版权）

斯大林：《列宁主义概论》（将出版）

列宁：《帝国主义浅说》（新文化书社版）

列宁：《国家与革命》（将出版，国光书社）

列宁：《论妥协》（保留版权）

列宁：《革命之一根本问题》（保留版权）

列宁：《俄国革命之四周年》（保留版权）

这些译作，都是李春蕃悉心研究、辛勤劳动的结晶。

震东社科院还在《岭东民国日报》《革命》副刊上设立《研究列宁主义书目》专栏，经常刊登书目，以便与“社会科学院以外的研究社会科学的人”共同学习马列主义。1927年1月21日，是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日，《革命》副刊刊登的《研究列宁主义书目》，开列了34本书，其中介绍列

① 李春蕃《〈国家与革命〉译者序言》，载1921年1月5日《岭东民国日报》副刊。

② 李春蕃《〈俄国为什么先社会革命〉开场白》，载1926年12月24日《岭东民国日报》。

宁生平的 4 本，介绍列宁主义的 4 本，介绍俄国革命与建设经验的 5 本，列宁的著作 19 本；作者除列宁外，还有斯大林、布哈林、瞿秋白、山川均、拉德克、巴罗维斯、罗素等；译者除李春蕃外，还有李达、陈乔年、任辟（弼？）时、张秋人、沈雁冰、张亮、华林、郑超麟、朱则、伊宽、王国源、戴景云、成则人、墨耕、李立、王静、仲武等。书目在编排上也十分考究，内容依次是：（一）介绍列宁生平；（二）介绍列宁主义概要；（三）介绍列宁的“世界革命论”；（四）介绍无产阶级革命成功后的问题，即政权问题，过渡时期的新经济政策，执政党的建设，党内的不同思想与斗争，等等。书目编制者还在篇目介绍中提醒作者要用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来研究列宁主义，即用“我们的眼光来研究俄国革命”。还提出了从研究“殖民地解放运动所应接取的方向”出发，着力于争取后进国“可不经过资本主义这一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这个书目的编制，充分显示震东社会科学院对列宁主义的研究已有一定的深度。

震东社会科学院在搞好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研究、宣传的同时，还着力于“培养党的社会科学人才”。1926 年 9 月，该院举办了“高级社会科学班”，招收初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者 50 名。该班设立了基本科学、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其他社会科学、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民众运动、中山主义、国文、其他等 9 个讲座共 62 讲。其中社会主义讲座开设“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史”、“马克思〔恩〕主义”、“唯物史观”、“资本论入门”、“列宁主义”、

“新经济政策”等7讲；帝国主义讲座设“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史”、“殖民政策”、“帝国主义与中国”等4讲；民众运动讲座设“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商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国文讲座设“近代文选”、“文法”、“修辞学”、“公文程式”、“演说辩论术”等。由此可见，高级社会科学班的教学目的是培养既具有一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又具有从事民众运动实际能力的领导工作者。其所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要到潮汕各地做群众工作的骨干。为此，高级社科班的研究空气十分浓厚，学习形式也很生动活泼。如下乡调查，请工农运动领袖彭湃、杨石魂等讲课，参加工农运动，组织“血光剧社”，演革命节目，编《血光》周刊，组织专题讨论，等等。

“震东社会科学院”在汕头的创办，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大革命时期，国共首次合作使革命形势在南方迅猛发展，国民革命军进占潮汕，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急需掌握指导革命运动的革命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在潮汕的传播，又进而需要一批理论专业人才。在当时那样的客观条件下，在汕头，有周恩来主政的有利条件，周恩来等著名共产党人高举的革命旗帜下，又集结了一批党的早期精英，如著名马列著作翻译家李春蕃，马列主义理论家李春涛，教育家杜国痒，以及工农运动领袖彭湃、杨石魂等。这些，都为震东社会科学院的创办提供了良好的客观环境和人才条件。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革命学校震东中学有很高的知名度，附设“震东社会科学院”更使震东中学名声大震。因

此，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刻骨仇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汕头的国民党反动派把震东中学当成一个主要“赤色”据点进行重点搜查，震东社科院社会经济科教员李春涛，教员、共产党员廖伯鸿均被逮捕并被残酷地杀害了；校务主任马庆川、震东社科院主持人李春蕃则因事先得到消息而免被难。5月，国民党汕头市党部、国民党潮梅警备司令部又再次派兵包围学校，并勒令震中停课，宣布解散这所学校，震东社会科学院随之被扼杀。但党所创办、领导的震东社会科学院其历史功绩，其夺目光彩，却是反动派所扼杀不了的！无论是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史，还是在党所领导的社会科学事业发展史上，它都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中共党史资料 第三十六辑

作者 =

页数 = 2 5 8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